

墨索里尼

與

希特勒

言論集

李百強編譯



文藝書局發行

墨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李百強編譯

炳松先生

指正

李百強贈

上海文藝書局發行

三十二年



墨索里尼辦公時攝影



希特拉檢閱時攝影

編者自序

我們對一種學說，或一種主義所持的態度，似乎應該分做三個步驟：第一是介紹，其次是研究，再進而批評。如果未經相當的介紹，當然昧於學說的內容，主義的精髓，無從而得研究的門徑，遑論批評，但是現在一般喜談主義、學說者流，往往在報章雜誌上，拾取一鱗半爪的殘碎資料，就詡然專家自許，以為研究有素，妄肆批評。這種人固然不說有學者的風度，而其曲解主義學說的流弊，那簡直是貽害無窮了。

法西斯主義是近來最流行的一種主義，也可以說是最走紅運的一種主義。注意的人，當然不少。文藝書局主人屢囑為編譯關於法西斯蒂書籍，不佞個人雖嘗搜集此類書籍多種，但只以看「閑書」的態度，隨便翻翻，不敢說有何研究。所以再三考慮以後，還只好就介紹方面，做一種嘗試。但是說到介紹，又發生了一個問題，究竟介紹什麼

呢？最初以爲是翻譯名著，可算終南捷徑，然而名著太多了，勢必至於顧此失彼。所以結果就產生了這一本「墨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前編是墨索里尼言論集，後編是希特拉言論集。其中有的是直接譯出的，有的是編取他家的譯本。因爲墨索里尼和希特拉是法西斯蒂領袖，故其言論當然可以代表該主義而無疑。

本書編譯主旨既然是爲供一般讀者之用，所以取材均係自成段落的中篇文章，文題也都是迎合一般的興趣，並在每篇之前，加上編者數百字的附註，算做編者個人的意見也好，算做本文的提要也好，總之，全是出以忠實介紹的口氣，毫無批評或曲解，存乎其中；因爲法西斯主義的前途，是否有佔領全世界的力量，編者固不敢妄加斷語，即中國是否適宜於法西斯化，亦尙不能無疑！好在事實勝於雄辯，請拭目以俟將來的變化。本書附錄墨、希兩人的「小傳」，因爲是在「自傳」、「大傳」之外，所以只記些關於兩人由出世以至執政間的瑣事，引用文人卸責的老調：「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尙希讀者原諒！」

目次

上編 墨索里尼言論集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社會主張	(一)
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思想	(二三)
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	(三三)
治人問題	(四三)
獨裁制的危險性	(五五)
法西斯蒂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六五)
法西斯蒂國家與其將來	(九三)

下編 希特拉言論集

國家社會主義黨	(一二九)
民族與種族	(一四七)
人才與國家的觀念	(一六三)
反赤運動之經過	(一六九)
歐戰後德國之聯盟政策	(一八三)
論突擊隊的意義與組織	(一九九)
何爲國家	(二一七)

附錄

墨索里尼小傳	(二四一)
希特拉小傳	(二五一)
關於法西斯主義的外國文參考書	(二六一)

上編 墨索里尼言論集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社會主張

過去的時代，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現在時代是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戰鬥，凡注意世界大勢者，類能知之。法西斯主義創於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已十餘年，今且盛行於希特拉統治下的德意志。吾人於墨氏所著之「自傳」(Benito Mussolini: My Autobiography)，魯德嘉筆記之「墨索里尼語錄」(Mussolinis Gesprache mit Emile Ludwig)，以及希特拉所著之「我的奮鬥」(Adolf Hitler: My Battle)三書中，雖可看出墨·希兩氏思想與主張的片斷，然究竟法西斯主義的整個主張如何，總以未窺全豹爲憾。至各家所著關於法西斯主義及墨·希兩人傳記之書，則更乏權威性(Authority)。最近墨氏始發表「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社會主張」(Benito Mussolini: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octrine of Fascism, translated by J. Soames, published by Hogarth Press, London) |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社會主張

1

570.7
285
2

文，印成單行本，洋洋萬言，堪稱爲揭示法西斯主義理論基礎唯一的文章。以法西斯主義的領袖，寫法西斯主義的主張，此文之珍貴可知矣。爰亟譯出，以供研究法西斯主義者之參考。百強附註。

當一九一九年三月，予曾藉意大利民報召集捧喝黨黨人在米蘭 (Milan) 開會，這班黨人均曾實際活動過的，並且自法西斯蒂革命黨 (Fascist Revolutionary Party) 創於一九一五年正月) 成立以後，即隨我左右，此時予腦筋中尙未有一定的主義觀念。我只有一種主義的經驗——即社會主義，由一九〇三——四年至一九一四年的冬季——約計十年；而就社會主義的本身言之，雖然最初予不過爲普通會員之一，嗣後成爲領袖，但是我仍舊在實際上，對於該主義，未有經驗。我自己的主張，即在該時代內，只是一種行動的主張 (doctrine of Action)。自一九〇五年以後，一致普遍承認的社會主義理論，已經不能存在，當時德國在白斯汀 (Berstein) 領導下，開始改革運動 (Revisionist Movement)，而在時代趨勢的壓迫下。左傾的革命運動，亦隨而發生，雖然在意大利不過是徒有其名，而在俄國社會主義界內，則已造下布希維克主義的基礎。改革、革命、集權

——這些名詞均得到響應——而在法西斯主義大激流中，則先有梭利爾 (Nenni)、潘古 (Pesci)、的思想，和拉格底爾 (Lagarbelle) 在「社會運動」內的思想，以及由一九〇四——一四年間意大利的工會運動，使意大利社會主義界（已經因吉奧利底 Orlando 失敗而銷沉者）由奧林維特氏 (Olivetti) 的「自由論」，及李昂氏 (Leone) 的「社會主義神聖論」，再打開一種新生面。

自歐戰後，一九一九年時，社會主義已經不成爲一種主義；只有一種嫉恨。只有一種行動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意大利，就是對一班贊同歐戰的人，予以報答，使其現在得到戰爭結果的賠償。意大利民報有一個小標題，是「以前服務的人員與生產家的報紙」，而所謂生產家一語，已成爲當時智識觀念的表示了。法西斯主義並非經過精神締造的主義的驕子；而只是由於行動需要所產生的，故實行重於理論；並且不是另外一種政黨，但是，即在最初兩年，皆努力反對一切政黨，而其本身則爲一種活潑的運動。予所定此種組織的名稱，則所以表示其性質。如果有人重新翻讀「鬥爭的法西斯意大利」成立時

的開會報告，那末他就可以曉得其中並無主義的發表，只有一套的箴言、預言、及希望，經過時代的鍛鍊，幾年以後，才發達成爲一套的主義觀念，成爲法西斯蒂政治主張——與其他不論過去或現在的主張不同。

所以我說：「倘使布爾喬亞階級想在我們當中尋出避電針 (Lichtening Conductor)，那末他們必至失望；我們必須立刻開始工作……我們要使勞動階級認識真正而有力量的領袖，並且使他們明白指導工業或商業成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必須對於每種落伍的思想，不論是技術的或精神的，均加以攻擊……倘使遇有繼承政府職權的機會，我們必須競爭。我們必須從速；如果現在的政局崩潰，我們必須立刻取而代之。我們有這種繼承的權利，爲因我們強迫國家參加歐戰，而領導之以獲勝利。現在的代議政治的方法，已不能繼續，我們必須有一種直接由人人選舉的代表制度。或者有人反對此種計劃，以爲是回到社團制度的觀念，但是這是不關緊要的……所以我主張這個議會一定要由經濟觀點上，接受重新維持國家工會主義 (National trades-Unionism)……。」

此時所發生的「社團」一名詞，後來在革命時期內，是否就成爲當時社會主義的基礎呢？

在進攻羅馬之前數年，就是大困苦數年，當時必要的行動，並不許對於主義加以研究或詳細討論。此次戰爭發生於鄉鎮村落中。當時雖有許多的討論，但是——沒有較此更重要而神聖的——就是人人就死的問題。他們都曉得如何去死。美麗的詮釋和謹慎的解說的主義及標題與論文，雖然沒有；但是尙有更爲堅決的東西，取而代之——就是信仰。雖然如此，但是各人均能回憶到當時發生的事件，由於書本、文章、選舉票、及重要或不重要的演說的幫助——各人都曉得如何研究及權衡證據——都可以曉得主義的基礎就是在衝突的數年內建立下的。在這幾年內，法西斯蒂思想自己加以鍛鍊，並且開始組織的大工作。關於個人與國家關係的問題；權能與自由的連帶問題；政治與社會各項問題，尤其是有關於國家的——設法以謀以上各問題的解決，同時奮力反對自由主義、德謨克拉西主義、社會主義、並成立共濟會團體，與「突擊隊」。但是因爲缺少制

度，所以法西斯主義的敵人遂否認其能產生自己的主義，雖然該項主義是他們親眼看見發生成立的，縱使是雜亂無章；最初如一切觀念的開始一樣，在激烈的消極方面，及在極積的建設方面，均於法律上及制度上實現，接續於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施行。

法西斯主義現在已完全成爲一種獨立的東西，不止是一種統治權，而是一種主義。這就是說今日之法西斯主義，對其本身及他人，均施行一種批評的意義，造成其自己的顯明而特異的觀點，隨時引用，並且依照之以向全世界解釋各種實際的和理論的問題。

總之，法西斯主義對於未來的前途及人道的發展，較之當時政治上的考慮，更爲關心注意，而不信任永遠和平的可能和效用。因此乃排斥太平主義——即發生於放棄鬥爭及表面犧牲的懦弱行爲。只有戰爭能引起一切人類的能力，至最高度的奮勉，凡是有勇氣應付戰爭的人們，都可以受到尊敬的表示。其他一切試驗，都是附屬於此的，因爲這不能真正使人類處於最大決心的地位——對於生或死兩途的選擇。因此建築在有害的

和平理論的基礎上的主義，乃爲法西斯主義所仇視的。並且與法西斯主義的精神，不能兩立，雖然可以接受利用於某種特殊政治環境之下，蓋就歷史所示，一切國際同盟及團結，一遇國家思想受某種動機激起以後——如感情的、理想的、或現實的——即會風消雲散。此種反太平主義的精神，乃由法西斯主義提倡而灌輸入人的生命之內，此種主義並非僅是政治的——而是一種戰鬥的教育，接受此種戰鬥的危險，以圖意大利新的生活方法。因此法西斯蒂黨人承認生命並且愛惜生命，而不知有所謂自殺之事，並且排斥之；他把生命看做義務、鬥爭和勝利，生命是高尚的、而完整的、爲個人自己而生存，並且也爲他人而生存——即爲親近的人、遠隔的人、現在的人，以及未來的人。

這種「生死」政策的意義，乃由於以上理論的結果。因此法西斯蒂黨人實際愛惜其鄰人，但是所謂「鄰人」並不止是一種模糊無界說的觀念，而此種對其鄰人的愛惜，並不受教育的阻礙，或是地位與地理路程的歧異。法西斯主義排斥普通的仁愛，以及謀自身在文明社會上生存更有價值起見，而以謹慎的眼光注視他的同儕；注意他們的思想，

和興趣變遷的趨勢，而不許其本身受暫時的和幻覺的現象所欺騙。

此種人生觀遂使法西斯主義完全反對該種主義，所謂科學的馬克斯式的社會主義的基礎的唯物史觀；依照該項觀念，人類文化的歷史僅僅簡單地是屬於各社會團體間利益的衝突，以及生產工具和方法的變更與發達。經濟界此種變更——原料的新發見，新的工作方法，及科學的發明——其重要固無人敢加以否認；但是僅以此種原因來解釋人類全部的歷史，而排斥其他各原因，則殊屬錯誤。法西斯主義現在和將來，均信仰於聖神主義 (Holiness) 和英雄主義 (Heroism)；這就是說在行爲上不受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動力的影響。倘使經濟史觀被否認之後，依照該項理論，人類不過是傀儡而已，均受機會潮流的波動，而此種真正直接的力量，均在他們統馭力之外，於是而所謂不能變的和不可變的階級戰鬥，——這是經濟史觀自然的產兒——亦應加以否認。總之，法。西。斯。主。義。否。認。階。級。戰。鬥。是。社。會。轉。變。中。最。重。要。的。力。量。社。會。主。義。這。兩。種。的。觀。念，既經否認之後，則所餘已經無物，除了感情的衝動——與人類同久遠的——以趨向於一種社會的約制，以爲

弱者的憂愁痛苦，應該爲之滅除。但是此處法西斯主義又反對由社會主義上所實現的「經濟」快樂的觀念，而於經濟進化的某過程中，以確保每人最高度的幸福。法西斯主義否認物質的快樂觀念，是一種可能的，而以之壁還十九世紀上半期發明此項理論的經濟學者；這就是說法西斯主義否認平等、幸福快樂的效力，因其足以貶抑人類流入畜牲之道，祇爲自己個人打算——養得肥胖適意——並且卑視人類純粹爲物質的生存。

在社會主義之後，法西斯主義詆斥民主政治觀念全部複雜的統系，而加以反對，不論其爲學理的推論或實際的應用。法西斯主義否認「多數」(Majority)，其簡單的事實，僅僅是因爲「多數」，就可以指揮人類的社會；並否認單獨「人數」(Zuehler)短時間的會議，就可以管轄一切，而贊同不變的、有利的、和有結果的人類不平等，絕對不致爲機械式的方法，如普選之類所永遠征服。民主政治的思想如其界說所示，時時使人類感到一種無上威權的錯覺，而其真正有效的無上威權，則操諸於其他隱藏不負責任的勢力的手內。民主政治的思想表面上就是不要皇帝，但是仍舊由許多皇帝來管理。

——而且較之一個皇帝或是暴君更爲專制、更爲暴虐、更爲腐敗。這就是解釋法西斯主義何以第一次在一九二二年（爲便利起見）擬定對共和主義的態度，而在進攻羅馬之前，即棄絕此種觀點；因爲認清政治形式的問題並非今日的首要，並且經過研究過去和現在的專制政體與共和政體以後，得到一種結論，以爲專制與共和，均不能用絕對的標準來評定；只能代表某一國家所表示的進化——政治的、歷史的、傳統的，或心理的——的形式。法西斯主義均放棄此兩種政體，專制或共和，然而民主政治則仍受此種觀念所佔據，一面指出前者的缺陷，一面稱頌後者完美的理想。今日可以看到許多共和國家，生來就是反動的而且專制的，此外則君主國家其前途亦有最急進的社會政治的希望。

賴南氏 (Renan) 法西斯蒂的前輩) 於其哲學語錄中，曾經說過：「推理與科學，均爲人類的產物，但是希望推理爲人類直接的產物，乃其行爲的直接結果，則是以癡想自己欺騙自己。推理的存在，未必一定要人人了解。而且此種真理如果必要，則亦不能收效於低級的民主政治。所謂社會的存在完全由於個人的幸福與自由的原則，似乎不合於造

物的計劃，因為造物乃以種族為對象，而使個人對種族而犧牲。此種民主政治（予須指出「民主政治」名詞有幾種方法的解說）觀念的最後階段，恐怕會使社會陷入一種情境，其中種族退化，只求普通一般人的最低慾望的滿足」。這是賴南氏的說法。而法西斯主義，在民主政治方面，則否認戴着不負責任的面具的政治平等的錯覺，以及「快樂」的神秘，和無限止的進步。但是如果民主政治由另外方面觀察——這就是說，以民主政治為社會的狀態，其中人民均不致使國家變為無能——那末法西斯主義本身就可以算是「一個有組織、集中而有權力的民主政治」。

法西斯主義曾經持一種完全反對自由主義主張的態度，不論在政治界和經濟界內。對於前世紀自由主義的意義，應不能予以無限的誇大（只簡單地因為其辯論的成功），不過以之為當時各種理論之一，以為人類的信仰，現在以至將來。自由主義只盛行約半世紀。該項學說發生於一八三〇年以反抗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該同盟之成立，其目的在於引導歐洲後退到一七八九年前的時代，而自由主義最大的成功，則在一八四八

年，甚至披阿斯九世（Pius IX）亦成爲一自由主義者了。自是以後，自由主義立刻開始退化，因爲倘使一八四八年是一個光明希望的年頭的話，則其翌年一八四九年，即爲一個黑暗悲慘的年頭。羅馬共和國受其姊妹共和國——法蘭西——死力的攻擊，而同年馬克斯宣傳其社會主義宗教，發表著名的共產主義宣言。至一八五一年拿破侖第三用其毒辣手段，與自由主義大相逕庭，以統治法國，直至一八七〇年爲止，始因軍事失敗的結果，而受一致的驅逐，這也算是歷史上大事之一。此次勝利者爲畢士麥，他並不懂自由主義的宗教，或是該項信仰的預言家。於是這個具有高等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在十九世紀全期中，竟全昧然於自由的宗教。德國國家統一的成功，完全超出自由主義的主張之外——此種主義在德國人具有君主思想的腦筋中視之，似乎完全是陌生的——而自由主義則爲無政府主義合理的而有歷史的先鋒。德國統一成功的時代，就是三次戰事，即一八六四年、六六年、七〇年，而由這種「自由主義者」如穆爾克（Von Moltke）畢士麥等領導。至於意大利的統一，其所受惠於自由主義者，則絕不及瑪志尼（Mazzini）、

及加里巴地 (Garibaldi) 的工作，他們都不是自由主義者。倘使不是因為反自由主義者的拿破崙的干涉，那末我們必不致獲佔蘭巴特 (Lombardy)；並且如果不是受反自由主義者的畢士麥在薩棟瓦及西登 (Sadowa and Sedan) 的協助，那末我們必不致於一八六六年收服威尼斯省，或是一八七〇年開進羅馬。由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這一期中，甚至極高地位的宗教師，本身都已經承認他們信仰的回光返照——因為受文字的腐蝕和實際的復古主義所屈服——這就是國家主義、未來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的時代，堆積了許多的難題，於是乃藉世界大戰的屠殺，以圖解決——沒有一種宗教需要牠的信徒從事這樣巨大的犧牲。或者自由主義之神，渴想腥血嗎？但是現在，今日自由主義的信仰，一定要關閉他們荒涼教堂的大門，其所以變為荒涼者，則是因為世界人類已經覺悟崇拜此種信仰——紛爭於經濟方面，而漠視政治及道德方面——必將致並且已經引導而入於某種的沒落。此外，必須指出今日一切政治的希望，都是反自由主義的，所以視此種主義為唯一無上的信條，好像歷史是供自由主義教師遊獵之所——好像自由主

義是文化最後不可變的判斷——殊屬可笑。

但是法西斯蒂否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及自由主義，並非說法西斯主義打算引導世界回到一七八九年前的境況，是年乃為半自由主義時代的開始，我們並不願開倒車；法西斯主義並不以馬特爾 (Do Meistro) 為其高等教師。極端的君主政體已經不能再恢復了，而接受教皇統治則更為盲從。

封建制度的權利，同樣地「已成過去」，而分配社會成爲各種階級，不准外界侵入，以及彼此不相往來，這也是行不通的了；法西斯蒂權威的觀念，都不是屬於此種政制。一個政黨完全統治一國，是歷史上一種全新的事件，並無過去的參證，或比擬。法西斯主義採用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民治主義的原則之仍有現代的價值者；牠維持歷史的真實性，而廢棄其餘的東西——這就是說此種觀念，足以適應各時代各民族的主張。例如十九世紀爲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及民主政治的時代，而不能說二十世紀一定也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及民主政治的時代；政治主張已經過去，而人類則如故；現

在可以希望是權威的時代、左傾的時代、法西斯主義的時代。因為如果十九世紀是個人主義的時代（自由主義往往代表個人主義），那末本世紀就可以希望其為集團主義的時代，亦即國家的時代（Century of State）。這是一種完全合理的演繹，就是新的主義，可以利用過去一切主義仍舊有效的質素。

沒有一種主義完全是新的，完全與過去無關的；沒有一種主義敢自吹具有完全創造的性質；而必須由前此的各種主義內擇長捨短。所以馬克斯的科學社會主義，乃為福利（Fourier）、歐文（Owens）、及聖西門（Saint-Simon）等的樂天社會主義的產兒；所以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乃與十七世紀先進的思想，有所關連，所以民主政治的主張，則為百科全書家的結晶。每種主義均趨向於領導人類活動，向一種確定的目標；但是人類的行為，亦足以反應到主義上面，使之變化，適應新的需要，或是替代他種主義。因此主義不能只是文字的表現，而須有活動的行為；因此法西斯主義的價值，就是因為事實上是抱着實行主義，而同時具有一種競存的決心、和掌權的決心，並且願與現實的「擾

「對抗。」

法。西。斯。主。義。的。基。礎，就。是。國。家。的。觀。念、其。性。質、其。義。務、及。其。目。的。法。西。斯。主。義。視。國。家。為。一。絕。對。的。自。主。體，與。個。人。及。團。體。比。較，均。皆。屬。之。於。國。家。自。由。主。義。國。家。的。觀。念，並。不。是。一。種。集。團。的。指。揮。力。量，以。引。導。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行。動。和。發。展，而。僅。是。一。種。依。照。結。果，以。限。制。職。能。的。力。量；在。另。一。方。面，法。西。斯。蒂。國。家，其。本。身。乃。有。感。覺，且。有。一。種。意。志。和。人。格——所。以。可。以。稱。為「倫。理。的」國。家。當。一。九。二。九。年。在。法。西。斯。蒂。統。治。下。第。五。年。的。年。會。中，予。曾。云：

「在我們法西斯蒂黨人方面，以為國家不僅是一個保護者，完全盡一種保障人民個人安全的義務；也並非只是一種純粹以物質為目的的組織，例如擔保人生幸福及和平狀況至某種程度；因為只要一個行政機關，就足以成就這一類的目的。國家也不是一個純粹政治的產物，與造成個人生活和民族生活的一切複雜物質的現實相分離。由法西斯主義視之，國家本身是一個精神的和道德的現實(A Spiritual and Moral fact)、因為民族

的政治、法律、經濟的組織，既然是具體的東西；而此類組織，其發源與進展，均爲此種精神的表現。國家是對內和對外的保護者，並且也是人民精神的保管者與傳遞者（Custodian and transmitter），因其語文、習俗、信仰等，均曾經過千百年的發展。國家不止是現代的現實，並且也與過去以及未來發生關連，於是遂超過個人生活簡單的範圍之外，而代表全民族內在的精神。國家所表現的形式，可以變更，但是此種形式則永遠需要。國家教育人民一種公民的道德，使他們感覺本身的使命，並促成其團結統一；以公理來調和他們各人不同的利益，並將一切科學、藝術、法律、及人類共同責任等智識，灌輸於後代的子孫。國家使人類由原始的部落生活，進化而達到人類權力最高的表現的帝國：千百年來，凡是國民因求國家的生存和遵服國家的法律而死者，其姓名均得與國家共垂不朽，至於努力擴充國家版圖的領袖，以及發揚國家光榮的天才，均將予以紀念，以爲後世的楷模。倘使國家的觀念沒落，而一切爲個人或某團體的分崩離析的趨勢盛行，此種現象發生之後，則民族亦必隨而沒落。」

由一九二九年以迄於今，政治的與經濟的進化，到處均足以證明此類主張的理論的效力。國家是如此的重要。只是國家的力量，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的衝突，以及我們所稱的恐慌事態。當自由主義發起之際，西門氏 (Julius Simon) 曾經說過：「國家必須致力使其本身成爲無用，而預備自己消滅」，其言於今安在？至於麥古拉 (Mc Culloch) 在前世紀後期所贊成國家一定要保證不致操權過大的危險，其言又何足信？而英人邊沁 (Bentham) 氏今日屢次提到國家對於經濟界的干涉，然而依照其理論，工商業應不求教於國家，而自圖和平，則又何故？或是依照德人哈姆保德氏 (Hamboldt) 之言，以爲「懶怠」的國家 (Lazy State) 可稱爲最好的嗎？實際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第二次的潮流，已經不及第一次之趨於極端，而亞當斯密實開啓其門戶——如果極謹慎的說——而引起國家對經濟界的干涉；但是無論何人都知自由主義即指個人主義，而法西斯主義即指國家。惟是法西斯蒂國家是完整的，並且是創造的產物。法西斯主義既非反動的、而實革命的、因其乃參預以謀解決一般的政治問題，而此種問題，在他處則由各黨派競求解決，

造成議會政治過大的權力，及政治機關的不負責任；法西斯主義乃用工團主義的制度，以應付經濟界的各項問題。此種工團主義已經繼續在勞工界及實業界，益見重要，而在道德範疇內，則促進秩序、紀律、以及服從國家確定的道德法規。法西斯主義希望國家成爲一個強大的有機體，同時受廣大而普遍的擁護。法西斯蒂國家，其本身亦必參預全民族的經濟活動，而由其所創造的社會機關與教育機關，以發揮其影響達於全民族生活的各方面，統括全民族一切的政治、經濟、精神的力量。凡一國家受數百萬人的擁護，承認其權力，則已非中世紀時代君主統治的專制國家可比，並且也與一七八九年前後的一切專制政府不同。法西斯蒂國家內，個人的地位，並不致抑低，好比是軍隊內的兵士，反因同隊的人數增多，而增高其地位。法西斯蒂國家將全民族組織起來，但是仍留給個人必需的自由；惟個人一切無用而且有害的自由，均被剝奪，只留下重要的自由；此處關於權力的確定，只有國家，而無個人。

法西斯蒂國家對於一般的宗教，並不漠視，尤其是對於特殊的意大利天主教的信

仰。國家並不提倡神學，而只有道德，而在法西斯蒂國家內，宗教算做人類精神最深的表現，所以非但得受尊崇，並應予以保護。法西斯蒂國家不願自己創造上帝，如過去羅伯斯皮爾(Robespierre)及極端派等所爲；但是也並不一定要把人類心目中的宗教消除，如布希維克主義所爲；法西斯主義崇敬避世的上帝，聖賢英雄，並同樣認上帝與普通人民所崇奉者相同。

法西斯主義，具有一種掌握權力與政府的意志；此處即襲羅馬的傳統，有一種實行力量的理想。依照法西斯主義，政府並不止是以疆土與軍力的名稱來表示，而尤應以道德與精神來表示。應該看做一個帝國——即一個國家直接間接治理其他國家，而不需戰勝其尺寸的疆土。就法西斯主義言之，帝國的發展，即民族的擴張，乃爲實力的主要表現，而與沒落的徵象相反。大凡民族的興盛或是經過一個沒落期後的興盛，都是屬於帝國主義的性質；凡是拋棄責任，就是沒落與死亡的徵象。法西斯主義是代表人民志氣趨向如意大利民族者的最好的主義，因爲意大利人民數百年來曾經受人輕視與外國的壓

迫。惟是帝國需要紀律、以及一切力量的綜合，與一種深切感覺的義務和犧牲；這種事實可以解釋國家許多力量的意義，性質的實際工作的各方面，並且對於反對二十世紀意大利此項時勢所趨的運動，而提倡恢復十九世紀過時思想的人，必需予以嚴厲的懲戒手段——並且排斥一切對社會、政治改變的嘗試；因為以前民族都未曾需要權能、指導、及秩序，如今日之甚，倘使每一時代均具有本時代性質的主義，那末法西斯主義可以有幾十種徵象，堪稱爲具有現時代性質的主義。因為如果主義必須是活的東西，則法西斯主義已經證明創造過一種活的信仰；而此種信仰在人類思想上極有力量，因為曾經有許多人爲此受害而死亡。

法西斯主義，因此是集世界上代表人類精神的歷史的一切主義的大成。

墨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思想

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思想是墨索里尼的一篇力作，把法西斯主義重要的觀念，用簡單而明晰的文字與解釋，揭露無遺。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實行和思想，法西斯黨人的理想生活，是嚴肅的，艱苦的，和宗教的，而輕視安甯的生活，法西斯主義是反對個人主義的，而以一切屬於國家的，法西斯主義是反對民主的，政治把人民同化於大多數，所以總括的說起來，法西斯主義不僅是制度的立法者和創建者，也是精神生活的教育者和獎勵者。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思想和觀念，而為本文主要的內容。

百強附註。

法西斯主義和一切的政治觀念一樣，同時是一種實行和思想。乃由主義所激發出的種種行動。這種主義是從一種具有歷史力量的系統中所產生的，而密切地連結一塊，使

牠感受到內部的衝動。所以是含有適應地理和時間機運的一種形式，不過同時也有一種思想史上最高真理的理想。

我們如未了解行動上暫時和特殊的現實，便不會像支配他人意志的意志一般，對世界有何精神的行動；可是這種現實的存在與其生命，則假托於另一個永久和普遍的現實概念之中。要認識一切的人類，必須認識人；要認識人，必須識認現實及其法律。沒有一種國家觀念，不是澈底地一種生活的觀念。這是一種哲學，也許是一種直覺，一種從邏輯構造上演繹出來而歸納到一種幻想或信仰的思想系統，不過至少在事實上，這永遠是一種世界有機的觀念。

我們如果不去考量法西斯主義在一般生活的觀念上的機能，這因為我們還沒有在黨的組織或者教育和訓練的制度方面明瞭其實際的表現。這種觀念是屬於精神主義的。就法西斯主義看來，世界並不是顯露於外表的這個物質世界，在這個物質世界裏，人祇是和全體相分立自存的個人，而為自然法律所統治；於是這種人在本能上就使他在一種自

私自利和暫時歡樂中生活着。人在法西斯主義下，個人就是民族和祖國有一種道德的規律，把個人和時代，在一種習俗和使命中統一起來，剷除限於自身歡樂的生活本能，而在責任上建立出一種超乎時間和空間的最高生活。在這種生活裏面，個人不惜貢獻一生，犧牲他一己的利益，甚至粉身碎骨，以實現使他值得做人的全部精神的生活。

因此，這是從反抗十九世紀退化和唯物的現實主義的現世紀總反動中所產生的一種觀念。非但反對現實主義，而其本身也是一種現實主義；惟不與普通純粹消極的主義相同，是懷疑主義，玄渺主義，悲觀主義或被動的樂觀主義，把生活中心放在人生之外，藉着他的自由意志，以創造他底世界。法西斯主義希望人應當勤勉，竭其全力從事活動；人應當岸然有丈夫氣概，認清真的困難而有準備冒險的勇氣。牠認為生活是一種鬥爭，去征服一種實在對他尊貴的生活，是人們分內的事情，尤其他自己須最先創造出一種工具（生理，道德和理性的工具），這對於個人自己，民族和全人類都是一般地真確。在那裏便是各種文化（藝術，宗教，科學）的最高價值，和教育的最大要點。同時在

那裏也是工作的重要價值，人就藉了工作來戰勝自然，而創造出人類的世界（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理性的世界。）

這個生活的積極觀，顯然是一種倫理觀念。牠包含一切的現實，以及支配現實的人類活動。一切行動都逃不出道德的審判，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抹殺一切完成精神目標的職務的價值。因此，法西斯黨人的理想生活，是嚴肅的，艱苦的，宗教的；牠是在一個靠着對精神負責和道德力量來支持的世界中的全部生活。法西斯黨人輕蔑安寧的生活。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宗教觀念，看做人和一種最高法律，一種超越個人的客觀意志的卓絕關係，而把這種關係推崇到一種精神團體意識的尊嚴。在法西斯制度的宗教政治中，一般祇看到一種純粹機會問題的人，是沒有了解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種政府制度，而在一切之前，牠還是一種思想的系統。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歷史的觀念，在這種觀念內，人祇見在家族和社會，國家以及一

切國家共同的歷史中，執行他共同協力的精神程度中底職務。於是在那些記憶，文字，習慣和社會生活的法律中，才有傳統的價值。除了歷史之外，人便沒有價值。所以法西斯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典型，一切的物質做基礎的個人主義的理想相反；這所以牠也和一切烏托邦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雅各賓黨（法國革命時的急激派）革新思想相反。牠並不像一般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的著作，相信能把幸福在土地上設想；牠也擯斥一切目的論的觀念，這些觀念以為在歷史上某一個時期，人類可到達一種決定的組織的間歇期。這樣的一個主義是和歷史和生活相反的，而生活和歷史是不斷和永久進化的運動。法西斯主義在政治上寧願是一種現實主義，在實際上則祇切盼着解決那些從牠本身在歷史上所發生的問題，而更從其本身找到這些問題的解決。要對人們有所影響，和對自然一般，應當進入於現實的途徑，及把一切的主力造成行動。

法西斯觀念反對個人主義，所以一切是為國家的；但於個人與國家以及人類生存史中普遍的意識和意志相化合時，也能有為個人的觀念。牠反對那些抗爭專制主義的反動

必要中產生的古典派自由主義，因為牠在國家成爲人民本體的意識和意志後，已終止了牠歷史的職務。自由主義在個人利益中否認國家；法西斯主義則重認國家是個人的真實現實。如果自由應當是人的實體（指人的大集團）的特性，而不是像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所設想的虛空的傀儡把戲，那末法西斯主義也走向着自由的。不過牠祇對嚴重的事物有自由，如國家的自由，即個人在國家中的自由。在事實上，從法西斯黨人的立場說，一切是在國家之內，沒有人道和精神的在，何況法西斯主義除了國家，更沒有其他有價值可言的東西呢？換一句話說，法西斯主義是全體主義，而法西斯國家，是一切價值的綜合和統一，是在於解釋，發展和支配一切人民的生活。

在國家之外，沒有個人，也沒有集團（政黨、協會、工團、階級。）因此法西斯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在階級鬥爭中，停止一切歷史的動作，而不使各階級在統一國家中建成唯一經濟和道德的現實；牠也一樣地反對階級的工團主義。但法西斯主義在國家的範圍內也情願有那些事實的需要，產生出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的運動，而使牠

在組合制度內發生效力，在這個組合制度內，牠們底利益是在統一國家相調和着。

個人按着他們利益的範疇，組成各個階級；更按着他們各自互相有關的經濟活動，組成工團；但是他們最重要的，尤其是國家。國家並不是組成大多數人民的個人或者他底總數。因此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政。治。把。人。民。同。化。於。大。多。數，而把他壓下這種水準。然而這却是民主政治上最純粹的公式。如果我們在質量上而不在數量上認識人民的本性，是因為他最富精神性，團結性和真實性，而表示最強有力的思想，則至少這些思想和人民相化合之後，如同一個少數或甚至唯一個人底意識和意志，這樣一個理想便向着全體意識和意志中實現出來。因了自然和歷史，一切人類按着發展和精神集合的步驟，在倫理上構成一個民族，而作為唯一的意識和唯一的意志。民族與人種和決定的地理區域都沒有關係，牠不過是在歷史上永遠綿延的一種集團，為一種思想所統的一個人羣，這個思想是一種生存和強力的意志！這便是牠本身的意識，或人格。

這。個。最。高。的。人。格。是。在。國。家。下。的。民。族。這並不是像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作家的自然

主義，把民族來創造國家。反正民族是由國家來創造的，國家把牠自己精神合一的意識，一種意志而結果到一種切實的生存，賦給人民。一個民族的獨立權並不建立牠的本身生存的理想和著述的信仰上面，更不是建立在一種不大活動與無意識的事實環境上面，而是建立在一種活躍的意識和一種行動的政治的意志上面。國家按着牠普遍的倫理意志來創造權利。

在國家下的民族，是一個倫理的現實，按着牠底發展而生存並生活着。民族的發展一旦停止，這便是死亡。所以國家不僅是治理人民和發生合法公式，對個人意志產生精神生活價值的一種威權；也是發揮牠意志到外面去，使牠得以被人家承認和尊重的一種力量，換一句話說，用事實來證明發展的一切必要表現中底普遍性。在那裏，組織和擴張，至少是一種事實。於是國家這樣地能同化於人類的自然和意志中間，這種意志並沒有認識牠發展的限度。惟於實現之際，始能證明牠是沒有止境的。

法西斯國家，這種在人格上最高尚和最有力的公式，是一種力量，是一種精神的力

量。這一種力量，集合一切人類精神和理性生活的公式。所以我們不能像自由主義所希望，把國家限於純粹秩序和保護的職務。這並不是限制一般所謂的個人自由範圍的一種簡單的機構。這是一種公式，一種內部的規律和一切人員的一種紀律；牠同理性一樣的和意志相會通。國家的原理——人民生活於民間團體人格的中心感應——最密切地感應到個人，牠深入於行動家的心中，也一般地深入於思想家的心中；牠深入於博學者底心中，也一般地深入於藝術家底心中：這是萬靈之靈。

總而言之，法西斯主義不僅是制度的立法者和創建者；也是精神生活的教育者和獎勵者。所要改造的，不是人類生活的那些公式，而是牠底內容；人，特性和信仰。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必須把一種紀律和一種威權和精神相會通，而於統治時，不能分割。此其所以古羅馬軍人的仗鉞，統一力，和公道的符號，就是牠底標識。

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

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與以下治人問題，和獨裁制的危險性三篇，都是採於魯德裏所記「墨索里尼語錄」（Mussolini's Gespräche mit Emile Ludwig）者。魯氏曾經寫過「拿破侖傳」，「畢士麥傳」，的是作傳的老手，也爲記事文的健將，故其文筆生動，語意深刻，用問答的體裁，記反復的辯論。大凡一人的思想，着於文字者，往往因執筆搆思，顧前慮後，或不免有作僞不實之處，惟有「語錄」，係根據於臨時的談吐，多屬天真，鮮有虛飾，所以最足珍貴。儒家的論語，耶穌的聖經，都可算是孔子與耶穌說道的「語錄」，雖文字係出門人的手筆，然其中思想言論，較之自己著筆者更爲正確真誠。以是魯德裏所記的「墨索里尼語錄」，雖非墨氏親筆之文，然其思想言論之真實，較其「自傳」，尤爲可貴，况這三篇都是「語錄」中精選之作，其討論的問題，又皆合於實際，而爲一般人所欲知者。文中仍用問答

體，即魯氏發問，墨氏回答，三篇均同。

百強附註。

問：『你覺得一個現代革命者，同從前的革命者，在構成上有什麼不同嗎？』

答：『形式是變了。但是一個條件，卻是在任何時代應有的——革命者須要肉體與精神兩方面的勇敢。其餘就不同，每一次革命必創造新方式，新神話，新儀式；就是革命者也必須先因襲舊傳統而行，後來再行改造。他必得到創造新節日，新狀態，新形式，形成自己的傳統。飛機節現在很時髦。不出五十年，必定會生鏽。』

問：『有許多青年，因為沒有機會做領袖，才成爲無政府主義者，你覺得對不對？』

答：『當然，每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都是失了火的獨裁家。』

問：『你既然覺得年輕時受革命精神教訓不少，反抗和創造既是青年應有的精神，你現在爲什麼強迫青年服從，要青年有秩序呢？你既嘲笑從前的官僚政治，你爲什麼又造成新官僚政治呢？』

答：『你錯了，在從前，政府對於國家的觀念太不清楚。況且，新時代又給一國增

加了新事業；如果效能至大，秩序就應當極好。在意大利國內，現在各方面發展，凡能認清的，我們都認清了。至於說官僚政治，我承認你批評的有力，但官僚政治是免不了的。關於秩序，我們以歷史上的需要，總得這樣做。我們正處在一齣戲的第三幕，將來還有一天，一切革命者都會變成保守主義者。」

問：「你想起從前受監禁之苦，眼見你的朋友變成了敵人，你一定會覺得十分難過。」

答：「唔，不同我走一條路線的人，我沒有如何酷待他們。」

問：「一個在法律以外行事的革命者，要十分限制自己，總是十分困難。一九一一年，你被通緝的時候，你說怠工也自有道德上的目的；斷電報線是可行的，拆毀中立性的鐵路，則是不可行的。試問在可行的革命與不可行的革命之間，這條線到底怎麼劃分呢？」

答：「這是每一個革命者應當自己決定的問題。」

問：『假如一九一三年你在米蘭的革命成功；你第二步又將怎樣呢？』

答：『第二步嗎？第二步就是建立共和國。』

問：『但是這許多思想，同你早認為信條的民族主義，怎樣能適合呢？』

答：『一個共和黨人，當然能同君主黨人一樣，做一個民族主義者——也許比君主黨人還好。這樣的例子，不是很多嗎？』

問：『但如果民族主義與政府的形式無關，又與階級問題無關，自然也與種族問題無關。你真同許多人種學者一樣，還相信有一純粹的種族嗎？你還相信種族統一，是使民族精神蓬勃的保證嗎？爲法西斯蒂辯護的人，有的（如白蘭克 *Blanc* 教授）像北方的冬烘討論「高貴血統」一樣，談拉丁種族這類無聊問題，只徒然增加敵人議論的口實，你不覺得危險嗎？』

答：『當然沒有什麼純種；就是猶太人的血統，也不免混雜。但混血反增進了一民族的力量和美點。種族！種族是一種感覺，不是存在的實物；至少百分之九十五，是一

種感覺。決沒有什麼，可以使我相信現在還有所謂純種存在。有趣的是頌揚條頓族高貴血統的人，沒有一個是真正條頓人。葛賓紐 (Gobineau) 是法國人；張伯倫 (Houston Chamberlain) 是英國人；吳忒曼 (Woltman) 是猶太人；賴寶格 (Lapouge) 也是法國人。張伯倫的確說過羅馬是渾沌之都。這類學說，在意大利決不會有許多人相信。你剛才說的白蘭克教授，很富於詩意的想像，但可惜缺乏科學精神。」

問：「這是反猶太主義最好的論調嗎？」

答：「意大利根本沒有反猶太主義，猶太種的意大利人，都顯得他們是好公民，在作戰時也十分勇敢。有許多還在大學、軍隊、銀行裏做領袖人物。還有許多做將軍的；如撒地尼亞的發令者莫登納 (Modena)，就是一位礮兵將領。」

問：「但避居在巴黎的意大利人，往往說你們不准猶太人進學院，因此反對你們。」

答：「這種反對是十分矛盾的。在我青年時代，沒有一個猶太人，有這種資格。現在塞塔 (Della Seta) 能算一個後補人；他很有學問，在意大利史前史界，可算是一個權

威。」

問：「假如你在這方面真被人冤枉，那末受冤枉的還不止你一人。例如在德國就有一種流行的話，說畢士麥和歌德都反對猶太人，偏見極深。法國人一遇到壞事，就毫不考慮地說這是「壞德國式」的。這話很可以用來指反猶太主義。」

墨氏反問：「你這是怎麼解釋呢？」

魯答：「在德國，一有壞事發生，總怪猶太人不是。現在我們的地位，真是壞透了！」

墨答：「哎，是的，這真是替死羊！」（按猶太之祭司，於形式上將人之罪加於羊頭，然後放諸荒野，即謂之替死羊。）

問：「那末，假使種族和政府形式與民族主義，都沒有關係，我們能說語言統一同它有關係嗎？古羅馬也同其他王國一樣，就是語言複雜的國家，即在近代歷史上，我也找不出什麼例子，說明語言複雜，可以危害國家。哈布斯堡王國是消滅了，但瑞士依然

健在。』

答：『我並不以為語言統一是十分必要的。奧國之所以消滅，並不因為語言複雜，而因為征服的民族太複雜，難使鎔於一爐，受一個君王的支配，如瑞士，雖有多種不同的語言，卻能自然結合，造成統一民族。瑞士在大戰時之所以能守中立，就因為有兩種語言；說法國話的人當然傾向法國，說德國話的人當然傾向德國，兩方勢力又均等，當然不致陷於一方。我認為瑞士是歐洲各國關係的重要關鍵，瑞士正因其語言複雜，倒可以成為兩大勁敵間的緩衝。』

問：『如果你不以語言複雜為意，我想你必不熱心於所謂大同語言吧？』

答：『大同語言已漸漸形成。本是遊戲式的技術，現在卻真能存在了。不過，世界語只使各國的文學，更有獨特性，試問沒有獨特的詩藝，這世界還成什麼？』

問：『不過，我在意大利，所見的矛盾真是累累。你在年輕時候，反對奧國政府，禁止波澄 (Bozen) 邊界的人用土語。說：『如果強迫我們用外國文字，我們誓以武力反

抗」。這種話出於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手筆，出於一個所謂國際人的手筆，只徒然表現國家精神十分濃厚。是的，我不得不問我自己，也不得不問你，現在的意大利，爲什麼並不比從前的奧國好一些？在這方面，你爲什麼不跨進二十世紀哩？」

答：「我當然跨進了二十世紀。現下提羅爾 (Tyrol) 的人，並不受壓迫。那地方有一萬八千是日耳曼人，斯拉夫移民也不少，所以，所謂純粹種族，根本不存在。我們教他們學拉丁文，是爲他們願爲意大利人的利益起見。況且他們依然有德文報，德文雜誌，德國戲場。我們並沒有一刀截斷他們的日爾曼系統。如果他們不在邊界，而在意大利中部，所受的限制還會更少。一種統一的語言，當然是國家權力的要素。許多政府都明白這一點，所以都竭力統一國語。」

問：「你這種口氣，還是十九世紀的論調。在戰前，德意志帝國在波蘭和亞爾薩斯 (Alsace) 的政策，同現在當地所行的德波政策，毫無分別。這許多當權者，從自己起就莫名其妙，也許現在還是莫名其妙。還有，在反面，你又要僑民保持祖國的國家精神，

這是怎麼說哩？你真以為現在僑居美國的意大利人，還得說意大利語嗎？我在芝加哥同一羣意大利人談過，他們人人卻都用英語。」

答：「你錯了。我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的僑民對僑居國忠心。如果他們能在物質精神兩方面，都是當地的好公民，那末他們就不錯，如果他們與當地的一切格格不入，就永遠只能算奴隸。自從我們主張同化政策，許多意大利人在國外已獲得了很高的地位。」

問：「你主張國家之間，並不因語言和種族不同，引起互相仇視的命運嗎？」

答：「命運！政治家只到失敗之後，才說什麼命運。」

問：「我覺得，國家主義的第四個原因，大概在於所謂「歷史的需要。」例如，你又一次向我說過一個什麼殖民地，原是屬於古羅馬的。」

答：「那只是一句話吧了。我說的是利比亞(Libya)，當時還沒有什麼居民。如果近代羅馬真要求古羅馬所殖民的地方，那麼葡萄牙，瑞士，格拉士哥(Glasgow)，班諾尼亞(Pannonia)，歐洲東、西、中各部，都應當歸還於意大利旗幟之下。」

問：『我覺得，法西斯主義似乎改變了意大利人的面目。我疑惑這到底是否應該慶賀的事。歌德說過，意大利人的面貌，比德國人的面貌，多顯出上帝塑人的手法。』

答：『這種改變，有一個根本的理由。我們的面貌，比從前緊張得多。活動意志能改變人的容貌；就是運動體育也可以改變人的外表。一個手藝人與在工廠裏作工的人不同，也就因為這個道理。』

問：『你的頭曾被人拿科利奧里（Colleoni）的頭比過。這比喻當然也同一般比喻一樣，只在某時可用。你們意大利人很知道軍隊的統領不是永遠為統領的。孟特凡爾忒里（Montefelure）還是一個思想家哩！』

答：『是的，帶兵的並不只是粗人。他一生中，也許有一次做過野獸。而大體上，這一些人還不及當時一般人野蠻，因為野蠻的是時代。』

問：『我剛才說的那個比喻你覺得歡喜嗎？』

慕索里尼只凝視着我，下顎特別伸出，不作答語。這時候，他的確很像科利奧里。

治人問題

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但是我們研究政治哲學的結果，曉得治人階級與治於人階級，兩者間的關係，不僅單純是經濟一端，而亦非全屬於勞心勞力的區別，實更有其重要的原因在。這就是治人者必須明瞭如何治人的方法，而被治者必須認清於何種範圍之內，才肯被治。今日舉世擾攘，迄無甯歲，其原因，未嘗不是由於治人者不知如何治人，被治者不肯安於被治，結果人人稱王，到處作亂。所以治人問題，可算是現代政治問題中最重要的的一個問題。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由這樣一個政治人物來討論，當然是不能以一般空談視之。我們只要讀到墨氏所云：「我從來使人與我接近，多川稱贊和勸誘，而非金錢或武力，但是我稱贊有度，決不濫用。」寥寥數語，就可以看出其對治人問題確曾下過一番深刻的研究功夫了。

百強附註。

問：「你得到政權之後，雖然得益不少，而你所受的損失，必定也很多。家庭團居的樂趣；每天辛苦之後，傍晚出去隨意散步的幸福，各種新鮮的刺激，各種難得的自由，你都失掉。同時還要時時顧到領袖人的地位，受到無處不為人注目的困難。有人告訴過我，你進了羅馬之後，立刻就說過：「一個人準備好之後，就可以從帳篷走進皇宮，要到需要的時候，才悄悄回到帳篷裏去。」話雖這樣說，一個四十餘歲的人，要突然改變生活習慣，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答：「我改變生活習慣，並不如你所說的那樣困難。我能繼續住在米蘭，當然很歡喜；但是羅馬這地方，我從前只偶爾來過幾次，對我的魔力着實不小。這歷史上的名地，本身就有一種魔力。最近十年來，我在羅馬工作，在羅馬居住，對於我思想上的供給很多。如果我要過常人的生活，我住的托羅尼亞別墅(Villa Torlonia)就有花園，供我游覽；我有一匹好馬，也可算是我自得政權以來，在私人生活方面，主要的一種享受。至於我的日常生活，實際改變得極少。我變得比從前更溫和，更歡喜吃蔬菜，並且很難

得喝酒。不過，這種習慣，也並不就是我呆板的生活規則，我還常勸人喝酒。至於所謂「社交」生活，我實在又怕又恨。我日裏同許多人經過一天的苦工之後，晚間大可以做許多別的事，不去參加社交生活，晚間我可以獨自做事，可以好好地安眠。我從來就是一個極有條理的人。在編輯報紙那時候，我的桌子，也同現在這張桌子一樣整潔，每一分鐘一秒鐘的生活，我都有事先的計劃，所以我可以盡量地多做事。」

問：「你眞是在描寫歌德式的生活。最近有一位羅馬公使對我說：「首相的日子，比我們還好過；他用不着插足社交界。我有他這種福分，必定可以多作許多事。」」

答：「我現在打算的生活，以永遠孤獨爲原則。否則我真過不慣。現在常使我痛苦的，就是對於環境感覺太敏。你在這方面說的很對，國家的情況，使政界人的生活變得十分狹窄。只因其爲國家之故！」

問：「眞奇怪，掌握政權，教一個人拋棄這許多東西嗎？」

答：「這也同熱情是一樣的道理。」

問：『那麼，革命的熱情，建設的熱情，到底那一種強烈呢？』

答：『兩種都很有趣，強不強，則看他委身於革命或建設的年齡若何。一個四五十歲的人，多半傾心於建設工作，尤其早年參加過革命的，更是這樣。』

問：『你在這方面，却與其他的人不同。例如畢士麥，就很像伊曼紐爾(Immanuel)，得到政權的時候，沒有你這樣早。他們的成功，多在作過許多大事業之後。但是，據你說，中年人的心理往往傾向建設，而現在法西斯蒂黨建設已有十年，仍繼續不斷地革命。這真使我想到了托羅斯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

答：『事實也許這樣，但理由却不同。我們需要倡導所謂不斷革命，因為不斷革命這幾個字。對於羣衆，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不但如此，就是對於一般知識較高的人，也有一種刺激。譬如我們一說不斷革命，意思就指這是一種特別時期，街上走的人，也可以發生一種感覺，覺得自己是這大運動中的一部份。事實上，我們已經開始建設。說到建設這方面，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我們有數千名熱烈的軍人，要使之化爲守秩序的好

公民。沒有軍人的幫助，革命當然也可以進行，但使軍人憎恨敵視，却怎麼也革命不起來。軍隊取中立態度，革命可以進行，軍隊取反對態度，革命就只好作罷。況且，我在頭一年，因為使黨的力量更集中，就開始裁除了一萬五千黨員。而到後來，我還是不能認真訓練一批精材，使散漫的力量，集中成爲有秩序的政府。」

問：「那末，你在這方面，到底是受什麼人阻擾呢？一般貴族是反動的嗎？」

答：「反動大多起於上層階級，但並不起於貴族。我們意大利的名門，却很安分守己。決不結黨成派，決不像普魯士的貴族黨，反而只一心希望與人民和好。例如，你可以看一看珂羅納王子 (Prince Colonna)，他就是同馬車夫談話，也十分親熱。」

問：「你是否對每一個人都能用得其所，是否只顧能力，不問資格呢？」

答：「我對於從前的同志們，如果他真有力量，就給他領袖的地位。我們不管什麼資格問題，不管他在前在後，不過在大致上，我們多重用青年。我很提拔些青年，給他們重要位置。我時常監視格蘭地 (Grandi) 斯德法尼 (Stefani)，凡爾披 (Volpi)，曾提利

(Gentile) 等人，常同他們隨意談話。看見他們能充分用自己的力量做事，我就覺得十分歡喜。」

問：「這種人，讓他們在高位置，反比做下層的事容易管理。但是，如果你手下有一個人，懷疑到另一人的信用時，你怎麼辦呢？一個辦事人到底忠不忠心你用什麼方法決定呢？你怎麼能不受他們的欺騙？怎麼能發現一個新辦事人的秘密呢？」

答：「這桌子面前，你坐的一張椅子對面，還有一把椅子。如果有兩個辦事人發生爭端，我就把他們叫來，各坐一張椅子，離我的遠近都一樣，然後叫他看着對面的人，把心中隱怨真實吐出。黨內或政府內任何一人，有了什麼嫌疑，如果事情不十分嚴重，我就給他一種機會，叫他親口當我的面辯明，如果事情比較嚴重，就叫他把辯詞理由全寫下來，我時常注意我人民的私人生活，研究他們的筆蹟，觀察他們的舉止容貌，某人是否可靠，就由此取決。我認爲總要靜心細聽，要公平取決，我永不改變這種信條。每有一個新人來，我第一椿問他的事，決不是他能怎樣幫我，想得什麼好處。」

問：『你怎樣使你自己不受謊報欺騙，怎麼防止人洩漏機密？』

答：『全國重要機關，大多選用可靠的法西斯蒂黨員。如果忠心不足以使他們好好辦事，還有畏懼心可以使他們可靠，因為他們都知道，自己是時時受人監視的。如果有洩漏機密的事，刑罰極嚴，不過我的重要文件，很少轉過許多手，所以這種事很難得發生。』

問：『但是，你用什麼方法，嚴防現世界一般最危險的人物——一般專門家呢？』

答：『至於對付一般專門家。我總是叫兩個意見相反的來，坐在這兩張椅子上，面對面呈述他們的計劃，一個專門的財政家，一個專門的軍事家，當着我這政府領袖的面前，當然會提出許多我不十分了解的問題，叫我取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就只有盡我的力量，考查這方面的問題。至於辦事外表，因為速度很大，所以成效極快。我掌握政權的頭一天，就徹底取消了一切官樣文章。』

他隨即遞過一件文書給我。

「你可以看看農民大臣的稟報，看看我叫他斟酌的批語。你知道我們辦事，握手就能了結嗎？我覺得這種羅馬式的禮貌最好，最合衛生，最經濟時間。」

問：「你接近一般人，到底是用榮譽，還是用金錢？用稱贊，還是用物質報酬？你身爲一國之首，在這報紙無出版自由的國家裏，能同全國的民心民意接近嗎？」

答：「我從來使人與我接近，多用稱贊和勸誘，非用金錢或武力。但是我稱贊有度，決不濫用，因爲稱贊固然是一種刺激，但極易消失作用。無論在那個國家，真情總是在一非之底。須用線錘到非底，才能探得非有多深。不過，我總不以爲新聞紙出版自由，就使人易於探得真情——或者可以說，沒有那一處真有報紙出版自由。現下徒有自由出版之名的新聞紙，後而無一不是受政治和經濟作用支配。我探求真情的來源很多：縣長、大臣、老百姓，人人都可以報告我。也許真情傳到我這兒很慢，但結果終是會傳來的。」

問：「全部都會傳來嗎？」

答：『世間誰也不會知道全部真情。但終有許多點，可以使人看到一個九分不差。此外，我還信任我的內察力，我名之爲「第六官」，這不能下定義說明。』

問：『有許多事情，都足以證明，真情慢慢傳到你的面前，已經經過了不少折扣。你說你手下人員的潔白，是國家生命的基礎。在俄國舞弊的原因却常常發現。像俄國那種公開審詢的辦法，你不以爲很好嗎？俄國計劃對於大臣的薪俸，盡量縮減——像柏拉圖的理想國的情形一樣，你覺得到底如何？』

答：『我們的大臣，每月的薪俸，只有三四千利耳，（意大利幣名，每一利耳，合美金〇・〇五元）數目比任何民主的國家都小。至於官員犯罪，刑罰却同俄國一樣嚴重，一樣公開。法西斯蒂黨員做錯了事，自己就會處治自己。勒各恩（Leghorn）的黨秘書，因爲侵吞公款，自己就把腦漿也敲出來。森·雷莫（San Remo）的縣長就在墓地自殺；納普斯（Naples）建築處的經理，就投河自盡。他們之所以尋死，只因爲怕我召他們來見我——還並沒有判他們的罪。至於我對於在民主國中所見的一切罪惡，我並不認爲

可以藉此罵民主政治。世間決沒有那一種政體，可以使人類的罪惡滅跡。」

問：「雖然你說你有綜合頭腦，我看你還是多富於分析方面，這種結合，並不是十分罕見的。所以，我以為你的思想，運用在對付反動的地方多。如果你自己做錯了事，你怎麼辦呢？還是老老實實公佈出來，然後自己努力改善呢？還是居心隱瞞，不任人知其為錯誤呢？你到底覺得那一種可取哩？畢士麥說過，環境有時會逼人到一個地步，使政治家竟敢於說：「明天要下雨」。如果他幸而猜對了，他立刻就被人認為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答：「我決不敢說我沒有錯誤。我也許會錯到十次二十次，但我總是全盤老老實實公佈出來。不管你再有如何銳利的眼光，透察反動的奸行，局面在環境的支配之下，總是不絕變化的。」

問：「那末，大致說，在這一方面，是你騙別人的多，還是別人騙你的地方多呢？」

答：「大凡東西都有一個永不明白的因子。就是這影子。」

問：「爲什麼甚至你也要用『無所謂不可能的事』這種公式呢？你知道的正多着呀！」

答：「如果對於一個懶惰的人，你不時時把這種話貫進他的腦裏去，他就會去打瞌睡，要做最簡單最容易的事，也會對自己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問：「但在我看來，這種方法，似乎只能由女人來施展。」

答：「決不是這樣的。女人對於強者，是施展不出什麼影響的。」

問：「你夜間如遇有重大事宜，是否起牀？」

答：「至於對於煩擾，我都用凍餓的方法避免。夜間要有噩耗，才許他們叫醒我；有喜訊，則可以等到明朝。我記得，十年當中，我夜間只起來過三次：一次是羅馬的郵政局被燒毀；一次是阿爾般尼亞（Albania）特務人員被害；一次是多魏格爾后（Queen

Dowager）病勢垂危。」

問：「你覺得自己某時在某種情況之下，會特別有能力嗎？」

答：「總在走動之際會。我在決定一樁事件之先，往往在房裏走來走去，達一、二

小時之久。我的思路，在晚間最活潑，尤其在半夜最靈敏。但真談得到有思想，又在什麼時間裏？在我這種地位的人，每星期至少總得發一次呆，往往一星期還不止一次。在這種時候，我學到的東西就最多。至於所謂感興，如果運氣好的話，一年也許會有一二次吧！」

獨裁制的危險性

獨裁就是專制的變相，所以獨裁者往往就被認爲皇帝的別名。本來皇帝並非個個是暴君，有漢靈、禮、災的唐太宗，亦有遇因而泣的夏禹王，所以問題的中心，不在於統治者本身的仁暴，而在於此種制度的好壞。獨裁者如列甯，如墨索里尼，如希特拉，其人格之高尙，生活之勤苦，實未可厚非，當然不是洋房汽車，嬌妻美妾，罔顧國民，惟圖私利的獨裁者所敢望其肩背。然而縱使獨裁者中，有墨索里尼，有列甯，有希特拉，但是我們仍不能不對於獨裁制，加以懷疑，正如皇帝中縱使有唐太宗，有夏禹王，而我們仍不能使專制政體綿延存在，具着同樣的理由。本文特就「獨裁制的危險性」一點，提出討論。

墨索里尼雖然對於「皇帝這個頭銜，迷過你沒有」的問題，表示「毫無興味」，但是我們總不能不懷疑到「獨裁制」是否會走上「皇帝」的道路上，抑且假設獨裁者本身確是值得受人擁護的領袖，然而繼起的獨

裁者，是否個個都是好人呢？設或不幸而有如夏樂，商討者，又將如何？又將如何？這是讀者應該注意的問題！

百強附註。

「自由！」墨索里尼很有韻律的低聲這樣說：「你既然時時拉到這兩個字，就讓我再告訴你，在我們這國家裏，個人並不缺乏自由。因為國家保護他，他是國家的一部分，所以他比一個孤獨的人更多自由。他這種個人並不是孤獨無助的。」

問：「在一九一九年時，你雖早已是法西斯蒂黨人，你對於採取西歐文明，仍說了幾句很重要的話，你說：「一個人的自由，非有麵包就能維持的精神自由；比列寧那方面高出許多的自由，普魯士下級官吏所知的自由——這種種自由，只是回到十一世紀的野蠻主義而已。」」

答：「現在我們却盡力謀自由的實現。」

問：「你要使人相信這句話，只有一種辦法。四年來備受指摘的你，如果能在這六年之後，恢復新聞紙的自由，批評言論的解放，你就可以使人信任這句話。」

答：「這一點我當然做得到，但做了也是沒用的，決不會使情形變好一絲一毫。我早已說過，現在各方面都還有鬥爭。」

問：「你是否常讀柏拉圖的書，對於柏拉圖的國家觀，覺得如何呢？」

答：「柏拉圖對於國家組織，早有所述，確實值得我們驚訝。你看吧！他的書上說：他把一國的戰士、教士、工人、比作人身的各器官；他說戰士是人手；教士是人腦，工人是人胃。」

問：「難道教士現在還是人腦嗎？」

答：「現在的社會，比柏拉圖那時，不知複雜了多少。」

問：「你這國家裏，有一樁事，你也許看不分明，局外的我們却早已見到。這就是人民對於挑撥是非者的恐怖。這一般人的活動，使人民覺得沒有保障，覺得憎恨的。」

答：「大凡一個國家裏，總須要一部分人被人憎恨。我們在這方面，的確很像俄國。但那位社會主義者約里(Jaurès)却在了一本書裏，斷定革命如須持續，必須採取廢防

手段。他更用這種道理，說明法國革命，當時有所謂「嫌疑紀律」的規定，大凡認為有嫌疑的人，就須判以罪名。此外，德人黑格爾（Hegel）也說這種人，是那一般不知國家究竟需要什麼的惡徒。」

問：『至於說到政治，我們可以把黑格爾當一個禮物，送給外國人，尤其是對於最歡喜談他的俄國人，我們更願意贈送。幾世紀以來，我們德國人對於獨裁制的經驗，真是十分豐富；從前一般無能的王侯，大多在不久以前，也還有一位畢士麥，做了二十八年的獨裁者。他下台之後，沒有造成後繼者，隨就發生了什麼事呢？大石是移開了，底下的小蟲兒，這才見了天日。』

答：『不過，使德國偉大的，總算是他，我這話大致還是從你的書裏引來的！』
（指魯氏的「畢士麥傳」。）

問：『一種無節制的專權，使我們害怕的，不在專權當時，倒在專權下台以後。你知道彭生（Bunsen）所說畢士麥如何嗎？他說畢士麥一面使德國偉大，一面使德國人愈渺

小。」

答：「這話也許不錯。」

問：「難道獨裁制是意大利的特效藥嗎？」

答：「也許是的。意大利從來就多出特殊人物。在羅馬，這可貴的羅馬，已行過七十多次的獨裁制了。」

問：「人不能長生不死，這何等不幸！（我想，大致是在一九二五年，）你生病那時候，你說道，一切都會發生問題，因為——你這地位，別人是代替不了的。」

答：「那是七年以前的事。此後我就時時訓練後繼者，試驗他們的能力。能作統治者的一等賢士，早已有不少；如格蘭地、巴爾波、波塔依（Poggi），阿爾平納梯（Arpinati）等人。不過不用說，歷史上的情勢，自然是決不會重演的；如果重演，就必定比前薄弱。一代一代，從神祕的變到了政治的，從敘事詩變到了散文。大凡一個人，具備有獨特的稟賦，當然能治理國家。但是，照我想，以後也許不會再有第二個「首領」

了；或者，假如他真這樣幹出來。意大利恐怕不會任他干休。」

問：「你記得，歌德說過：「天才總是無雙的」，——不過……那末，你以為建立朝代的辦法最安全吧？」

答：「當然的，這毫無問題，朝代遞嬗，新力漸生。皇帝雖死，皇朝永垂！」

問：「假使這話是真的，那末，尼梯（Nitche）在一九二〇年，想造成一個意大利共和國，自己做總統，後來終告失敗，你以為他這船身所觸礁石，乃是意大利人趨向君主的心理嗎？好幾世紀以來，我們德國相繼有不少皇朝出現，但一朝一朝，不出幾星期，就全數倒台。意大利的歷史更短，而且這許多共和國，皇朝勢難建立。」

答：「意大利只有一二處成立過共和國，而且為時極短。南方全部，數百年來，都由君主統治。克里斯庇（Crispi）同瑪志尼決裂時，寫過一封有名的信，信中說：「君主制使人民團結，民主政治却使人民分散。」」

問：「我們的皇帝，從來多用宗教信仰，以鞏固自己的王位。如威廉第二和非迪南

(Francis Ferdinand)，都相信神權至上之說，我想不到有那一位皇帝，不相信這種說法。』

答：『我就與你不同，現在的皇帝，即使是個懷疑派，也能治國。』

問：『皇帝這個頭銜，迷過你沒有？』

答：『這是我毫無興味的問題。』

問：『一九二五年時，議員退到神山，要組織共和國，你不是通緝他們嗎？』

答：『是的，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問：『而且，我覺得你似乎很衛護皇朝。有一次，皇朝不是也衛護你嗎？』

答：『是的，是的，你說的很對。我的確很衛護皇朝。單純以責任關係，我衛護皇朝；同時我還贊美皇帝。我不但當他是一個愛國者，他更是一個學問極高深的人物。皇朝方面，也的確以憲法保護我的統治。』

問：『聽你這樣說，彷彿世界上還有人人滿意的國家。但事實上，國內何以一般智

識階級，處處表示不滿。我這話，就指在意大利。指那許多反對你爲法西斯蒂首領的人。昨天我還接到一封信，這信如果你看見，定會大失所望。這封信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寫的。他說這時代少有什麼真理，自由則根本不存在。」

答：『這算是有學問的人！』

問：『你自己不是說過，法西斯蒂的國家，在替人民盡責任嗎？』

答：『如果有一定的方針去做，自然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問：『你的方針是拿破侖式的方針，我也不來反對。但與你同時的一般人，以及你的後代，會怎樣想呢？歷來千百萬的人，一直到現在，都用那殺恩真公爵 (Duke of Enghien) 的事，判斷拿破侖的爲人，你知道嗎？』

答：『這種判斷是不妥當的，殺恩真公爵這件事，只是拿破侖生活中極小的一片斷，不能誇大其說，看得太過重要。如果拿破侖一生大事，就只有殺這個人的一樁事，那末不用說，拿破侖大可受人痛罵。但如果不只看這樁事，他總得好一些。同樣，也不

能用殺凡爾辛格托里克斯 (Verjincorix) 一椿事，指摘該撒。當然，如果他一生中沒有幹過這種野蠻的事，他的生活史必會較此爲好，但因這一點的小節，就痛斥一個極偉大的人物，也未免矛盾。」

問：『有許多事，往往因專制政治而生。國家的權力，既集中在一人手裏，也許會發生許多事，出於專制者預料之外。我說這話，就想到刺殺馬提厄梯 (Mateotti) 的人。在獨裁的國家裏，你不以爲也會發生這種事嗎？』

答：『政治罪案，在民主國家，依然常常發生。你應記得在拿破侖第三統治下，那椿驚人的事件。法國自第三共和國建立以來，驚人的政治罪案，牽涉到許多當權者，真是層出不窮。即如少年德國的民主治下，在十年光景所發生的事件，我想比任何國家都多。』

墨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六四

法西斯蒂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運動，已經瀰漫全球了。仿效成功的，已有德意志，而在醜陋試驗中者，尙有許多國家。有人說將來的世界，不是共產黨的天下，就是法西斯蒂的領域，不入於「墨」，則入於「列」，但是不論是「共產」也好，是「法西」也好，總要經過一番的努力，一番的代價，才有成功的希望。關於研究共產主義施行的成績，年來已有幾種有系統的書籍問世，不佞亦曾由新聲通訊社出版「蘇俄最近實況」一書，可供爲參考之用，至於法西斯蒂運動的經過與其成績，則言者尙鮮。此其所以「法西斯蒂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一文，誠堪稱爲空前之作。墨氏在本文中，非但告訴我們法西斯黨所走的路，是需要暴力，犧牲與流血；並且也把這種運動，經過多少的艱難困苦，坦白地說出來。讀者不能輕易地視之爲一篇普通的記事，而要把牠當作奮鬥成功的「路綫」來看。

百強附註。

在某種情形之下，暴力也有一種道德的深刻意義。

在意大利，所謂領導革命的階級，不但未出現，並且未產生。自由派將所有的一切，都讓與社會黨了。我們沒有一個堅實的，現代的，國家的統一單位。

愚昧充滿了工人與農民羣衆的胸中。要想用好話，或用宗教式的勸告是無用的。最需要的就是一種合時的，懇切的，對英武的暴力的承認。這唯一的方法是「即以其人之道，而治其人之身。」

跟隨我們的人，都是明白戰爭的意義的。「意大利戰鬥之羣」*Italian Bundles of* *Italy*，就是他們組織成功的。有許多是從大學校出來的。他們因理想的鼓勵，離開了他們的學校來隨從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要勝利——推翻以往怯懦與奸滑的時代——我們所走的路是需要暴力，犧牲與流血的；我們必須建立社會秩序與紀律，這些都是羣衆所需要的，但我們總不能用乳水難融的宣傳方法，用言語——國會中與新聞界無聊的鬥爭。

我們開始我們的復活時代。雖然這時死傷遍地，但意大利再生的曙光，已在我們的前面了。

不幸的一九二一年，還來一個更不幸的結束——阜姆事件的解決。雷巴羅條約以後，阜姆成了一個獨立的地方，意大利在阜姆的反抗更是堅定了。丹農雪烏宣言，無論如何，他決不放棄這個地方，因為他爲要保守此地意大利人的清潔靈魂起見。

我也是置身於此事件中的一人。在此事開始的一天，丹農雪烏同我就是很好的朋友了。現在有一年多，我常常接到他很親切的信。這些信將阜姆的消息同感情都帶給我。在佔領此城的頭一天，丹農雪烏已經決意堅持到底。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四日的信上就可知道他將一個最勇敢的消息，供我在報上發表。

「我親愛的墨索里尼：

這裏有兩行很重要的急信。我工作很久了。我的手同眼睛都在痛。我叫我的兒子嘉不呂里諾 (Gabrielino) ——他是一個勇敢的人——送這稿子給你。你看有什麼需要修改

的地方沒有，謝謝你。這不過是我所要達到掙扎目的之第一步。假如報紙檢查太嚴，就請你將信發表，省略的地方以空白表示出來。這樣我們也就夠傳達我們的消息了。

「我還要給你寫信的。不久也許可以見到你。我對於這種善於應敵的堅毅有力的指導，十分欽佩。讓我握你的手。你的丹農雪烏。」

自七月到十二月，阜姆情形十分不佳。因為對付丹農雪烏的堅決的態度起見，基阿立地——他對於斯佛日所訂的雷巴羅條約十分忠實——決定封鎖此城。封鎖的結果似乎不甚佳；於是政府又決定以武力佔領此城。他們選定聖誕節，因為在這時候新聞界有兩天休假。意大利的兵士遣去攻擊意大利的城池，去打少數勇敢熱烈的意大利兵士。血染城市，尸橫街衢。全意大利因此都震怒了。

此後，雙方都有後悔的意思，而想彼此讓步。於是定了一個公式，丹農雪烏將他的權勢給與市民組織的委員會，他自己離開阜姆。他在此地執政已十六個月了。現在他將此地的命運交與本地人民。我在這時寫了一篇文章得了全意的同情。

「在一切文字的描寫之下，這次的事件可謂很完善；你也可以說是可怕，但確是完善的。在一方面是國家冷靜的理論堅決到極點；在另一方面是理想的熱烈的理論，豫備作一種至高至大的犧牲。假如請我們選擇，我們這不安的過慮的少數人，一定要很鎮靜的選擇後者。」

一九二一年正月四日，我作了一篇熱烈的文章，以紀念龍琪部隊之陣亡。這篇文章的結論是：

「他們在大戰中是犧牲到底，但他們之死是重於泰山。意大利的三色國旗在爲他們歡呼，意大利的國土掩蓋着他們。他們的墳墓等於一個神座。所有他們中間不同的政黨與支部都消滅了。由喀納羅（Carlinio）的死者可證明阜姆同意大利是全國統一的，他們具着同樣的血肉和同樣的靈魂。外交家的筆墨永不能消磨我們以血換來的事業。

「致敬於龍琪部隊，致敬於他們的將領丹農雪烏，並致敬於那些生還的同永不復還的戰士。」

「兵隊現駐紮在納瓦沙 (Navarra) 的雪山上。」

暴力的需要是我們已決定好的。我們每人都覺得如此。現在，我們清楚的意識與一定的方針的行動的時間到了。我所決定的小隊與戰鬥單位也組織成功了。我給他們正確的指導和工作的分配。他們起始訓練與復仇的工作。

我們的暴力帶些猛烈性。訓練得很忠心——像加里波的軍隊——並且有武士氣味。「意大利戰鬥的法西斯」的中央委員會是在我指導之下的，同時作省縣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工作與行動。有許多勇敢而又生氣勃勃的份子，是從學校出來的。這些學生離開他們學校，來過政治生活，來參加法西斯運動，意大利的學校，因此更爲尊榮了。一些孩子，一點也不後悔，一點也不搖動，離開他們快樂的生活，來過這種反抗賣國者的危險生活。後來，因爲這些年青勇敢的孩子，我吩咐制定一種榮譽獎章；他們犧牲了血來救他們的國家的。他們之中，有些意大利的模範青年，他們是充滿了魄力，以他們有紀律的有方法的行動去消滅共黨份子，使不致貽害人民。無論是激怒，搶掠、恐嚇、騷擾

等等都是法西斯蒂小隊的行動出來干涉。黑衫——艱苦的象徵——是我們戰鬥的制服。

自由民主政府時時妨礙我們的法西斯蒂運動。他們大體是依仗禦衛隊——一個盲目反對愛國運動的工具。但是我們以勇氣，方略，能力去抵抗這襲擊，陷阱與死亡。我們不但未入牢獄，我們等着審問，許久也無動靜。我對我的勇士有一種神祕的影響。他們視我是爲祖國復仇者。他們臨死時都說，『將我們的黑衫就作我們的殮衣。』他們死時還不忘他們的祖國與他們的領袖，這不能不叫人感動。愛與歡歌放葩了。意大利青年復活了，他們充滿勇敢，男性美，充滿對於那些不負責任者的恨怒，他們暴露社會黨恐懼的心理，他們清算自由黨的曖昧。在這復活時代，在我們國家精神恢復時代，戰爭的歌聲，民族覺醒的歌聲，處處高漲着。

我們的死傷是不可計算的。政府的人，共產黨，祕密社團都恐懼於法西斯蒂的興起。他們千方百計的想打倒我們，襲擊與陷阱一天一天的進步。在大街與田隴中每天都有血戰發生。星期日，假日，任何集會的時間，都有鬪爭發生。

我將我們用的暴力嚴厲的限制。我將這意思告訴我們的人。他們是服從我們的。他們時常想到被殺的同伴，但他們自願並且完全服從我的命令。假如我是希望的話，我能命令他們去死戰。他們正在追求機會；他們拿我的話就像他們的法律。

因為他們對於我這樣的親熱，我覺得十分奮發。我心中因此生出一種深的責任意識。我記得尼古拉佛斯加瑞伯爵 (Count Nicolo Foscarri)——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的死，他是被共產黨所刺的。經過了兩天的痛苦才斷氣。在他痛苦呻吟之中，類於絕命的時候，他將我的相片放在他身旁。他說他死得有價值；因為我，他才知道如何去死。在政治奮鬥中我是無情的。我不惜加以每種的戰鬥。我也知道內爭的痛苦；但是在政治危機之中，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在數月的暴力與行動之後，大見成效，所有以前五十年在國會中的損失，政治策略不清的損失，因為自私與個人的野心造成不幸的損失，政府不良的損失；我們差不多都補償了。

一九二二年在政府的掩護之下，我與我們的仇人訂了一個政治鬥爭休戰和約。社

會黨與自由派的無知是不可理解的，我的大量寬宏的態度，更使情形變得烏煙瘴氣了。這休戰條約是社會黨署名的，並不是共產黨。後者受前者的幫助，還是繼續鬭爭。要想和平是無用了。社會主義毀壞了意大利。在短期的休戰以後，對峙又開始了。這次是一九二一年大門爭的開始。

我不願將那時的傷痕都寫出來。那是已過去的事了。我們每個現在生存者的壁爐上都點上一盞長明燈，以紀念死者。一個法西斯黨人在每個時間與每種情形都是存在着的。在勝利不可期的時候，有許多就死去了，但公正的上帝將要領導已死者到永遠的光明中，並將酬報那些誓願為他們的信仰而犧牲的生存者。

一九二一年的頭一個月在波河流域有激烈的暴力發生。社會黨甚至在法西斯黨的喪葬中也要開鎗的。這種情形在羅馬也有。在這時，社會黨在賴角 (Leshorn) 開會。他們的黨從此分化了。自治的共產黨於是出生了，此黨以後在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上作了許多不良的事。我知道——雖然他們隱藏着，但是差不多每人都知道——這新共產黨是受莫

斯科的供給與指導的。我們也如別處一樣的被這種勢力侵入了。

在德里士德——一個每位意大利人都關心的地方，此處佈滿了熱誠與忠信的火焰——開了一個法西斯大會。爲首者是熱安達（Quintana），他是一個國會議員，而又是一個很勇敢的法西斯黨員。在各種情形之下，他有方法一方抗抵外人勢力的侵入，一方對付當局的愚笨行爲。該會是在羅西蒂（Roventi）劇場舉行的。我在此作了一篇演說。我將我們的根本原則說出來，這原則不單是法西斯蒂黨人所注意，而爲所有關心意大利政治的人所注意。在觀察了整個外交問題後，我要求將斯佛日同基阿立地所訂的雷巴羅條約撤回。我承認，在這時我們不能抵抗這個條約不幸的結果，因爲這是我們政治不良所致。我最後說：

這條約的過失，並不在談判者最後的失敗；在我們的國會中，在新聞界，甚至在大學校教授所作的書上——自然，在日喀不瑞亞（Zagabria）翻譯出來了——都是以爲達馬下不屬於意大利的。

達馬下這曲悲劇，完全因為無知，缺乏信念，愚昧所致。我們將用未來的努力改正這個錯誤。我們將要去研究，愛惜，保護意大利的達馬下。

『這條約已經簽訂了，但是不能免掉以下兩件事中之一件發生；發生外戰或國內暴動。但這兩件事都無甚意義。激起人民去反對經過五年血戰的和平條約，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人能作這不可思議的事。』

『在意大利鼓動革命，去參加大戰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九二一年的九月要鼓吹革命，去取消十分之九的意大利人所接受的已訂的和平條約——無論他的好壞——是想都不要想的。』

在將意大利及阜姆事件不穩定的狀況，及現在革命的必要失敗等情說完後，我立即將一九二一年法西斯蒂政治綱領，堅決的規定出來。

『依照這普通的原則，我們的鬭爭的法西斯，應當要求：

『(一)所有的和平條約，應再付審查，將那些不適合，或能引起仇恨與新的戰爭的

地方，都加以修正；

「(二) 阜姆與意大利經濟的歸併，同達馬下居住的意大利人的保護；

「(三) 發展本國的生產力，使意大利漸漸脫離歐洲各富國的拘束；

「(四) 對於奧，德，保加利亞，法，匈諸國，用一種尊嚴的態度，提出質問，同時

要求擔保我國南北邊界的安全；

「(五) 與遠東近東諸國，建立友誼的關係——在蘇俄治理之下者，亦包括在內；

「(六) 承認我國的殖民政策；

「(七) 改良並撤換駐外代表，這種人必須經過大學專門的訓練；

「(八) 利用經濟和文化的機關，及便利的交通，建立地中海與大西洋間的殖民地。」

我用熱烈的信仰，結束我這篇演說：

「這是注定的，羅馬將再成西歐文化的領袖地位。我們要將此種希望，傳與我們的

後代；我們要將意大利造成一個人類未來的歷史上，最重要的國家。」

一九二一年是但丁百年紀念。我以但丁的名義夢想到：『將來的意大利是自由，富足，快樂；海洋天空充滿着牠的艦隊與飛機；土地的出產也很大。』

後來，在蘭堡地的法西斯蒂大會中，我指出我們爭鬧的目標。我還告訴米蘭的朋友們，法西斯黨竭力預備一般人才，去作將來偉大的事業——使意大利成爲一個統治國家。

因爲我肯定的說辭，大家都在預備用合法的行動，與非法的行動，去奪取政權。

社會黨與共產黨，一方面彼此作理論上的辯論，一方面彼此爭先去反對法西斯。共產黨於此舉並不猶疑。他們一天一天的表示他們對於法律的輕蔑，表示他們對於仇人力量的漠視。

在佛羅倫斯一個愛國游行運動中，共黨又預備騷動。擲炸彈，追殺法西斯蒂黨人。當時一個很年青的法西斯黨人叫比達者（Borsa）被殺了。他是在阿爾諾（Arno）河的橋上被襲擊了，他被打成血餅，他們再將他從欄杆上，扔到水裏去。這個可憐的孩子，爲自

救起見，用他的手抓着欄杆，共產黨衝上前去，擊他的手，一直等到他血漿的手鬆了，身體落在阿爾諾河內，在水流中旋轉。

只是這件凶殘的事，就可證明共產黨的怒氣，是深入意大利了。但是，似乎他們以為這還不夠，安波里 (Empoli) 的屠殺又起了，此處有兩大車水兵同馬鎗隊。這些無辜者的尸身，就是共產黨凶殘的證據，他們對待這些不能動的尸體，就好像深林的野人對他們的無辜的尸身一樣。

這種事情並不是發生在一省之內。此時加沙爾，孟非雷士 (Casale Monferrato) 的屠殺又發生了。死者之中有兩位老沙地尼亞 (Gardinian) 的鼓手，和勇敢的同伴西沙馬雷德維琪 (Casale Maria de Vecchi) 也受傷了。在米蘭，法西斯蒂黨人單身出外，總是要暗地裏被人襲擊的。我們最親愛的黨員阿爾杜塞得 (Aldo Ceccarelli) 也被刺死了。

三月廿三日，發生了一件極端恐怖的事，其結果十分可怕。共產黨在地拿 (Dianna) 劇場放一炸彈。內中許多人都是來看歌舞劇的良善市民。二十人立即喪命。五十人因此

殘廢。全米蘭都在痛苦憤怒與敵愾之中。羣衆的公憤無法禁止了。法西斯蒂小戰隊第二次攻擊前進報館，將牠焚燒了。並且要攻打工會。但被軍隊所阻止。

我們的行動隊，在城廓外又開始活動，此地本來是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根據地，法西斯黨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將這些搗亂秩序的匪徒，趕出他們的巢穴。這時當局是毫無勢力的，他們不能制止任何騷亂。三月廿六日，我召集全蘭堡地的法西斯黨人，他們排列成隊，走過米蘭的大街市。這是一個不能忘記的有力的示威游行。後來城市生活的保護者，維持秩序者，都隨着我們游行。這時建設精神又復活起來了。地拿同法西斯蒂的無辜犧牲者，給了我們一種最善的鼓勵，全體民衆可在里士栗阿（Lithorio）之下，一致聯合起來，受意大利青年的指揮——他們曾奏過凱旋之歌，現在又要取得和平的精神，道德，紀律，工作與友愛等的酬報。此次爲地拿炸案而游行示威，是不能忘記的。自那天起，意大利的搗亂份子一天一天被消滅，被壓制下去了。他們好像鼠子被驅入小洞，他們都被困在工會與地方俱樂部之內。

我過的是一種非常緊張的工作生活。我一方要經營民報，每天早晨我要作政治論文，這樣，米蘭及其他各地的人，方能尋着我的政治路線。我以堅決的手腕，領導法西斯黨。我的命令是很嚴厲的。我探聽米蘭傳來關於各處組織的消息。我觀察我們敵人的行動。我要把持我們黨內一致的目標。我要維持組織內相當的自由，以適合活動的彈性。我不願我們如此清潔如此強壯的信仰，混淆或弄污了。我不願將我們法西斯蒂精靈——可愛的青年——與那般交易式或組合性，國會妥協式，自由派的假仁假義中的份子混雜。

在此複雜生活時候，我學飛行術的希望，仍舊未除。此時雖然十分緊張，每天早晨我騎着自由行車，往返十八哩去學飛行術。我的先生是熱塞伯賴達里（Giuseppe Radice）是一個很謙恭很勇敢的飛行家，他嗜好飛行，他很喜歡得有機會教我去作一個好的駕駛者。

某晨，我同賴達里一同坐飛機中。頭一次飛時並無意外事情發生。誰知第二次飛

時，我們正要往下落時，摩托機發生阻礙，飛機自離地四十米斜傾而下，將我直摔在田中了。駕駛者前額稍有微傷，我頭上也受傷數處，非兩星期不能痊癒。在田內施了一翻急救法後，我就到波達維納日亞(Porta Venezia)的喀地亞麥地加(Guardia Medico)經過醫士李納杜巴里栗(Leonardo Pallieri)一番醫治。這次的事情，我本有生命的危險，但經我私人醫生安不羅幾何斑達(Ambrogio Binda)的細心調度，得慶更生。

這次的事情給我一個機會，知道常時有許多人隨着我作飛行。差不多全國民衆都同情我此次的舉動，我因受傷休息數日，立即到報館視事，因為我知道國人現在很注意我的活動。

在地拿炸案發生那一天，羣情憤激，那時波安比諾(Piombino)地方的無政府主義者派遣馬西(Masi)到米蘭來謀害我的性命。他來到我的寓所，按着門鈴，很勇敢的走上我的樓梯。我的形貌奇異。當時是我的女兒愛達替他開門。

這位不知姓名的人要見我。他被送到我報館去，但是他只在佛羅邦拿巴特(Foro

Bonaparte)的公共廣場等我。當他看見我時，他起初很快的走到我跟前，後來慢慢的搖動起來了。他用顫動的聲音問我是否是墨素里尼，我說是的，他說他要同我談談。

這個人奇異的行動，我想他一定是個瘋子。我告訴他我不在街上接待客人，我說我准在報館等着他，他半點鐘之後來了，要求見我。我立即答應。馬西——我是一個很年青的人，眼睛似乎在燃燒着的——見了我有點進退維谷的樣子，他說他要同我說話。他的行動十分奇特，我叫他立即告訴我他所想說的話。

在一陣猶豫之後，他告訴我在波安比諾的無政府主義中，抽籤以手鎗謀殺我，他抽着了。後來，經過一番猶疑，他決定將所有的事都告訴我，並且將謀害我的武器也交給我，由我處置他，我盡心的聽他，但我不說一句話。

我將手鎗取過來，立刻與我報館經理桑特里亞(Sant Elia)打電話，將這不幸的人交托他——他是被無政府主義者所困，而又被他夢想的結果所嚇。我要桑特里亞伴他到德里士德去，並寫封信介紹他到法西斯黨人熱安達那兒去。後來，當他走後，警察不知

如何又捉着波安比諾的無政府主義者了。這件事是米蘭暗探在這時作的最好的工作。在地拿炸案發生了兩個月之後，他們都不能找出放炸藥的人是誰。

啊！不知有多少人正在想謀殺我呢。但是愛總比恨要偉大些。我時常覺得有一種勢力克服了事實，克服了人類。

基阿立地這時在國會中的情形很困難。在政治的水平線上又發現一個大的星座——法西斯蒂。因為這個原故，他以為此時正是用國會選舉去度量各政黨的實力之候，他於是宣佈五月選舉。

在一番討論之後，各派加入競選的政黨，因為要抵抗共產主義起見，決定連合成一個整個的選舉團體，此團體名為國民團(National Bloc)。

這個團體的中心——唯一有激發性的，有鼓動力量的——是法西斯黨。其他別的政黨是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破壞者。社會黨因共產黨的分化，勢力也非常薄弱，宗教性質的國民黨是單獨行動，牠完全依靠各鄉村的牧師等的活動。

爲使我自己熟悉我們黨的實力起見，我開始視察各省，我四月在波郎納——社會主義的防地，波河流域的重鎮——受了熱烈的歡迎，他們以歡呼，游行，吹喇叭，演說等來歡迎我。阿居西阿的屠殺還在他們腦中。法西斯黨這時在熱烈的感情之下；我這次來，自然不難激起青年人的堅強的意志，及希望與信仰。

自波郎納到法雷雷——又是一個社會主義根據地。此處我又見着他們有力的示威運動。波郎納同法雷雷是兩個很大很富麗堂皇的城市，牠是我國農業的唯一中心。在當時，用我的幼稚的眼光與熟知學識，我看出此地工人的心靈，思想，及希望恢復秩序的心。我知道他們失掉了中心思想，但並未受紅色宣傳的支配。總而言之，他們的心靈是聰明而值得嘉許的，在這時局不定的時候，是意大利命運的堡壘。

選舉競爭直到一月後才止。在這時候，我只演說三次——在波郎納，法雷雷，米蘭三處各一次，正與一九一九年的選舉相反。我們不但在米蘭得了大多數擁護。在波郎納，法雷雷也成功了。此項消息傳出以後，各處舉行游行，以表示快樂。其他各參加選舉的

法西斯黨人都皆得勢。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選舉我的票數不過四千。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票實增至十七萬八千。我被選入國會的消息傳出後，我的朋友，我的同僚，及我手下的人都表示快樂。

我記得一九一九年失敗後，我告訴我的副編輯等——如熱里尼（Giulini）甘尼（Gani）羅加（Roca）莫略尼（Margagni）等——我不出兩年，我必雪此恥。預言現在實現了。在民衆的各階級中，佈滿了一種新的氣象。雖然在國會中的法西斯黨人不多，但在意大利的命運中，他們表示了很大的力量。

在孟特西土里阿（Montecitorio），在國會中的法西斯黨人，依着會規，組織黨團。人數只有三十五。在數目上雖然很少，但都是肝膽照人的份子。

在開會期間，我說的話並不多。我想我只說了五次。我竭力使我的演辭中充滿精神，力求實際。我總不說出乎我們國民福利的話。我將歷來國會政客所耍的把戲都拋棄了。

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演辭中，我不客氣的批評基阿立地內閣的外交政策。

我將關於意大利北部愛地日 (Aldige) 的問題，實際的提出來。我將政府及在此數省執政者的弱點都指摘出來。克里達羅 (Crodaro) —— 負責人之一 —— 是被假自由主義的「不朽規範的政治工具所束縛了」—— 這就是說他被控制於那時意大利一種帶有國際思想性的秘密團體。於是，我肯定的說：因為基阿立地政府既是對於沙拉達 (Salda) 同克里達羅在上愛地日的政府是負責人。我現提議否決他。我們對此處德國代表宣稱，我們現在在不瑞尼界，我們誓必死守此處。』我再將阜姆同達馬下的熱烈的理智的問題提起。我竭力的攻擊斯佛日的可恥的外交政策，那種政策是使我國趨於屈服與毀滅的。

我又說到我們的內政。我將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假面具揭開，讓他們來反對法西斯蒂。我以譏諷的口調提出共黨領袖喀雷日亞得 (Graziadei) 當他是社會改良派時，就是我的敵人，我暴驟一般加入黨派活動的人，他們並無理論，只是為小小的權力與個人的利益。

我這演辭的目的是給與法西斯黨以破壞敵人的政治理論與方法的政治行動的一種暗示。出乎我意料之外，牠給了一個很深的印象。在國會之外也得了響應，最終，基阿立地內閣下台，他也像別人一樣，糊裏糊塗下台了。

此次在國會中的掙扎並不是我一個人。我們的黨團竭力幫助我。下議員非得若尼 (Federzoni) —— 後來是法西斯意大利的重要人物 —— 這時開始審查基阿立地內閣的外交總長斯佛日所辦的工作，尤其對於亞德里亞海軍的政策。開了許多很重要的會議，但按照法西斯蒂的意思與理論去嚴格檢查外交總長所辦的案件，即國會所同意的一切公私談判條約都經過一番檢查。

經過國會中的變動，基阿立地內閣終竟倒了，波腦米 (Bonomi) 繼任。他原是社會黨。後來因某種原因，成了一個民主政治者。他在國內保持和平主義。他對於法西斯黨與社會黨的休戰十分注意 —— 這次休戰的結果前面已經述過。在波腦米正打算發展他的政治的時候，沙爾日納 (Sarzina) 的慘殺事件發生了。法西斯黨死十八人，接着莫得納

(Modena)的屠殺又起，御衛隊開槍射擊法西斯黨人，死十人，受傷多人。內政還無頭緒，簡直不能說是有安定的希望。我經常地發動着我的工作，一方面擔任黨的領袖，同時又是新聞家和政治家。

我與西哥地斯克日斯(Cicotti Scozzese)發生了決鬥——他是一個低職的新聞記者。他是近於意大利的秘密社團派。他除了別的毛病之外，還有身體上的怯懦。我們的決鬥證明他是如此的。在數回之後，醫生便阻止我們的交戰，因為我的仇人忽然有心病了。換言之，就是他駭怕。不久，我與副官巴斯日阿(Mayor Basoglio)因在國會中口角，又決鬥一次。

我相信我具有些劍術家的長處——至少我是有勇氣的，因為這兩樣，我在此刻的時候總是佔上手。在這些戰鬥中是有武士性質的，所以我竭力的注意我的態度。

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我在羅馬召集一個全意法西斯會議，此時是法西斯黨由頭一期在野的政治活動性質而轉入一個新形態，在這新形態之中，我們的政黨——用堅強的政

治堡壘與日漸增長的中央與地方組織而造成的——應使牠結晶。

「意大利的法西斯」是被一種激急的精神所激起的。牠可以說是一種戰爭的組織，不能說是一種黨的組織。我們現在是在第二期，我們預備繼舊政黨去指導公共事業。在奧格斯塔 (Augustino) 會中——奧格斯塔的墳場，現在是羅馬的音樂會場——大家共同要成立一個新政黨。在此會中我們決定了我們的組織與黨綱。

那是一個可紀念的會，因的黨員與討論爽快的原故，牠將法西斯蒂精神都表現出來了。「意大利戰鬥的法西斯」現在變成「法西斯蒂國家政黨」了，此黨在各處有省組織與較小法西斯蒂區，在牠們之上，有最高會議，我要借此機會將我黨的個人性質去掉，以前法西斯黨因我的意志的薰陶，是有這種毛病的。但是我愈是想要各黨部有自治力，我愈要出一種事實，就是：假如我的黨離開我的指揮，我的領導，我的鼓勵與扶助，則牠必不至發展，同時也不會勝利。

羅馬會議正是表示我們法西斯黨的基本力量。特別是我個人的力量。但是有幾件不

快的事件發生。有些人因此被殺了。羅馬的工人區對我們是仇視的。因此次的會議是法西斯黨的發展表示，在散會後，所有的法西斯黨人排列成隊。經過羅馬的街市。這使得每個人注意法西斯黨，牠是成了一個政黨，並且是一個具有戰爭及保護的心志和手段。

波腦米內閣在此萬難之中發展他們的和平政策。這時各方情形更壞。一九二一年的難關使每個政治家都要戰慄。在天邊上，似乎有一線光明，但是天還是被烏雲遮住的。

在這光明未見之前，又發生了經濟界的困難，此事使全意都在憂愁之中。這事就是「意大利國家銀行」的關閉，南意的無產階級受影響更大，因為他們的儲蓄多存在這個銀行的。這個大銀行是戰時創辦的，在戰爭期間於我們的實力幫助不少，但在戰後，牠不能擔負牠的任務。於是這雄大的銀行——南意與上意的工人十分注意於此——破碎了，應響於所有意大利戰後的財政問題，引起一種不幸與失敗的意識。無知？愚蠢？過失？輕浮：誰知道那一種原故造成這種情形？

我們的債權與再新的資格，同別國比起來是更不如了。內政的不修，又加上經濟的

困。難。世。人。都。看。見。了。

在財政紛飛的討論之中，法西斯黨獨具卓見。牠並不去考慮過去的，只是爲意大利去決定一個健全的有先見的幣制政策。

我頭次遇着財政問題。

這對於我好像一個新飛機——並且在此找不着一個有能力的指導者。

羅素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九二

法西斯蒂國家與其將來

現代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計有兩個。一是老前輩的意大利，一是新進的德意志。意大利受法西斯蒂洗禮，迄今已十有餘年其工作如何，其成績如何，以及其前途的希望，與未來的發展，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研究法西斯主義的人們，所急欲知道的，而且不可不知道的。職是之故，法西斯蒂國家與其將來這一篇文章，只就其題目看來，已經足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了，而況寫這篇文章的筆者，又是法西斯主義創造者的墨索里尼，其價值更不待言。我們只要看他文中所云，關於改革教育，掃除往昔以學位及學校作遺身之階的積習；整頓軍旅，使其成爲國家有價值的保障，不隨意侵犯他人，而同時亦不許被人侵犯；努力建設，發展交通公用各種事業的計劃；都有積極的價值和需要。至於其他有關於政治，經濟，宗教，法律，以及勞資糾紛等問題，亦各有其長處，確是值得一讀的文章。

百強附註。

在法西斯蒂文化革新與實驗之中，有一個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這個問題就是國家的社團的組織。

在未討論此問題之前，我必須聲明，這個組織的階段極長，我的研究，分析，討論，無所不用其極。而在種種經驗與嘗試之中，又包含了許多的教訓。

這種經驗好像是一個航海的經驗。第一，我們必須記着，組織這種社團的目的，並不在乎產生一些法律上的組織；在我的意思，這些社團的組織，是迎合意大利特殊情形的需要，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有一種經濟的限制，並且工作與生產還未因經驗及充分的時間而發達。意大利，在政治復興的前五十年，各種武裝階級彼此對抗，他們的目的不但是要政治的權力，並且爲我們有限的富源而奮鬥，而這種富源實在不足以使工作與生產的關係人分配。

與統治階級對立的階級——因爲易於備考的原故——我就稱之爲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因爲受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不斷的與統治階級鬥爭。

每年都有同盟罷工發生；每年，肥沃的波河流域都有不絕的騷動，影響了收穫與生產。與我們同胞所應盡的責任而對抗那建立的和諧的意識的，就是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所煽動的各階級日常利益的鬥爭，這鬥爭是反對中等階級的，而中等階級又堅持他們反抗的地位，及期待救世主的降臨。公民生活並未進展一步。

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既無天然的富源，一半的土地又差不多都是山地，所以不能有多大的經濟能力。假如我們的人民，仍舊彼此吵鬧不安，假如各階級彼此希望消滅敵人，則我們市民生活，將永不能達到一種規律，而發展成爲近代的民族。自由派與民主派，每年——差不多每季——都在某一個地方聚會，喊出一個口號：「既不反動，又不革命。」——似乎這句話有一種確切的，無論如何，含有某種的意義在內！

現在的情形必須要突出卑污的，部落性質的階級競爭的習慣。在大戰後，又跟着列寧不良的宣傳，人們的惡意識，已佔了大多數了。騷動與罷工的結果，總是戰爭，以致弄得死傷枕藉。當工人們恢復工作的時候，他們心中充滿着反對廠主的憤恨，無論對與

不對，他們都以爲廠主是比世界任何中等階級還缺乏見識。在農民與新興的城市的工業階級間，也有一種明確的誤會的現象。所有我們的生活，都被政治的煽惑所支配了。每一個人都傾向於容忍羣衆的暴亂，假裝着了解牠並且對他們讓步。但是當每次騷動以後，某種環境又容許第二次的騷動發生，甚至比前次更厲害的衝突。

在我的意思說來，我們必須造出一種政治空氣，使得政府人員，有膽量去說熱烈的真話，去肯定自己的權利——假如政府付之以這種責任時，只有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才能用水乳相投的手段，他們在國會中也曾想盡了方法，領導這些騷動的羣衆，都是工廠工人，鐵路工人，郵務工人及其他搗亂份子。但是，以前政府的威信，好像一個死貓。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只憐恤與容忍，都可造下一種罪惡。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雖然每次都盡職，但是牠們都不能將意大利各階級的權利與責任認識清楚，分配妥當。法西斯主義對於這一步，就作到了。

事實是這樣的，五年努力的工作，在各種重要性質中，已將意大利的經濟生活，政

治生活，道德生活轉變了。讓我再聲明一下，我所施行的紀律，並不是強迫的紀律；牠既不根據於成見，又不屈服於任何派別與階級的自私利益。我們的紀律只有一種見解，一種目的——意大利的聲譽與福利。

我所施行的紀律是一種啓發人心的紀律，下等階級，因為他們的數目很大，並且最需要關心，故我常常盡我做領袖的責任，將他們放在心的深處。我看見鄉下人的時候，我就不由得不想到國家對於這般手足胼胝的人所應盡的責任。意大利的中等階級——農民階級包含在內——是比較一般人所傳說的好些。種種問題都是由於種種不同的經濟利益的衝突而發生的，這樣衝突使得生產團體不能聯合起來。沒有一個意大利的生產團體是社會主義所說的「吸血鬼」。現在國家對於不同階級的利益，不再模糊不清了。國家不但盡力免去衝突，並且還有衝突的原因。因為統計同研究學問的幫助，現在我們能詳示將來的生產。同時，因為中央及各處地方政府的幫助，我們正確的知道將來生產計劃的大綱。

最要緊的，就是我希望法西斯蒂政府特別注意社會立法，這些社會立法對於我們國
際的工業計劃，對於將來擔負發展工業的工人，都有很大的關係。我以為意大利已進步
到超過歐洲一般的國家之上了；在事實上說起來，我們已經批准了八小時工作的規定，
及強制保險，童工女工的限止，工作後的消遣，成年工人教育，及肺病保險等等。由此
種種看來，我是站在工人一方面的。凡不傷害我們經濟基礎的事，我都開始去作，自工
業保險到疾病保險，自年老養老金到軍事服務的限制，所有關於社會福利——凡是研究
出來時，於我們經濟有益，或於社會快樂有關的事——我無一不作。我希望給與每人一
個機會，去體會工作不是一種痛苦的需要，而是生命中的快樂。但是這種複雜的工作，
都不能與社團制度的創造比較。後者的工作，是沒有一件能與他比擬的。

一九二三年，在我進軍羅馬數月之後，我堅持要批准八小時工作的條例。一切的羣
衆在法西斯蒂社會立法中找着了朋友，他們一致贊成國家性質的工團主義。我們將往昔
職業式的工團，改爲法西斯蒂社團方式。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一個集會中，我

說國內的和平，是政府最要緊的工作。政府有一個很清楚的行動綱領，公共治安，不能假任何原因加以擾亂。這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但是還有經濟方面的，這就是合作主義。還有其他的問題，如同關於出口貨之類。我要用種種原則以促進意大利的工業。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工業的自私性——不合作性太重了。舊的制度與方法，必須一齊廢除。」

我再往下說：「在人類與法律的利益衝突之上，還有一個政府；政府處於適當的地位，以觀察全國的福利，不能以任何個人的意思為移轉；政府是在任何個人之上，因此不但要從事於現時的國家的司法的是非，並且還要顧及將來。政府表示牠對於國家生產力的尊重。在這種原則之下的政府，每人都應該對之服從。政府應作的事務，而必須予以實施的，就是堅決保障全國道德的和物質的利益。」

舊時勞工組織與社團，逐漸廢除。我們將慢慢實行社團觀念。我不希望將工人們的假日減少一天，所以我將外國性質而又是社會主義國際性質的五月一日改到羅馬生日四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在意大利生活中，是很榮耀的一天。羅馬是世界法典的發源地，羅

馬法直到如今還是統治着公民的關係。要慶祝勞工節，我以為這是最好的一天。

因為我要使法西斯蒂及社團法令在複雜情形之下實行，所以我召集了一個會議，批准一種文件，我立刻將此文件宣布，並承認他是有歷史上的價值，此項文件就是所謂「勞動憲章。」

該憲章共分三十段，每段都具根本的真理，自最重要的生產的事，推演到出產物平均的分配，勞資衝突法庭的評判，保護法的需要等等。

所有意大利各階級的人，都歡迎這憲章。勞工團體的辦事員在他們的神聖的職務上，比較唱高調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共產主義等，在雲霧中朦朧的希望，是能代表一種強壯國家中的東西，建設與實行，是法西斯主義的事業。所有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對於此項新改革，都十分驚奇與納悶。法西斯主義不是任何一個階級的保護者，而是全意大利人互相關係的規定者。這個「勞動憲章」就是法西斯蒂政策的證據，並且引起世界各國研究勞動問題者的注意。這「勞動憲章」是法西斯意大利的新憲法中

的重要部分。

因爲「勞動憲章」與社會立法勞動團體的結果，組織社團是必要的了。在這種組織之下，所有的國家生產的團體都集中了。所有的複雜工作，在他們的範圍之內，無論是勞心的，或是勞力的，都需要保障與培養，在法西斯蒂國家中，每一個市民不再是一個自私的，不是一個有反社會，反集團的法令的個人。法西斯蒂國家用社團法人法的觀念，將人們與他們的能力，放在生產工作中，並且我將他們應盡的責任義務解釋出來。

在這種新觀念之中，很合理地產生出我們的代表制度，市民之所以有價值者，原是由於他的生產力，他的工作，同他的思想，並不僅僅是因爲他已經二十一歲而握有選舉權了。

社團法人法制度的國家，所有的國家的活動，都反映出來了。工團的組織，形成新組織的一部，也是很合乎理論的。因爲新政治與社會的實現所造成的這種需要，就產生了國家政治代表的改良。不但政府的新官員，依着能力與所代表的人民，選舉他們爲後

補者，而這些新官員是經過法西斯蒂大會（Grand Fascist Council）的選舉與批判的，此會的目的在產生一個最美好的，最穩固的，最有代表性質的，最有專門學識的政府負責者。

我們解決了許多重大的問題；又剷除了所有經驗的騷動，不安與疑惑，凡此種種，都足以破壞我們的人民的心靈。我們給國家工作以一種法律及保障；在各階級的合作中，我們發現了我們的能力與將來的勢力，我們不消耗時間於無味的爭訐與衝突中，因為那些都是煩擾精神與破壞我們的經濟力與團結力的，我們認為衝突是富者的奢侈品。我們必須保留我們的力量。工作是生產的唯一力量，所以在我們國會中，這種工作份子，是不多見的，因此我們的國會，可算是操持全意人的生命的舵工。同時，資本並未如俄國的夢想那樣被消滅了，而我們還以為牠在生產中的地位漸漸更重要了。

在我的自傳中，我已數次聲明，我希望將我的政治生活織成一個有生機的而且一致的，我不希望對於意大利生活只描一些外觀的東西；我希望深深地影響到牠的精神。我

的工作是根據於事實，和意大利人民的實際情形；由這些真實的活動，我得了許多教訓。最終，我成就了一種有用的和現代的結論，這就是我們國家將來的基礎。

我所鼓勵而又十分注意的改革之一，就是學校的改組。這種改革名曰「日地爾改革 (Genile Reform)」——此名由教育部長而來，他是我進軍羅馬以後委任的。教育問題的重大，是不能逃出關心民運的政治家。我們必須十分重視學校。公立學校，中等學校，大學，都影響人民生活的傾向——無論是道德的，經濟的。我最初就注意此項問題。或許因為我以前曾作過教師，故我對於青年人及他們的發展，特別感覺興趣。在意大利，文化本是較高的，但是因為缺乏經費，而尤其缺乏精神的原故，故公立學校也就江河日下了。

雖然文盲的百分數漸漸減少，有的地方——特別皮德孟——甚至沒有不識字的人，但是人民並未由學校得着教育的相當教化的根基——身體上的，知識上的，道德上的。中等學校是擁擠了，因為只要經過形式上的種種考試，無論誰都能進來，甚至那些不應

入中等學校的。我們缺乏選擇法的知識測驗，又不能將個人依照職業與教育來分析，如同磨子繼續的轉動，磨出一樣的傢伙，最後再在各處了結他們的一生。這般死人將公共服務的功能都減低了。至於大學呢，也造成一般木偶似的所謂「自由藝術」的律師與醫生。

在這時候，這關係全國精神生活的教育制度，應革新成爲一個正確的，精密的，有生機的組織。我們將中等學校不良份子，都排斥出去，並將我們歷史上，世傳的寬宏的文學美術的潮流，灌入公立學校內。結果，在教育界施行新紀律是必需的——每一個人都要服從這紀律，教師是頭一個應該如此。

我們要知道，意大利教師的薪俸非常之低，這個問題我一俟我們國家的預算案解決了，就可應付的。我不肯使教育受經濟困難的待遇。吝嗇的政策是由於以前自由的民主政府而來。這樣，使教員有所假口對於他們的責任，漠不相關，並且被不正的思想侵入，甚至反對國家。不良的情形到了最高點時，有的教員扔下他們的位置而逃，這種情

形，不但在初級學校是如此，就是在大學也是如此。

法西斯主義以紀律來阻止這種情形，這紀律無論高級與低級學校都要遵守，尤其是那些負責指導學生去嚴守秩序和紀律，並維持人類服務的最高觀念的人，應該遵守。

在以前我們曾經有一個教育法，牠是由加斯蒂(Oggetti)而來的，成於一八五九年，其間經過古比諾(Coppino)但尼阿(Dareo)，克利達諾(Kredaro)等人的修改，但是牠的基礎尙未變更，經過我們黨的熱忱，重新加以改革；我們加上教授法與道德的觀念在內；我們將新意大利的重生的精神，灌注在內。偉大的思想與偉大的革命，造成那解決許多問題的正當時機。拖延多年的教育問題，現在也得着解決了。此處不能詳說如何的改良。但是，我可將我與教育部長商定的根本原則，附此一說。總括爲以下幾點來說：

第一點，國立學校只爲那些有資格者而設的，凡不得入國立學校者，可入其他學校。這一條將以前民主的觀念，以爲國立學校，是爲每人而設的思想推翻——那種情形好像將寶物與廢物，放在一個籃子裏。中等階級，以爲學校只是一個服務地方，所以也

不對之尊敬。他們希望學校愈寬縱，他們就可以很快的達到他們功利的目的——以學位及學校作進身之階。

第二點，在國家考試時，國立學校學生與私立學校學生，均享同等的待遇，考試是由國家指定的委員會執行之。

這一條是與英國同樣的鼓勵私立學校。對於天主教會設立的學校，很有益處，但是使舊式的反教會的人，十分不高興。我以為這能使國立教育以外的求學機關自由發展。

第三點，國家十分注意私立學校，並激起國立學校與私立學校的競爭，以提高文化程度，並增進一般學校的文化空氣。

國家司法權並不因此種私立學校而損傷，反之，牠監視所有的學校。

第四點，中等學校的入學許可，必須經過考試，學校要使人向文化那方面走，並且將以前民治學校的擾亂情形及苟且的態度除去。

因為以上的幾條及其他的改良，初級學校於是有兩個絕不相同而又互相扶持的目

的。一方面預備進中等學校，一方面牠自己又完成普通教育的一種高等法式。中等學校又擴充以下各機關：

(甲)補習學校——由以前的專門學校改設，一方面是有完全新訂的課程。

(乙)高等專門學校——求高深的專門學識。

(丙)大學科學預備學校——較專門學校稍高，代替以前的「近代預備學校」，及高等專門學校的數理部，並預備升入大學理科的科程。

(丁)教師專門學校——一個純粹的人文及哲學的學校，代替以前補習學校同師範學校。

(戊)女子高級學校——一個普通文化學校，自成一種完全的學制。

(己)大學文學預備學校——與以前並無多大改變，不過增加了一些文學美術性質的課程；牠的目的也是預備進大學各部的。進大學之先，必有入學試驗。中等學校，大學科學預備學校，文學預備學校的結束考試，統名之曰準備試驗；所有的課程都加以改

革，以期適合近世文化。所有的學校都有拉丁文，除了補習學校同中小學的宗教科之外。

這些學校有一個很要緊的法規，要實行的，就是每一種學校，必成一個單位有機體，班數與學生都有一定，備取學生可以經過考試，漸次插入；凡不得入以上之學校者，可入私立學校。

這次改革的實行，將以前人民的舊興趣，舊思想，尤其是功利主義的精神都推翻了，這樣免不了引起一些惡感。而反對派報紙利用牠以爲攻擊的目標——特別是塞拉導報；但是這次改革在我指導之下，努力進行，並且是我們意大利教育與文化復活的開始。

大學的改良與中小學的改良同時進行。其目的在將大學生分往不同的學院中，以免學校無謂的重複，凡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學生入學試驗，都由國家舉行。即非國家委派之人——與大學行政委員會有關之人員——所立之學院，亦被改革，其委任將不再屬於各部私自執行，而由於羅馬的中央委員會委派之。

某次，在法西斯蒂大學代表會派人來見我時，我對他們宣言「日地爾改革」是我所決定的方案中的最革命的一種改革，因為牠將自一八五九年以來的情形，完全改變了。

我的母親是一個女教師；我自己也曾經在初等及中等學校教過書，所以我自己懂得教育問題。因為這樣，所以我必定要使牠有一個具體的結案。意大利的學校不久又要在世界上站着相當的地位了。自我們的大學講座，自我們的科學家和詩人的抬頭，意大利的思想又要重放光明了，同時中等學校是為人民預備專門及行政人材，而公立學校是為民衆的公民教育，與公共道德締造根基。

我已經決定，借各大學的合作，將法西斯蒂經濟部門，法人法部門同其他有關於法西斯蒂文化的機關，都建造好。這純學者的，純專門學識的世界，被法西斯主義所浸潤了，法西斯主義用實際的，理論的，精神的，經驗的熱忱及複雜的行動，以創造新文化。

比法西斯蒂大學還使我注意的，就是巴里拉國民童子軍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Balilla)。其名稱乃由野史上一個熱那亞的小英雄的名字濫觴而來的。在這種團體之下，

所有的青年與小孩，都組織起來，現在我將牠改良，不再像以前根據各種的遊戲結合，及散漫的政治學校及其附屬學校，牠是以體育的操練，與國家的紀律訓練的。他們習慣服從，並且眼光遠大。

因為要表示我對於教育維新十分注意，於是我到卜魯日亞大學講演。各學者都承認此次講演，闡發了他們對於青年的義務的世界觀了。

後來，我要對於文化及研究科學，美術，及文學名家以一種貢獻，我設立意大利科學研究會，其中會員都是名垂不朽之人。

我們國家軍隊，自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以後漸漸衰微。我們人民之花，是被侮辱與屈服了。

在自由政府時情形之不佳，有時甚至陸軍部長發通告，勸告軍官不要在公共地方穿着制服，並攜帶武器，以免流氓光棍的挑釁。

這種反常的情形——為國家的原故，這種情形愈收束得快愈好——是由法西斯蒂黨

人來推翻的。這情形是那時人民所以急於革命的原因之一。現在，我國的精神是不同了，國家的軍隊是國家治安的，可尊敬的，有價值的保障。

我對於軍隊也有一個清楚的，不猶疑的計劃，在一九二二年我進軍羅馬之後，我立即任命地日爲陸軍部長，他是一九一八年大戰中的名將。在維托瑞阿維乃士之役後。他很沈默，他因鑒於時局的艱難，曾對尼蒂政府提出抗議。我又任命大戰時我們的海軍領袖達安德雷維爾爲海軍部長。一九二三年四月地日將軍在閣議中提出改良軍隊一種完善的綱領。此次會議是一個歷史上出名的會議；關於軍隊改革的根本議案也在此會中決定了；以後我們對人民又作一個嚴肅明白的宣佈；自此次會議中，我們的軍隊已有了一種新生命，「在我們全國最高福利之下，完成我們受託的偉大的使命。」

我已經完成對自己，對國人的頭一個誓約了。我立即又將我的精力轉注在航空復興的組織上去，這個問題是以前政府絕對不許的。這件事是很容易的；每樣事都要重新作起。飛機場、飛機、駕駛者、組織者同專門家都要恢復。我們航空的仇人，都應加以一

種放棄的、喪氣的、不信任的感情灌入。意大利人民中許多人以為這武裝勢力必先視為一種遊戲，才能發展。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用盡我的精力——我以個人的注意，個人的懇摯，加以鼓勵。我的目的到底達到了：德皮尼杜 (Do Pinoto) 馬達賴納 (Maddalena) 等人飛行的成功，飛行隊的成立，航空大操演等，都足以表示意大利的航空，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凡在有空氣能飛行的地方，都可顯示我的航空的精巧與威信。

海軍也是同樣情形，我將牠的組織重新整頓，改良單位，將艦隊完成，並使其紀律實行。第四點，因為競爭與勇敢的精神，國家保安的義勇隊，組織成功了，共分一百六十隊，都由著名的軍官同法西斯蒂黨人領帶。這些隊伍是很偉大得驚人的。

結果，我們的兵營與軍艦，都成了和平的保障者！軍官都將他們的行動，專注於人類身體上，以及教育上的改進，軍隊的訓練，都依照現在的戰術。現在也不像以前那樣不盡職了，因為要擔任維持公共秩序的责任，這責任是全體一致擔责任的。近五年來，兵營完全為戰策操演，而不為別用。

以後，地日將軍因病辭職。地治阿爾日阿(Di Giorgio)將軍繼任。但是，我以爲有將國家所有的武力集在一人指揮之下的必要，所以我擔任了海陸空軍總司令一職。於是我發表委命一個統率全體軍官的大元帥，這些軍官，都是計劃並且實行將我們的全副武力，趨重在一個目的上——勝利。我們的軍事精神，是非常活潑的，既不是侵犯他人，但同時不許被人侵犯。牠是和平的，但同時也是時時小心戒備。

要將法西斯蒂復興事業完成，必先得還要提到幾個比較不重要的問題，因爲國家的尊嚴與實力的原故，不得不立刻解決。

政府退職的官員，在戰前所得的養老金已經很少了。此時因幣制低落，這少許的養老金，又受影響。我使他們的養老金與金價及生活需要相等，以保障他們。我又與牧師打算盤；這是一個公正的與必需的處置，在以前秘密結社的政治下，在民主政治下，這種處置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因爲他們都是反宗教的。意大利共有六萬牧師。他們與歷史上政教之爭是無關係的。他們完成他們靈敏事業，並且在宗教上處處幫助人民，對於政

治毫無過問，尤其在法西斯主義興起以後，這情形更入佳境。他們不願將所負的使命上的精神性質損壞。自然，一些不好的牧師是被攻擊了。但是，凡忠於聖經，盡他們的職務，而表示與人民以一種博愛的，神聖的真理的牧師，都受國家幫助。因為他們之中，有許多貧窮的，所以我立了一些法規，以改進他們的生活環境。

關於公共建築的政策，以前是帶有一些選舉制的色彩的；所要作的公共建築都零碎由各處決定，既不是按照有組織的計劃，也不是按照必需的計劃，不過使各地方的投票者的各團體滿意而已。我阻止這種合法的殉私。我建立了公共工程局，將一切的公共工程都付託與我信任的人，他們都絕對服從中央政府，並且不受地方利益的影響。這樣，南意的公路，才因此改好，我將全國的水溝、公路、水港的計劃，都發表出來。這些都是很好的，各地方立刻就開始實行。所有的政府官員，現在受了一種新的激動，有了一種新的威信。國家的一切大小公共事業，鐵路、電報、電話、專賣權都重行開始工作。有些人甚至對現在這新規律譏笑。這是很容易解釋的：我們不要忘記意大利人民歷年來

都習慣於反抗紀律的；他們習慣於苟且生活及對於政府的行動與工作的喧鬧和怨恨。有些舊的心理態度的遺痕，還時常流露在表面上。有時他們甚至呼喊，因為世界上還有所謂程序與效力。一些野心家希望打擊我們強壯的秩序與紀律的成功。但是現在，國家不是一個抽象的，不可知的東西；每處每日都有政府的存在，凡住在國內外的人。都覺得法律的神聖。這時像美國那種一切公共事業都在絕大效力指導之下，而地方政府以前的漠視，現在也變成熱烈與靈敏了。

我特別注意國都羅馬，成爲一個全宇宙的城市，每個意人及全世界愛牠。在羅馬帝國時代，牠是十分的偉大，到如今還是保持着光明。牠是一個歷史的地點，並且是基督教發揮的中心。羅馬是命運與歷史的城市。牠也是新意大利的國都。牠是基督教的地點。她曾經指示並且還繼續指示全世界的美術與法律。

我不能拒絕使羅馬有藝術上的美麗，政治上的秩序，並使其有紀律的任何經費與方法，牠有天然港奧斯地亞(Osiza)，有新的道路，牠可以成歐洲最有秩序最清潔的城市。

我將羅馬的一切紀念物都隔絕起來，這樣，以前的羅馬人與現在的意大利人的關係，是更美麗更有暗示了。這種重新估價——差不多可說重新建造的工作的實行，並不損害意大利的其他城市。牠們每一個都有牠們古昔都市的特性。其中如卜魯日亞、米蘭、拿波爾斯、佛倫蘭斯、巴來莫、波郎納、都靈、熱那亞都有牠們高貴的歷史價值值得尊敬；但是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羅馬及牠永久的光明的。

有些著作家是很精密的觀察者，所以我們的政治一步一步的改變，他們是一步未放鬆的守着，在某一個時間，他們發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爲什麼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後，而法西斯蒂黨還不解散？

因爲要回答此問題，就不得不指出幾個重要點，歷史告訴我們；凡是一種革命運動，必定經武力才能變成合法的事，甚至對於參加此運動的人，也要用武力。每種革命都有意想不到的，複雜的現象，在歷史上的某一時候，以往的英雄的犧牲，可爲將來的人們的最高志趣的殷鑒，但是，在我的一生，我是不值任何人的犧牲的；所以我要用勢

力來阻止不振的現象，阻止異端及私利與競爭。我常願事先防備，不願事後再用壓迫。假如必要的話，我是時常表示堅決的。實在的，我時常想，一個黨派既將全權責任負擔起來，牠就應當知道如何去施行外科手術——即主要的手術也要注意——以反抗黨的分裂。因為我個人的情形——我個人創始這個黨——我時時支配牠。常有退黨的事件發現，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政治方針不同，而只是為個人的野心，但是，因為他們損失了價值與羣衆的注意，與他們的自私的暴露，這樣的情形就漸漸減少了。

我的無問題的支配意識，使我有使黨繼續生存的把握。還有別的使我們的黨不應解散的理由。第一，一種感傷的動機，深印在我與國人的靈魂上。法西斯蒂黨員——尤其青年人，他們以一種盲目的，絕對的，深沈的崇拜，跟隨着我。我將他們由學校，事業，工廠中引出來，再領導他們經過許多驚人的變動。這一般青年遇着危險時，一點也不猶豫。他們將他們的地位，甚至生命財產都拿來冒險。我對於以前的義勇隊，一直到如今，還應該感謝他們；去解散我們的黨，就是一種不知感恩的行動。

末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以為我們意大利政府新方法的形成，是法西斯蒂黨的責任。這種新方法的形成，必有待於勞動的活力，經過一番選擇人的程序，並且軍事領袖不應臨時找人。我們應該貢獻我們自己的人以盡職的地位。按照這個意思，在我們統治之下，政府與黨是並行的。我們的黨已捨去暴力的鬥爭，但是我們還保持着不安協的性質。有許多事實證明我們不能以新的世界來補充舊的世界。我不得不為將來預備後補軍！政府的領袖應該是黨的領袖，就如同世界其他各國國會的領袖就是政治的領袖一樣。

因為要維持公共治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政府對於法西斯蒂黨，發出警告書其文如下：

「凡法西斯蒂黨員，均應為秩序之保障者。凡擾亂秩序者，無論其有否入黨證，皆為社會之仇人。」

僅此數言，就可表示在法西斯蒂黨統治之下，我們黨的地位與責任了。

在一九二二年我們遇着許多困難。因為種種緊張的經驗，以致黨到了神經過敏的境地。在很困難的時候，黨曾作過全國福利的領袖者。我們的革命並不像其他的革命，經過長久的流血時代。我們只有一時的戰鬥。事後，我已用我的意志將暴動控制了。

但是反對派報紙的態度，十分奇怪，自由派色彩的塞拉導報同社會主義色彩的前進報——同床異夢者——同樣的急烈地批評法西斯蒂黨的行動為暴力的表現，同時，他們希望法西斯蒂黨的試驗，立刻收場。按照這班政治的診斷者的意思，這不過是一個短期試驗，法西斯主義不久就要碰到國會的礁石上，或者因不宜於領導意大利生活的複雜的事實，而被破滅了。我們能逆料這預言的不幸結果，因為這樣，我必須——尤其在第一年——繼續注意我們的黨，使其一直發生功效，不怕批評與陷害，並且預備受任何命令與調遣。

黨又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危險，就是黨員入黨太濫了。我們開始帶戰鬥性質的少數人，現在漸漸加多了，所以我們不能不限制入黨了。我們法西斯的團結精神，以前已經

證明了的，現在舊世界的份子要混入了。假如這事實實現了，則所有的舊思想，舊弊病與混亂，都將恢復舊觀，而不能保守經過教育與信仰的黨的膨脹。黨如增加了投機份子，則將失掉活躍與原來的精神。我們必定要阻止舊勢力的侵入。黨能將就此繼續下去而不破壞意大利新青年復興的運動。

一九二六年在我停止入黨登記以後，我將我的全副精神，注意力與方法，用在青年的選擇與教育上。學生軍組織成功，同時巴拉拉國民童子軍也組織好了，後者是一種青年男女組織成功，因為他們的名譽和工作，我最近才選好他們，並且稱爲「法西斯蒂統治下無價之青年。」

這個計劃得了一個非常的結果，因爲這樣，黨從來就未遇着真真的危機。我相信我有能力待時而動，並且在相當的時候攻擊，而又不帶遮掩怯懦與奸滑的假感情。

在這種守護的預防工作之中，我身旁總有許多黨中的各部部長，他們給與我無限的幫助。米捷班琪在進軍羅馬之前，就領導法西斯蒂黨。他將我們運動的暴動性質抵制下

來，適應了那時政治的情形的需要，因為那時政治必須以靈敏的手段對付。正因為如此，他是一個絕好的開員，現在，他還在政府中任事，是我內政的一個大幫手。他有一個頭號的政治腦筋——沈思的腦筋，他在任何時候都是忠實的。我們的統治在任何時候都可依賴於他的。

桑桑賴尼 (Honorable Sansanelli)，他曾加入歐戰，現在是「歐戰兵士國際聯盟」的主席；現在也在我們的政府中任事。他曾經對付了受秘密結社的影響的「出黨」運動。

在某一個時期是反法西斯蒂勢力報復的時期，舊時自由派雖然失敗了，但是新統治下還容忍他們，但是他們却不明白種種發生的事件。他們回復他們以前的態度；意大利的秘密結社，還不斷地予以無盡的，不可制服的小活動，以及腐化與分化同時發展。這些惡勢力甚至襲共產黨的故智，作種種的陰謀舉動。一九二四年九月，在熱安達指導之下，組織了一個新的總部。關於熱安達的法西斯蒂活動，我以前曾經說過了。在這年的下半年，國內外的反法西斯蒂活動，在各條戰線上的努力，都膨脹起來了。一九二五年

正月三日，我用言語將這種勢力制服住了。但是，接着我又決定我們的黨，還應保持着堅決不合作主義；因為我心中有一種計劃，一九二五年正月十二日，我任命羅伯爾士、法爾納西氏(Hon. Roberto Farinacci)爲本黨的總秘書。

法爾納西知道如何表示他是受託的人了。由他整個事業的成功，與結果看來，他很盡他的職份的。他破獲了國內各處的「阿文提諾」運動的巢穴；他將黨的政治的道德的不妥協主義，提得更高，並應用我在四次被暗殺後所宣布的特別法令，以抵制反對者與陰謀家及反法西斯蒂的罪惡。我緊接着用黨來應付這報復運動，並且隨時預備必要的行動。法爾納西是法西斯主義創造者之一。他自一九一四年就很忠誠地隨從我了。

在他完成他的事業後，奧格斯七杜拉第先生(Hon. Augusto Turati)便繼之而起，杜拉第是歐戰時的勇敢的戰士，他有清楚的腦筋，高貴的性格，他將黨改變成新的式樣，以適合於新時代及新意識的需要。他對於法西斯蒂羣衆，完成一個偉大的，必要的教育改進工作。除了這些黨中的重要份子以外，我必須提到組織「巴里拉」的雷納士理西

(Renato Ricci)、組織義勇隊的曼爾琪理 (Melchiorri)、大胆的行政官馬理來里 (Marino III)。勇敢的戰士斯達賴斯 (Starnoc) 及組織波郎納法西斯蒂黨的阿爾比納地。

由本黨產生出法西斯意大利的地方官，產生出工團組織的份子，領事官和各部總次長。逐漸，我將整個的政府，放在一個整個不妥協的戰線上。差不多所有的位置，都昇給法西斯蒂份子。在我們四年秉政之後，實現了我的「一切政權都歸於法西斯黨」的公式，這句話是我一九二五年在羅馬一個法西斯黨會中所說的。

我竭力克制我的煩惱的心思。我竭力避免走入黑暗。我不要盲目地決定我的結論。我將以往的需要，與將來的事實，混合在一起。因為要使我國有完全的法西斯蒂性質，將黑衫黨的活力，與新精力，灌注在國民生活的各部份的原故，我不但不將法西斯黨的統治勢力取消，並且反使牠的勢力增加。這種由政治的組織，轉變到國家永久的組織，是保障將來統治的堅固。我親手建立了代表制的基礎，這代表制是根據於意大利的各團體，意大利整個的利益，我已將「法西斯蒂大會」定為國家確定的，合法的機關。法西

斯黨，一方面是獨立的，一方面與法西斯意大利的機關是如鋼一般的結合堅固。

現在有一個引起國內外人士注意與誤解的問題——就是意大利與教會的關係。一八七〇年的保證法令 (Law of Guarantees) 就是用以解決這個問題的。因此法西斯蒂黨興起以後，而國家與教會還未發生重大的衝突。當然有一時宗教改革，新教徒被國家所壓迫，但這是既未瞭解牠的具體理由，也沒有什麼深刻的意義。

宗教和平的關係是法西斯統治的貢獻。在以前，因為歷史性質的爭論，傾向於黨派的嫉恨了；反宗教的活動，以種種方式發展，有許多「自由思想」的團體；而這種活動，只是增加秘密結社的惡劣的政法勢力。那時一般人的思想，以為宗教是私人的事，並且不允許有公共行動。

一方面反對宗教是膚淺的、粗暴的、在他方面，教會因牠不能瞭解新的意大利，因牠固執成見，所以更引起敵人的怒氣。反教會的勢力，甚至禁止宗教的徽章，禁止學校的聖經，這時期是社會主義秘密結社的膽大妄為的時代。這種思想，是應該剷除的。我

們將政治宗教的原理，與天主教信仰的精華，劃分爲二。那時的情形，造成了許多謬誤，這些謬誤，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不合作政策到國民黨所造的悲慘的回憶，國民黨到一九二五年漸漸變成宗教的布希維克主義了，我決定清理這種情形，使其於政治上，精神上都不能再有活動。

這種困難的情形，充滿了誤會與迷信，現在被法西斯主義所救了。我對於國家與教會中嚴重的情形，我不欺騙我自己，我不愚弄我自己，以爲我能解救最高理論，最高利害的衝突，但是我竭力研究這些不同的傾向，和不可屈服的脾氣，假如將這些情形調和好了，則宗教的信念，宗教的儀式與崇拜的方式，都要再興了，並且脫離政爭。這些都是新興國家的道德同公民發展的要素。

說句實說，教皇的朝廷，並未十分瞭解我的工作。或者因爲政治的原因，他們在我所作的事業上，一點未加幫助。我的工作，並不容易，也不輕快；密祕結社佈滿他們的反宗教活動的密網，這種活動支配那時的思想，影響了出版界，教育界，司法界，甚至

影響了重要的軍隊。

要表示事情到了什麼程度，只要舉出一個重要的例子就夠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法西斯蒂革命成功後，我在國會中曾作了一篇演說，臨末還訴求上帝幫助我的困難的事業。好的，這句話似乎不相宜——秘密結社所盤據的國會，上帝二字已經是廢止好久了。甚至國民黨——所謂天主教黨——都未想到或提到上帝。在意大利的政治家永想不到這神聖的東西。有時，他雖然想到了，但是政治的機會主義同怯懦又阻止了他，這種情形在國會中尤其明顯。現在我大胆來說這句話！並且在革命緊張的時候說這句話！什麼。是。真。理。？。那。是。公。開。承。認。的。一。種。信。仰。，。同。時。，。是。一。種。實。力。的。表。現。

我。看。着。宗。教。精。神。慢。慢。復。興。了；。教。堂。裏。又。擁。擠。起。來。了。牧。師。們。又。被。人。尊。敬。了。法。西。斯。蒂。黨。已。經。幹。了。他。們。的。工。作，。又。盡。了。他。們。的。責。任，。並。且。現。在。一。直。還。是。作。他。們。所。應。作。的。事。

我已經說過，有一些宗教團體尚未重視或瞭解新意大利政治的和道德的復興的重

要。

頭一個不瞭解的表現，是在法西斯統治開始的時候；起初，所謂天主教黨加入我們的政府，希望與我們合作。然而這次的合作，却使我們之中有許多沉默與誤會，在六個月之後，我迫不得已將此黨的閣員，請出我們的政府之外。

我發現國民黨與秘密社結聯合。但各政黨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還未被打倒時，國家與教會的困難，就反映在意國政治上了。他們曾經重覆討論羅馬問題。歷史的力量使他們相信他們的觀念。筆墨上的爭論，客觀的討論，都以爲這問題沒有成熟，並且不可解決。或許兩種心理，兩個世界處在歷史上和不合實際的對敵地位上，彼此衝突。這兩種對敵的勢力，一種是在宗教上有很深的根據，並且依據羅馬人的倫理的勢力而生存，另一種則在上帝之下的一種一律平等的普遍性質。

目前，法西斯黨以最高的忠誠，瞭解，並且尊重教會的實力：這是天主教每個人的義務。不過，政治與國家福利的保障，和奮鬥，也是現在法西斯意大利人的工作，我們希望看見我們不朽的和無雙的聖彼得教堂被人尊敬，同時不希望混在無綱要與缺乏愛

國精神的政治勢力之中。無論教會的代表錯誤到如何程度，沒有人想將牠的普遍性質取消，但是每一個人都有權對於意大利天主教的不忠實而加以抱怨，並且可以憎恨牠對歐洲潮流的贊同，對於此點，意大利是常守沉默的。意大利的信仰，現在堅實起來了。法西斯主義給國家的宗教，以一種活力及鼓勵。但是，牠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國家及其功能上最高的權利。

下編 希特拉言論集

國家社會主義黨

國家社會主義黨，是德意志國內法西斯蒂運動的搖籃。自一九二二年該黨正式成立，以迄於今，希特拉實為該黨的中心人物。所以我們如欲明瞭德國的法西斯蒂運動，必須先認識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內容，而能以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內容，詳細指示我們的，則又舍希特拉而莫屬。職是之故，希氏「國家社會主義黨」一文，實為研究德國法西斯蒂運動者首先要讀的一篇東西。希氏以為國家社會主義黨的行動，是一種革命的行動，而革命的目的與希望，必須於成功以後，其所帶來的好處，勝過以前統治下所享受的，那末方能算為成功。而且這種運動的使命，不是打算建立一個君主國，不是打算建立一個共和國，而是要創造一個日耳曼國家。所以需要一種堅決的信仰，並擁護一個具有絕對權力和負全責的領袖，來完成這種使命。因此德意志法西斯蒂運動，也和意大利相似，是以民族單位為基礎，而採獨裁方

式爲手段，我們也可以說這是法西斯主義共同的性質。

百強附註。

假如我在我們的運動之發展的第一個時期之末尾，來陳述一些意見，並且很簡略地提到一些關於此種運動的經過，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在此次運動之理論的目標上發揮議論。這個運動有驚人的事業與目的，必須要有全篇的文章來加以討論。因此我要澈底地談到這個運動的黨綱的原則，並且要對「我們」所了解的「國家」這個字，來嘗試劃分一個範圍。「我們」兩字，就我的意思，是指着那些無數有同一希望，但是又不能拿文字來形容他的腦中所騷動的東西的人們。一切偉大的改革，開始都是由一個人來作戰士，但是有許多人的幫助，這個事實很奇怪的。他們的目的，常常是一樣的，在暗地裏無數的人，對於這個目的已希望了數百年了，一直等到某一個人起來宣佈這個普遍的希望，然後牠的信仰者，推動舊的希望，在新的觀念之中而得到勝利。

數百萬人的深刻不滿意的感覺證明了在他們心中，希望對於他們今日所處的環境，有一個澈底的改革。許多人對於選舉之厭惡，就是一個證據；還有許多人傾向瘋狂的左

翼的極端主義。對於這般人，應該由此種新興運動，使他們轉變過來。

復興我們國民政治勢力的問題，就是恢復我們國民自存希望的第一個重要問題，因為經驗告訴我們，外交政策之形成，和任何國家的重要之估計，大半根據於顯著的或幻想的國家的抵抗勢力，而很少根據國家現存的武備。因為同盟是因人而成，並非因武力而締結的。英國人之殘忍與堅持，當他們決定了開始一種奮鬥，就以各種方法，不顧時間與犧牲，一直要達到勝利的目的為止。倘使世界各國一天一天重視英國人這種精神，與其領袖資格，則不列顛就將一天一天被承認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同盟國；這事證明了，任何時間的現存軍備，不必須要與別的國家或某種特別的比例。

倘使我們的目的，在於重建一個有自治政府的日耳曼國家的新興運動，那末就應該集中牠的勢力，以取得羣衆的幫助。我們所謂「國民資產階級」，既是如此的無望，如他的缺乏民族的感情，他們要認真的反對一個強有力的對內對外的國民政策，那是無疑的。因為同樣的愚蠢的原因，這些德國資產階級者，在自由解放時代，甚至反對畢士麥

也取一種消極抵抗的態度，現在，也因為他們著名的懦怯，不怕他們有任何積極的反對。

但是說到我們國內有國際同情的羣衆，其情形就兩樣了。不但他們的**本性比較趨向暴動的觀念**，並且他們的猶太領袖也愈來愈殘酷無情了。

除此之外，各黨出賣國民的領袖，對於任何有自存的動機的運動，都要反對。日耳曼民族要恢復牠以前的地位，而不計及那些使我們國家發此驚人的災患的人，在歷史上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在未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審判座前，不是去審判大的叛謀，而是審判出賣國民的事件。

因此。任何恢復德國獨立的觀念，與恢復我們人民的堅定的精神，這件事是不能分離的。

在一九一九年，我們就看清楚了，這個新興運動，應該喚起羣衆中之民族情感。自策略上說，這件事生出下列幾個條件：

一、必須有很大的社會犧牲，以取得羣衆，使他們加入民族運動。但是，一個目的

在乎爲德國而恢復德國工人的運動，必須要認清，在保持國民經濟生活之獨立不受威脅時，經濟的犧牲，並不是這個運動中之重要因子。

二、羣衆之國民化，非不徹底的方法，和「客觀的立場」之溫和的表示所能做到的，而須由於所要達到的目的上之堅決的，和瘋狂的集中。羣衆中並沒有教授，或外交家。一個人希望得着羣衆的附從，他應當知道打開他們心門的鑰匙。這不是客觀的而是需要果斷與力量。

三、假如當我們爲我們的目的而指揮政治爭鬥時，同時要摧毀我們的敵人，則取得羣衆，是無可疑義地可以成功。

羣衆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們不了解各種不同志願的人們彼此握手言歡的意義。他們希望看見的，就是強者的勝利；與弱者的消滅。

四、要使已經與整個國民分裂而成一個階級的國民的一部分，與整個國家打成一片，不是降低上層階級，而是要提高下層階級。但是負着這種責任的階級，不是上層，

而是爲平等權利而鬥爭的那個階級。現在的資產階級，在已往並非得貴族的幫助而合併在國家之內的，是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在他們自己領導之下成功的。

接近現在工人最嚴重的阻礙，不是工人的階級利益之猜忌；而是他的國際領袖們的態度，他們仇恨民族與祖國。那些同一的工會，如其在熱烈的民族精神之下，領導向政治與民族那方面去，則其可以轉變許多工人成爲國民中之很有價值的分子，這種事情與那些發生在純經濟界中的鬥爭，並無關係。

使德國工人傾向他自己的同胞，和自國際主義之瘋狂中挽救工人的運動，應該對於宰治在大雇主中之態度，與以相當的反對，那種態度是以工人對雇主之不可挽回的經濟屈服之意義，來解釋同族。

當工人不顧共同的福利與國民經濟之保存，信賴他自己的力量，以作無饜的要求，其對同族所犯的罪過的嚴重，與雇主誤用國民之勞動力量，以剝削工人，自數百萬人的血汗中，求取無饜的利益一樣。

這個新興運動取得羣衆的來源，就是工人團體。牠的任務是要將工人們由國際主義的錯誤中挽救出來，由社會貧窮中解放他們，自他們的文化低落中提高他們，使他們轉變成社會的堅實而有價值的份子，充滿了民族的情感與希望。

事實上、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在民族的陣營中，產生一個特出的高聳物，而是要贏得反民族的陣營，來歸向我們。這是我們整個運動的戰略趨向中，絕端重要的一個原則。

這個一致的、顯明的態度，必須要在這運動的宣傳中，表示出來，再者爲宣傳的理由，這是必須的。宣傳的目的與方式，必定可以達到羣衆方面；測量是否正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實用的功效。羣衆大會中，最成功的演說者，不是那只對受教育的聽衆演說的人而是那能把握着羣衆心理的人。

一個政治改革運動的目的，要以苦心的解釋，或以影響現存勢力的方法，是達不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奪取政權。

假如僅只革命者得着了政權，我們不能就承認這種「辣手政策」(Coup d'état)爲成功了，必定要這個革命行動的目的與希望成功後所帶來的好處，勝過在以前統治之下所享受的，那末方能算爲成功；一九一八年秋天如盜賊行爲的德國革命，就不能說是革命成功了。

但是，假如奪取政權，於改革的實際的實行上，是一種初步的工作，那末一個志在改革的運動，自始就應該覺得牠自己是人民的運動，而不是一個文藝茶話會，或者一個遊藝會。

這個新興運動之本質與組織，是反議會制度的，就是說：在原則與組織方面，排斥過半數投票的任何理論，這個理論的含義中謂領袖只是維持秩序，和實現別人的意見。無論在大小事件中，這個運動擁護領袖有絕對權力和負完全責任之原則。我們必須要使這個原則，不但在牠自己的同輩中，就是在全國中，成一個決定的原則，這是這個運動的主要任務之一。

最後，這個運動的任務，不是要維持或恢復特種方式的國家，而反對其他方式的，而是要去創造基本的原則，沒有這種原則，無論共和國，或君主國家，都不能長久存在的。牠的使命既不是去建立一個君主國，又不是去建立一個共和國，而是要去創造一個日耳曼國家。

運動之内部的組織，不是一個原則的問題，而是一個便利的問題。最好的組織，就是要使領袖與個體間的國家機關越少越好。因為組織的任務；是要將一個明確的觀念——這個觀念是時常發源於一個人的腦中的——運輸至一般人腦中，並且使牠由理論變為事實。

在黨員增加了以後，必定要組織許多小的聯絡團體，在將來政治組織中，用以代表地方的核心細胞。

運動的内部組織，應依下列的步驟：

起始整個的工作，集中在一個地點——慕尼克 (Munich) 亦稱門占、或閔行。訓練

一部份無疑的可靠的黨員，建立學校，預備將來傳播本黨的思想。在那一個中心的可能範圍之內，以最大的和最顯明的成功的方法，獲得必需的權勢。

在慕尼克的中心領導之權威，得着絕對的承認以後，再組織其他地方團體。

領袖資格，不但需要意志力，並且需要才幹，其中的精力，較天才本身還重要。能發三種性質具備，那是最好的了。

一種運動的將來，是有賴於固執的狂信，牠的信徒要當牠是一個正確的路綫，而予以保衛，甚至反對同樣性質的信仰。

如果以爲一種運動與其他的相同的運動聯合，而能使這種運動變得更強盛，這是極大的一個錯誤。我承認任何容量的增加，就是範圍的增加，同時——在膚淺的觀際者的眼光中——勢力也增加了；在事實上，這種事只是使不健全的種子混入這個運動之中。到後來才察覺出來。

任何活動組織——一個觀念的具體表現物——之偉大，在乎牠的宗教的熱狂與固執

之精神，牠攻擊其他的一切，熱狂地相信只有牠是正確的。假如觀念本身是正確的，再加上這種武器，在世界上的任何鬥爭，是無往不利的，對於牠的懲罰，只能增加牠內部的力量。

基督教的偉大，不是在乎牠與牠相同的先輩之哲學觀念調協，而是在乎牠固執地，熱烈地公布和保護他自己的信條。

這個運動中之份子，必定不要被我們國民的仇人的恨惡，他的政府的理論，和他的言語所震嚇；這些都是在預料之中的。謊言與譏諷，在恨惡中是很重要地附帶着的。

任何人，假如他不被猶太人的報紙攻擊、侮辱、譏諷，那他就不能算一個真正日耳曼人，不是一個真正國社黨黨員。一個人的情感的價值，他的信仰的真實，和他的意志能力的強盛之最好的標準，就是我們的國民的仇敵對他的凶暴。

這個運動應當以種種方法來灌輸個性的尊敬；他應當不忘人類的價值就在乎個性，不忘每種觀念，每種成功，都是一個人的創造工作的結果，不忘對偉大的羨慕不僅是羨

慕而已，並且是聯合這些羨慕的人的聯鎖。沒有東西可以代替個性的。

在我們的運動之初期，因為我們的名字並不重要，甚至沒有人知道，所以受了很大的阻礙；因此，成功的機會，發生了問題。自然，一般人對於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在慕尼克，甚至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黨的名字，因此妨礙了少數的信徒，和一些知道他們的人。這時我們重要的事，就是要擴充這小團體，吸收新分子，不顧一切犧牲，使這個運動的名字傳揚出去。

因為這種觀念，我們嘗試每個月，以後改每兩個星期開會一次。開會通知書一部份是打字機打在入場券上，一部分是用手寫的。我記得我一次就發出去八十份入場券，到晚上，我們等候一大羣人來赴會。在開會時間延長了一個鐘頭之後，主席不得不宣布開會，但是只有原來的七個人，另外沒有一個人！

我們幾個可憐蟲，捐了一些錢，登了一個開會的廣告在門占諾觀察報（*Munchener Beobachter*）上，牠那時是獨立的。這次的成功是出人意料之外。

我們預先找着一間屋子預備開會。七點鐘時，已有一百多人到會，於是宣佈開會。一位慕尼克的教授第一個發言，我第二個演說。我說了三十分鐘，那時我證實了我以前的本能地感覺，但是不確切的知道：我能演說。在三十分鐘之後，在那小廳中的聽衆，都如中了電流似的，他們是非常的激動於我的言辭，使那次到會的人預備捐募三百馬克，以作開支。這事使我們免於憂慮。

那時黨的主席哈爾先生，在職業上與訓練上都是一個新聞記者。但是要作一個黨的領袖，就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他不是一個羣衆的演說者。雖然他的工作是精細的，正直的，因為他缺乏這種天才，所以缺乏一種特別推動的力量。慕尼克的黨主席德需斯勒先生只是一個工人，不能稱爲是一個演說家；並且他不是一個兵士。他從未到過戰場，因此，除了天生的怯懦與無定見外，他永沒有受過那種能使人們免於柔弱與無定見的性質之唯一的訓練。因此，他們二人都不是那種能夠溶合熱烈的信仰於任何運動之勝利中的材料。

我自己那時還是一個兵士。

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最恨那種以奪取羣衆爲目的的運動，羣衆一直到那時候都與國際馬克思猶太交易所黨派絕對有關係的。「德國工人黨」這個名稱的本身，就是惹人激怒的。

一九一九至二十年的整個冬天，我們的鬥爭，就是在這新興運動的征服勢力中加強信仰，並且使牠變成熱狂，這種熱狂是有移山的力量。

在德國達曹爾街 (Dachauerstrasse) 的聚會，我又證實了我是對的。到會的人數超過了二百以上，我們在經濟上的與民衆方面的成功，都是很光榮的。一月之後，來赴我們的會的，超過了四百人。

這個新興運動規定一個明確的綱領，而不用「民意」(Volkrecht) 這個字，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因爲缺乏概念之類的限制、那種表示不能爲任何運動貢獻一個基礎，也不能爲屬於這個運動的人們定一個標準。因爲概念在實際上是很難於確定，並且有很多的

解釋，牠的解釋是太寬泛了。介紹一個不明確的，有許多解釋的概念到政治鬥爭中，必定能破壞了鬥爭中有目的的團體，因為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使個人爲他自己去解釋他的希望與信仰。

我要警告這個新興運動，不要陷入所謂「沉默工人」的陷阱中。他們不但是怯懦者，並且常是無能的，懶惰的人。一個人，他知道了一件事，看清了某種危險，在他眼前找得着解救的方法，他的責任不是一「沉默地」工作，而是要起來。公。開。反。對。罪。惡，並且。求。出。醫。治。的。方。案。假如他在這方面失敗了，他就是一個不幸的弱者，忘了他的責任，他是由於怯懦，或者由於懶惰和無能而失敗的。但是這就是那些「沉默工人」所時常重複表演的，似乎他們知道上帝所知道的。他們是十分的無能力，但是他們以假面具來欺騙整個世界；他們是十分懶惰，但是藉口「沉默的」工作，以表示他們有巨大的，忙碌的活動。總而言之，他們是騙子，是政治的投機者，他們恨別人所作的誠實的工作。任何一個單獨的煽動者，大膽地在酒店中站起來對他的敵人很勇敢地，坦白地爲他的意見申

辯，其影響較之一千個這種卑陋的，奸詐的偽善者還強。

一九二〇年初，我堅持要開第一次羣衆大會。黨主席哈爾先生，對於選定的時間，覺得不能同意於我的意見，於是在光榮中，辭却領袖的責任。安多德需斯勒繼之。我已擔任組織運動的宣傳，現在無所阻礙地進行使他實現。

我們擇定一九二〇年二月廿四日，開第一次我們運動的羣衆大會，那時還很少有人知道這個運動。我親身安排一切。

我們選定了紅色，這是最好的顏色，並且牠最能刺激我們的敵人，在他們的腦筋與記憶中，我們能給與很深的印象。

七點三十分開會。七點五十分，我走過慕尼黑城派拉茨爾 (Platz) 禮院的會堂，我感到快樂，真是心花怒放。這個大會堂——在那時牠對於我似乎是很大的——是十分擁擠，充滿了約近兩千的聽衆。

在第一個演說者完了之後，就該輪到我說話。有數分鐘的時間聽衆對我歡呼，會堂

中的秩序亂了；一些忠實的戰地同志，和其他幾位黨員安排了那些擾亂秩序者，使恢復安靜，我才能開始發言。一點半鐘之後，歡呼叫嘯又起始發生，最後，當我解釋完二十五點之後，在我的前面，一個大會堂中，充滿了聯合在一個新信仰，一個新信條，一個新的意志的羣衆。火焰已由白熱中燃燒起來了，劍也拔出來了，決定要恢復德國的西格夫里（Germanic Siegfried），和日耳曼民族的生命。

劍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二四六

民族與種族

民族就是國族，所以民族的強弱，與國家的盛衰，有密切的連帶關係，民族的團結，綜合言之，厥爲自然力，分析言之，則有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五種要素的力量。故具有以上共同的要素者，才可團結成爲一民族，以求共存共榮的進展。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就是指非同族中的人類，因利害關係的不同，絕難以和衷共濟。至於民族與種族間，顯然有巨大的區別，就是同一種族的人，儘可不屬於同一民族；或是幾個不同的種族，而能團結成爲一個民族；所以民族與種族的問題，遂成爲立國的重要關鍵，而爲從事實際政治的人們所不可忽視。我們在希特拉的民族與種族一文內，雖然其中大半是含有攻擊猶太族的作用，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保持種族的純潔」是何等的重要。

百強附註。

亞利安民族與劣等民族的混合，其結果就是維持文化的種族之消滅，這種事實在歷史上數見不鮮。北美的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種族，很少與其他的劣等有色民族混合，所以他的人性和文化與中美南美大異，中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族，隨意與土著人通婚。就拿以上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認識種族混合的影響。美洲大陸的日耳曼種族的人，因為他們能保持種族的純潔，所以他起而為美洲的主人；假如他不陷入混血的羞恥之中，他將要繼續他盟主的地位。

上層階級的人，倘已完全征服了世界，而成了全世界的唯一主人之時，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平人道觀念也許是很好的。如此，在實際上應用這種原則，方不致有損於民衆。因此，第一要奮鬥，然後才講得到和平主義。否則，就是等於說人道已超過了牠的發展之最高的一點，其結果不是倫理的觀念的統治，而是野蠻的統治，接着發生混亂，有的人自然要以此為可笑，但是無人道的行星，已經在「以太」中游行過數百萬年了，假如人類忘掉了他們的生存，不是由於一個野蠻意識形態的觀念，而是由於自然律的了解

與殘忍的應用，則無人道的行星，又將要出現了。

在世界上我們所羨慕的東西——科學、藝術、專門技藝、發明——是少數民族的創造品。所有一切文化都依賴他們而生存。假如他們毀滅了，一切世界上的美，都要與之同歸於盡。

假如我們區分人種爲三個範疇——文化的建設者，文化的維持者，文化的破壞者——那末可以說惟有亞利安人種可以代表第一個範疇。

亞利安人種——時常是奇特的少數者——推翻了異種民族，又得了其他低級而受他們支配的人民的幫助，在他們獲得的領土中，根據生活的特殊情形——如土地的肥沃，氣候等——去發展潛伏在他們當中的知識與組織的本能。數百年來，他們創造自己獨有的特性的文化，並且使牠們發展以適應他們所征服的人民之特性與土地。時間過去了，這些勝利者，不保持他們純血種的原則（他們起初是固執着這個原則的），開始與他們所征服的土著通婚，於是他們特種人民的生存，就消失了；因爲在天堂要犯了罪過，結果

是不免於被摒棄的。

歷史創造的民族，是始終都是創造的，無論膚淺的觀察者是否能見及此。這種人只認識已完成的工作，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不能認出天才的本身，只能在發明、發現、建築、繪畫等等之形式中看出天才的外表形式。甚至這樣，他們還需要很長久的時間，才能加以了解。個人的天才，在某種鼓勵之下而奮鬥，以特種方法來表現牠，在民族生命中也是一樣，創造力之實際的應用，在他們之中，如無某種環境的暗示，也不能產生的。這種事實，在人類文化發展傳播者之種族中——亞利安人中——我們看得很清楚。

要發達高級的文化，必須有賴於低等文明的種族之存在，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替代技術的工具，沒有他們，較高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在人類文化之初期中，依賴馴服的野獸的地方很少，利用人類劣等的材料的地方較多。

一直要等到被征服的種族作了奴隸之後，然後同樣的命運才降到獸類世界；有許多

人相信情形正是相反的，但是並非如此。因為牽耕犁的第一是奴隸，然後才是馬。只有和平主義的愚人，才認為這是人類罪惡的又一種現象；其餘的人看得很清楚，知道這種發展是必有的現象，如此方能達到。使那些傳道者得以覓了他們對世界之荒謬的言論。

人類的進化，好像攀登無盡頭的梯子一樣；一個人不能爬高，除非他是先爬了最低的一級。因此，亞利安人必須走上現實的道路，而不是走上現代和平主義者夢中所想的那條路。

亞利安人所走的路，是很清楚地劃出來的。他是一個征服者，消滅了低等的人類，他們的工作，由他支配，根據他的意志而為他的目的行事。在使這些被征服者做工之外，他不但還要保護他們的生命，並且還給他們以比他們以前所謂自由還要較好的生存。當他自視為主人翁時，他不但保持他主人的資格，並且是文化的保持者與培植者。但是在這些被征服者開始能發展他們自己時——或者開始與征服者的文字同化時，主奴嚴格的界限就沒有了。亞利安人摒棄了血族的純潔及他留在自己所創造的樂園中的權

利。因為種族的混合，他墮落了，漸漸永遠失掉了發展文明的能力，一直到他心身方面都開始變為與他們所征服的土著種族相似，而不像他們的祖先了。他們暫時還能享受文明的幸福，但是慢慢成了漠不關心，最後以至於遺忘。這就是現在文明與帝國毀滅的原因，而為新的創造留一地步。

血。族。的。混。合。，。和。與。他。同。時。發。生。的。種。族。標。準。的。低。降。，。是。文。化。消。失。的。唯。一。原。因。不。是。戰。爭。的。失。敗。，。而。是。純。潔。血。族。的。抵。抗。能。力。之。消。失。，。而。致。毀。滅。了。人。類。

在我們德國文字中有一個字是形容得很好的——準備服從義務的要求（Pflichterfüllung）——大衆利益的服務，在這種態度之下的觀念，我們謂之「理想主義」，和「自我主義」是相反的；由這個主義，我們了解了個人為社會，為同胞的犧牲的能力。

當理想有滅亡之恐怖的時候，我們可以觀察得出那種社會精華和文化的必須條件之力量，立刻也低落了。於是，自私成了民族中的統治力量，接着快樂而起的，就是秩序的混亂，人類因此由天堂中直落到地獄下了。

與亞利安人正相反的就是猶太人。在世界上，沒有一種民族的自存的本能之較這「選民」的還要更發達得強些。這種情形的最好證據，就是這個種族至今還繼續存在。兩千年來，有那一種人民之內在特性之變化，像猶太人那樣少的？有那一個種族在事實上較之猶太種族所發生的革命變遷還大些，但是在可怕的災患之後，還是保持原狀而生存？生存與維持子孫的堅決的意志，如何的表現在這些事實中啊！

猶太人的知識天才，在數百年來一直是在發展。現在我們才以為他是奸詐，其實在某種意識中，每一個時代都是一樣的。但是他的知識的能力，並非他本身發展的結果，而是由於外族人的教育。因為猶太人永久自己沒有自己的文化，他的知識活動的根基，都是由別人供給。在每一時代中，他的知識都是由於與他週圍的文明接觸而發展的。永無例外。

猶太人種團結起來與他們的同類奮鬥——可說是劫掠他們的同類——由這個事實，就得出來一個結論，以為他們有些自我犧牲的理想，這是完全錯誤。

甚至在這一方面，猶太人也只是因為純粹自私的營求；這就是猶太國——我們假定牠是一個為保持與增加種族的有生命的組織——所以完全沒有境界的緣故。因為一個有固定邊境的國家之概念，時常包含這個國內的種族之理想的情感及工作的概念。要是缺乏這種觀念，去形成甚至去維持一個有固定邊境的國家的野心，都已缺少了。因此，遂無一個建設文化的根據。

因此，猶太民族，雖有顯明的知識天才，還是沒有真正的文化——自然是沒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因為猶太人今日所有的一切文化，大半都是別人的，在他們操縱之下而變成腐敗了。

亞利安人原始也許是游牧民族，經過一些時候，他變成固定的民族；只有這一件事，就可證明他決不是一個猶太人！不是，猶太人不是游牧人，因為甚至一個游牧人，對於「工作」概念也有一個固定的態度——這個「工作」是用來作更大發展的基礎，假如他有必須的資格的話。但是游牧民族有形成理想——雖然是很不濃厚的方法——的能

力，因此他的生活之概念，也許與亞利安種族各異，但是總是同情的。猶太人則完全缺乏這種概念；他絕不是游牧人民上而是其他民族身上的寄生物。他之沒有機會摒除他從前生活的範圍，完全不是他的存心如此，而是被那些反對他的民族中排斥出來的。他之在世上繁殖他自己，是一切寄生物本來的現象；他時常在爲他的種族尋找新的食地。

他在別種民族中，要永久繼續他的生命，必須要使世人相信；對於他，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宗教的聯繫」。這是第一等的大謊話！

因爲要繼續在別的民族中，作一個寄生物，猶太人必須作否認他的真正內在性質的工作。知識愈高的猶太人，其欺騙工作愈能成功——其欺騙的程度，到了使大半人很認真地相信猶太人雖然宗教不同，實在是一個法國人或者一個英國人，是一個日耳曼人或者一個拉丁人。

現在巨大的經濟發展，是將引起民族社會階層的變化。小工業漸被淘汰，工人很難於找着一個適合的生活，逼迫他變成一個無產階級者。這些事實的結果，產出了「工廠

工人」，他的主要的特點，就是事實上他以後不能保持他的尊嚴與人格。質言之，他是一無所有；老年對於他就等於受苦，簡直不能稱之為生活。

在以前某一個時期，也有一個同樣情形，立刻需要解決；一個解決方法就發現了。在農人與手藝工人之外，又發生了一個新的「國家」，牠的官吏是國家的僕人，他們也確實是一無所有。國家為這不健全的情形找出一個方法；牠為牠的不能自己作防老計的僕人的福利，擔負責任，設立養老金制度。一個無財產的階級，因此得以免去社會的不幸，而與民族本身合而為一。

以後，國家又應付更大範圍的同一問題。數百萬人民，不斷地自鄉村中移入大城市，在新的工業中作一個「工廠工人」，以謀生活。

因此，就形成了一個新階級，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及此，也許有那麼一天，人們要問：民族本身是否再有力使這個新階級合併到一般的社會中，抑或階級與階級的分別，將要擴充到破裂的地位呢？

在資產階級忽略了這個最困難的問題，而由着事件隨意變化時，猶太人正在思量關於將來種種的變化。一方面，他盡量利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以剝削人類，在另一方面他時時預備犧牲他的統治，立刻變成反抗他自己的奮鬥領袖。「反抗他自己」自然是譬喻的語辭，因為這偉大謊言的主人翁，深知如何的洗清自己，而嫁禍於人。因他厚着臉皮去領導民衆，所以民衆永不以為他是空前最無恥的叛徒。

猶太人的程序是如下的：他對工人演說，假裝同情他們的命運，或者對他們的不幸與貧困而憤怒，如此以獲得他們的信仰。他不憚煩地去研究他們生活實在的或幻想的困難，而去喚起改變生活的希望。以一種不可言喻的聰慧，他加緊了潛伏在亞利安人中求社會公理的希望，在剷除社會罪惡的奮鬥上，加以明確的世界重要性。他創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因為他將整個社會公正的要求，與此項理論打成一片，所以這個理論遂受一般人的歡迎，同時在他方面，他使得一些端正的人不願意擁護這些要求，因為牠們表現的形

式，自始就是錯誤的，不是，自始就不能實現的。因為在純社會觀念的假面具之下，掩蓋了真正不良的圖謀，這些圖謀以大膽的光明與坦白而公開了。他們無條件地否認個性的的重要，民族的重要，及其種族的意義，因此毀滅了人類文化的重要原則。

工會運動是受歡迎的一種運動。在工人的生存的困難奮鬥中，牠給工人以幫助和保護，工人應當為這個而感謝許多雇主之貪婪與淺見，並且應當感謝他因為這個運動而能得較好之生活條件。工人要保持他做人的生存權利，不信任那些無心肝，不負責任的人反覆無常，當國家——就是有組織的社會——特別不照顧他時，他就要自己起而維護他自己的利益。現在那些所謂資產階級，利慾薰心，對於這個生存的掙扎，多方阻礙，不但反對，並且積極工作，以阻礙凡關於縮短不人道的長久工作時間，禁止兒童勞工，保護婦工，在工廠中和工人寓處中提倡衛生情形——這個更聰明的猶太人，將他自己與弱者合而為一。他漸漸作了工會運動的領袖——他所以易於取得這種資格的緣故，因為他的目的不是要剷除社會的罪惡，而是要在工業中造成一個盲目地服從的戰鬥勢力，以破

壞民族的經濟獨立。

猶太人強迫將他的競爭者，逐出這個範圍之外。由於他天賦的殘忍心，他將工會運動寄託在暴動勢力之上。任何一個有智慧的人想反抗猶太人的詭計，無論他是如何的意志堅決，如何的聰明，都被恐嚇所震服。這些方法都成功了。

猶太人借工會的工具——這個工具本可為人民利用的——實際地毀滅了國民經濟的基礎。

政治的組織與工會同時並行。牠與工會運動合作，因為工會供給政治組織以羣衆，在實際上，牠逼迫工人們加入政治組織中。牠又是政治組織的經濟來源，供給牠以巨大的組織。牠是支配政治工作的機關，並且是一切帶政治性質的大示威運動的主持者。結果，牠完全失掉了牠的經濟性質，以牠的主要武器總罷工，來施行政治的觀念。

借着印刷物以影響未受教育的人，政治和勞工組織，得着了強迫的工具，使下層階級的國民，準備作最危險的犧牲。

猶太人的印刷品，在瘋狂般的毀謗中，破壞了一切認為是民族獨立的支柱，和民族文明及經濟的自治權。對於那些有能力而不屈服在猶太人支配之下的人，和那些知識超過猶太人的人，牠是極力的攻擊。

羣衆對於猶太人的真實性質之無知，和我們上層階級的良知之缺乏，使人民易於受欺於猶太人的謊言，同時，上層階級怯懦的天性，使他們不敢接近那些被猶太人毀謗與謊言所攻擊的人，羣衆的愚蠢與腦筋之簡單，使他們很易於相信他們所聽見的一切。國家當局，有時噤若寒蟬似的不管，或者——其實是常常如此的——因為要中止猶太人筆戰的緣故，他們就處罰那些無端被人攻擊的，那些貴人的眼中，如此方能算國家當局之主張，與維持和平秩序。

由此，假如我們過細考察德國崩潰的原因，最末而無可置疑的一個，就是未看清種族的問題，尤其是未看清猶太人的威脅。

一九一八年八月大戰的失敗，我們很易支持。並不是這失敗顛覆了我們，而是造成

這個失敗的勢力顛覆了我們，牠剝奪了我們民族的一切政治和道德的良知，還有許多經過了幾十年的計劃而造成了這種失敗。對於保持我們民族的種族基礎這個問題的忽視，使舊帝國忽略了在世界維持生命的唯一定律。

種族純潔之喪失，永遠毀壞一個種族的幸運；這個種族將要繼續往下沉淪，其影響永遠存在心身之中。

因此，一切改良的企圖，一切社會工作，一切政治的努力，每種經濟繁榮的增漲，每種科學知識的發明，一切的一切，都是毫無補益的。使生命在世界上繼續的民族與組織——即國家——不會漸漸強盛，反而日漸衰敗。舊帝國的光榮也掩不住內部的弱點，對於帝國增加強力的企圖，每次失敗，因為他們疏忽了最重要的問題。

這就是因為什麼在一九一八年八月時，一個民族不能以充分的決心衝入到戰場的原因；這是我們民族自存之本能，與破壞我們民族肢體的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相遇時的迴光返照。但是自那個不幸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認清了內部的仇人，一切的抵抗都是無

補於事的，上天並不酬報勝利的劍，而是要循着報應不爽的定律的。

人才與國家的觀念

人才是國家的靈魂，最可寶貴。古今中外，凡是得人才者興，失人才者亡。文王渭水訪賢，先主第 廬三顧，治世之君，莫不求才如渴。今也如何？管小跳梁，瓦釜雷鳴，人才與草木而同朽，志士潔身而隱名。把國家重大的責任，由一般自私自利的飯桶，隨意擺佈，弄到國土日削，民生日蹙。希特拉對於人才與國家的關係，認識極其清楚，所以他說其好的組織，「必須努力安置有頭腦的人，於羣衆之上，而使羣衆都聽命於這些有頭腦的人」。又說：「國家主義堅信競爭，注重領袖的人才，使其成爲國家的柱石」。所以「最好的國家制度，是以國家的權力，選出最有頭腦的人才，以做全國最有權威的領袖」。雖然這只是短短的一篇數千字的文章，但是對於國家的人才問題之重要，已經揭露無遺了。百強附註。

假如我們沒有預備去追求最後的結果，只有傻子才這樣希望，一方面以個人所屬的

種族來較量個人的價值，一方面又站在馬克思的「人人都平等」的理論上來宣戰。

有人相信現代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以純粹的機械的方法和較好的經濟生活的組織，將與他國不同——這就是說，貧富更能妥協，擴大統制經濟，報酬也較平等，把工資的差異都消除了。這樣的人就是毫無世界的眼光。上邊所述的方法，不能希望持久；同時也沒有偉大的前途。一個國家信託這樣淺薄的改良，在各國的競爭中，一定得不到勝利。這樣的妥協，勢必不能有很大的改良，因為這些行動只涉及表面的事情。

爲更明瞭這事情起見，最好要看看人類文化的起原及其因素。

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者，實由人類之有發明的本領。當其與一切動物鬪爭時，人類有巧妙的方法，以駕馭各種特殊能力的動物。決斷力和事業心也由這樣鬪爭生出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能力之認識，實原於堅決的精神。這種精神非到幾千年後，將沒有公認爲一件極自然的東西。

人類除發明的本領外，還有一種物質。他從生存競爭中學到怎樣生活的方法。他開

始發明的活動，其成績到處都是。而這發明的本領是個人創造的能力的結果。人類之有繼續前進的力量，那創造的能力實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從前所用的簡單的器具，以助森林中的獵人去求生存，如今則有現代偉大的科學發現，以助現在的人去求生存，並且鍛鍊軍械以備將來的鬭爭。

發展純粹理論的工作，那是無法計算而又爲一切物質發現必要的初步工作，也是個人專有的產物。羣衆不能發明，大多數人也沒有組織或思想的能力；只有個人才能發明。假如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推進這些創造的力量，以爲社會造福利，那人類社會將有良好的組織。組織必須努力安置有頭腦的人於羣衆之上，而使羣衆都聽命於這些有頭腦的人。

所以組織並不使有頭腦的人不能超過一切羣衆，可是牠必須以有意識的行動，使牠能得到最大的效用。

生命須戰勝一切東西，是使有頭腦的人出類拔萃的原因。

國家的行政和國家在防務上的力量，完全受有勢力的人的操縱，而國家的元首更負很大的責任。

現代的政治生活，大抵和自然的原理相背馳。雖然一切人類的文化只是領袖們創造的力量產物，可是多數人的尊嚴要冒充爲最大的犧牲，而且逐漸毀壞一切民衆的生命。猶太教對別的國家的破壞工作，根本上就要破壞猶太人所住的國家裏的領袖人才的重要，而代之以羣衆的意志。

我們現在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猶太人要消滅領袖人才在人生各方面的重要性，而想代之以多數的羣衆。在政治上議會制度就算一個代表，這制度的弊端無窮，從最小的區鎮直到整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都是這樣。

馬克思主義不能成立一種文明，或者獨自創造一種經濟制度；進一步說，他不能按照自己的主張來施行現存的制度。可是在短時期後，牠又不得不退回頭來承認領袖人才的論理。國家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絕對相反的；國家主義堅信競爭，注重領袖的

人才。使其成爲國家的柱石。這是世界觀的基本成分。

國家應繼續努力使一切政府，尤其是高級的政府，脫離民衆的管理，藉以獲得元首神聖的權威。

最好的國家制度，是以國家的權力，選出最有頭腦的人才，以做全國最有權威的領袖。

大多數人不得決定，只有少數人可以決定，「顧問」這個名詞可恢復古代的意義。每個人的左右都有顧問，不過最後的決定，須歸於一人。

沒有專門智識的人，國家不會去請教他一切有關專門性質的問題，如經濟學的問題。國家將把代表團分爲若干政治委員會。各委員會代表各職業和商業。在職業和商業的委員會上面，還有一個特別的參議，使牠們更能作有益的合作。

立法院沒有決定的權力；立法院是執行事務，不是議決。個別的委員會有訓導權，而沒有議決權。這議決權是責任總統在任職期內的特殊權利。

讀者須記得國會由多數表決的原理，不能時常管治人類。反之，在人類歷史上國家崩潰的短時間內，這原理，才能見諸事實。

無論如何，請讀者不要以為上峯的純粹理論的計劃，會發生如此的變動，因為從理論上說來，國家的憲法不能加以阻止。一切立法和國民的生命都寄託在這裏。這樣的革命只能由一種運動實現，運動的本身，建築在這意義的精神上同時這運動也是後來國家的產生者。

所以現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須與其主張相符，並且須在自己的組織內實行。這樣，不但能指導國家上正確的軌道，而且能準備一個健全的國家，以執行其職務。

反赤運動之經過

法西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大勁敵，所謂瑜亮不並存，參商不相見，在政治的立場上，非拚個你死我活，不肯罷休，德國自希特拉領導法西斯運動以來，全國震撼，當然一般馬克思的信徒，不能熱視無觀，袖手旁觀，結果只好硬着頭皮，起而作堅決的掙扎。我們只看希特拉描寫開會時，法西斯黨人與共產黨人的衝突情形，非但是「全場充滿着叫喊咆哮的聲音」，並且「水壺像子彈一樣，到處亂擲，椅腳弄斷了，玻璃弄碎了，咆哮叫喊，簡直是一場瘋狂的境界」；是何等的嚴重與緊張！因為希特拉抱着「最好的防衛是進攻」的宗旨，認為「和平的行動，須有武力做後盾」，而以「犧牲個人，國家才能永久生存」，所以非以全部的力量，打倒共產主義，而免德國被其赤化不可。「反赤運動之經過」一文，雖屬一種記事的筆調，但是希氏的勇敢奮鬥精神，於此表現不少。

百強附註。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我曾參加所謂資產階級的會議。我才知道一點資產階級的先知們的世界觀。我毫不驚異，因為我老早就知道他們對於說話全不在乎。我曾參加民主黨，德國國家主義黨，德國人民黨，巴維利亞人民黨等會議。最令我注意的是聽衆們的完全一致。參加那樣集會的人，差不多都是黨的信徒。他們這樣聚在一起，很像個打牌的局面，不像剛經過大革命的民衆。演講的人們盡力保守這些寧靜的空氣。他們朗讀演說詞，辭氣很像清楚的報紙。論文或帶研究性質的文章，免避一切強烈的辭句。演員到處穿插一些笑話，說笑話時自己便大笑，可是笑聲並不大。這樣一直說了三刻鐘之後，聽衆們已昏昏欲睡，接着就有人出場，關着開門，及多數聽衆們打呵欠的聲音。臨了，主席又請人唱德國的國歌。唱完就散會了。各人都飛奔出去，有的去喝啤酒，有的去跳舞廳，有的只跑出去呼吸新鮮的空氣。

國家社會主義的會議，從來不會「寧靜」。兩個不同的世界觀，互相憤恨，所以這種會在閉會前，斷不至唱出什麼愛國歌，反之，會員們只充滿着普遍的國家的熱情罷了。

在我們的會議裏，第一步須盲目的信徒，藉以養成主席絕對的權威。

在我們的會議裏，也有人持異議——如赤化的信徒們。他們來開會時，都有堅固的組織，中間雜着幾個煽動的人物，各人的臉上都呈現着「今晚我們要把你們打敗了」的表情。這事情常常都瀕於千鈞一髮的地步，幸虧主席毒辣的手腕，和巡警精密的防護，才可挫折敵人的陰謀。

赤化的黨徒們有好些理由來麻煩我們。我們經過嚴密的考慮之後，才貼出赤化的標語。我們的目的是想激左派的人物，使他們發怒，然後引誘他們來會，使我們得有機會和他們談話。

我們的敵人訴於「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成羣結隊來參加我們的會議，藉以使用無產階級的力量來打倒我們所代表的專制，反動的計劃。

開會前三刻鐘，工人即擁擠於我們的議場。他們好像火藥箱，一燃着導火線，馬上便有爆發的可能。可是事情並不是這樣。他們來時有如敵人，去時呢，雖不敢說和我們

聯合，但他們已開始批評自己的黨義了。以後就宣佈這樣的命令：「無產階級們呀，你們千萬不要到國家主義的煽動家的會場裏去罷」。同時，他們的報紙刊物也這樣改變方針。

人民感覺驚怪，何以忽然又改換方針。有一個時期他們視我們如人類的罪犯，報紙刊物上一篇一篇的文字，都盡量造謠，宣布我們的罪過。可是不久他們自己又相信這樣的攻擊，沒有什麼效力；實際上，這些行動不過幫助人對我們集中普遍的注意罷了。

爲什麼我們的敵人不能毀壞我們的會議呢？這理由不消說是我們敵人的領袖們的極端怯弱。一到危急的時期，這些卑鄙的人站在會場的外邊等候暴動的結果。

在這時候，我們不得不用高壓的手段。官廳的保護是靠不住的，因爲經驗告訴我們說官吏們都幫助這些搗亂分子。官吏們所能做的事，最多不過把會議解散了，而這解散，正是中我們的敵人的毒計。因此，我們決斷不用巡警來防衛我們的議場，免得羣衆對我們發生不信任。赤化的黨徒們每次和我們搗亂的時候，就有一班英勇的人起來作有

力的彈壓。結果，這些搗亂的人就被我們打倒了，而那些在後邊的人，也裹足不敢前來了。

統治我們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蹂躪方法，誰也知道是革命的原因。那次革命時，本來有許多人預備流血，後來倒沒有多大犧牲。當我常常和青年談話的時候，我將他們重要的職務，詳加解釋，並且說假如沒有權力做護符，世界上的智慧也不能保得住。溫柔的和平女神，必須與戰爭的神同臨，和平的行動須有武力做後盾。這樣一來，軍事訓練，各人都看做神聖的義務。犧牲個人，國家才能永久生存。

這青年們聽完話後，有什麼反響呢？

恰如一羣黃蜂一樣，他們奔赴搗亂我們會場的敵人，不問人數之多寡，不顧受傷與流血，心裏只充滿着這偉大的意義，肅清敵人擁護我們的運動。一九二〇年夏，那保護我們運動的軍隊，已略具規模，第二年春天又分爲好幾隊，以後又再分爲許多小隊。實力這樣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從那時候起，我們各種活動都逐漸增加了。

我們的黨員組織起來，去保守議場的秩序，是肅清困難的問題的必要手段。截到那時候止，我們的運動沒有什麼黨徽或黨旗。這些徽號的缺乏，很不利於我們，因為黨員沒有一定的徽章，將來與國際主義的黨員鬥爭時，也大不便宜。

在我幼年時代，這徽號時常激起我深刻的情感。戰後在柏林時，我曾參加皇宮前馬克思主義的民衆大會。一幅一幅的紅旗，一條一條的紅巾，一朵一朵的紅花，顯然給當場十二萬民衆以強有力的印象。我這才知道，無關痛癢的路人，多麼容易受這樣偉大莊嚴的東西所感動。

資產階級並不是代表什麼世界理論的政黨，所以沒有旗幟。他們的黨員只是一些「愛國者」。到外邊去時，只有皮膚的顏色可以做代表。

舊帝國的黑白紅的國旗，現在照樣給所謂「國家資產階級」使用。

過去因環境不佳，致被馬克思主義打敗時所用的旗幟，現在當我們打倒馬克思主義的時候，自然不該再沿用舊的東西。雖然有許多人敬愛舊的國旗，因為他們曾爲那面旗

去交戰，並且犧牲了不少生命，但是這舊旗在將來的鬥爭時是毫無用處。

因此，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認爲假如掛起舊旗，結果不能代表我們所追求的目的。因爲我們不喜。歡。從。故。國。的。餘。燼。裏。起。來，我們倒願意自己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我們現在所幹的打倒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一定要有一種國旗，足以代表新的國家。

我自己時常都保守舊的旗色。經過多次試驗之後，我才決定最後的樣子：這旗是紅地，中間有一白色的圓面，畫着黑色的卍字。經過多次研究之後，我才決定各旗色大小的比例，白圓面的大小，及卍字的式樣和厚薄。從那時候起，國旗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維持治安的衛兵所穿的帶徽的短袖上，也有同樣的黨旗——就是紅地白圓面，中有黑色的卍字。

一九二〇年夏天，新的國旗才見於光天化日之下。兩年後，我的黨員越來越多，這具有新世界的理論的組織，更需要一個特別的徽號——就是旗子。

那時候，慕尼克沒有一個黨敢和馬克思主義對抗，更沒有一個國家主義像我們這樣

敢起來作示威運動。舊的會場容不了許多人，所以我們另去找當地最大的會場。

一九二一年正月底，德國又有不少激動人的事情，巴黎協約簽訂以後，德國須賠償二千二百六十億金馬克，而這事又以倫敦最後通牒的方式，來迫我們承認。

一天一天過去了。這個偉大的事變，沒有一個政黨肯加以注意，同時國家主義的團體，也不能決定什麼時候可以實行已定的計劃。

二月一日（星期二），我要求最後的決定，展延到星期三才決定。那天我要求那個會議到底是什麼時候才能舉行，結果也得不到一定的答覆；不過大體上是決定下星期三舉行。

我不能再忍耐了。我打算自己起來領導示威運動。星期三正午，我化了十分鐘，口授標語，並且借到一個場所備第二天應用。

那個時候，危險達到極點。我們黨員的數目，不知能否填滿那個大廳，同時，那個會議也有被解散的危險。一件事情已經鑄定了——我們一失敗，必須等了好久才能恢復。

我們化了一天去貼標語。不幸到星期四早晨就下雨了。我們虞慮一般民衆將甯願坐在家裏，不肯冒着雨雪，跑來開會，尤其是那個會的結果或不免暴動和屠殺。

星期四那天，我雇了兩輛運貨車，全部都用紅色，並懸掛兩面旗子。每輛車子載了十五個或二十個黨員；命令迅速開駛，沿途分散小冊子——和當晚召集開會的傳單。這是我們第一次掛着旗子在街上遊行。

當我走進會場的時候，我好像去年來這兒開會一樣，感覺得非常痛快。直到我從人羣裏擠到講台的時候，我才知道我們的計劃，完全成功了。會場在我們的面前，充滿着萬千的羣衆。

我的講題是：「前途或毀滅」。一直講了兩點半鐘。當我說完半點鐘的時候，我感覺這一次一定能收穫很大的成功。

資產階級的報紙，報告說那次的示威運動，只帶一點「國家主義」的性質；此外，一切發起人的名字，都略而不提。

一九二一年發動之後，我們在慕尼克會議的次數，也越來越密。我要每星期開一次會；實際上，在中夏和中秋的時候，我們一禮拜會開過三次會。我們常常在慕尼克會集，幾乎每晚的議會都有同樣的成功。

我們這樣成功，我們的敵人自然也不肯甘心的。所以他們以最後的努力，用恐怖的行動，在我們的會場裏發言。過了幾天，他們知道某天要在什麼地方演講，便打算及時發動。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那天下午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得到一個正式的報告，說我們的會已被解散了。

因為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弄得我們不能預先知道。那天我們正從舊的辦公處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去；這就是說，我們已從舊的地方搬出來了，可是還沒搬進新的地方去，因為一切事情都在進行。結果，只有少數懦弱無能的人在會場裏維持秩序，而警鐘的設備也不完全，弄到一點鐘內還不能召集救兵來援助。

我踱進會場的門廊時，正是七點三刻。會場裏人山人海，巡警不准人再進去。我們

的敵人，因為早到，都站在裏邊，我們的朋友都在外邊。少數衛隊在門廊等我。我叫人把大門關起來，召集那邊的四五十人到我面前。我對年青的人說，今晚是第一次試驗我們運動之成敗，我們誓不離開這議場，除非我們死了才休；但是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肯捨棄我們的。假如我看見有人帶着畏懼的神色，我就把他帶徽的短袖撕掉，他的徽章也拿走。我對他們說，如有散會的現象時，他們須立即前進，並且須記得最好的防衛是進攻。

我博得三次喝采，那喝采的聲音從來都沒有這樣熱烈過。

以後我走進議場，親眼看見這情形。他們坐在一團，意圖中傷我。無數的臉孔向我表示仇恨的態度，有人也大聲叫號。他們知道自己是強有力的政黨，而心裏也這樣感覺。

可以開會了，我就開始演講。大約講了一點半鐘後，我們看見敵人的信號已發。少數人很憤怒地亂叫，有一個跳上檯子，喊道：「自由」！說完，那些爲自由而奮鬥的人，就開始動作。過了幾分鐘後，全場充滿着叫喊咆哮的聲音，此外，水壺像子彈一樣到處

亂擲；椅腳弄斷了，玻璃弄碎了，咆哮叫喊，簡直是一場瘋狂的境界。

我還站在那邊，看我活動的年青人的動作。這鬪爭一開始，我們的狂風暴雨似的軍隊就來進攻。好像狼子一樣，八人一羣，十人一隊，一直闖進敵人那邊，把敵人全數趕出去。五分鐘後，我看見沒有一個人的身上沒有血跡。我這才知道我們的本質，爲首的一個是赫斯(M. Hess)，現在爲我的私人書記，及其他勇士。他們雖然受傷得非常厲害，可是還努力奮鬥，不肯稍懈。

在會場的角落裏，還有一大批人照樣反抗。忽然有兩枝手槍的彈子直射到講台上，接着就有一陣軍器的響聲。現在一想到當時的戰鬥，我們都不勝喜悅。不過發手槍的人到底是誰，實無法知道；無論如何，我們的青年，越打越有精神，直到最後的一個搗亂份子都給我們趕出議場外。

這事情化了二十五分鐘，結果，我們得最後的勝利。那晚上的主席愛瑟君(H. Essler)還說：「這會繼續開下去；讓演講員說罷」。所以我又繼續說下去。

會一開完，巡官突然跑進議場，揮着手，大聲叫道：「散會罷！」我只有發笑；這真是官吏的誇大。

那晚上，我學了不少東西，而我們的敵人也得了不少教訓。

截到一九二三年秋天止，閔行納報 (Munchener Post) 關於無產階級的力量還一字不提。

羅素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一八二

歐戰後德國之聯盟政策

歐戰後失敗了的德國，真可說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國家了。失地賠款之不足，還要受列強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種種的支配和壓制。處於此種局面之下，德國人應該走向那一條路線，努力復興與警恥呢？希特拉說的頂爽快：「已失的土地，不能叫上帝或國聯代為收回，只可訴諸武力，才有希望」。因為「別

的國家之所以想和人家聯盟。爲的是想從中得到一點便宜，德國在現時的貧弱狀況下，誰肯和德聯盟呢？這真把各帝國主義勢利的心理，一刀見血的說穿了。而況更有德國不共戴天之仇的法國，「永遠希望，防止德國變成一個強國」！所以希氏鄭重的說：「我們一定要爲我們祖國的生存，爲我們國家的團結，爲我們子孫的生活而奮鬥」，「我們應努力打倒的敵人，就是那班剝奪我們生存的人」，而這種工作，「成功的第一個條件是：必須幹到徹底」。希氏堅決不撓的精神，就是他人格之所以偉大之處。凡是

曾經喪失了土地的國家，讀此文後，當能憬悟向國聯搖尾乞憐之不足恃，而唯有訴諸武力而後可，古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西諺亦有「天助自助者」，若徒希望國聯主張正義，代為索回失地，真是癡人夢說哩！

百強附註。

德國外交政策的轉變，及其不能遵從聯盟政策的正確原理，不但在革命後還是這樣，而且越弄越糟。歐戰前政策的混亂，也許可以歸咎於外交上不良的國家領袖，可是戰後，實在因為缺乏忠實的意志。那個以革命的手段，去達到破壞目的的政黨，顯然不注意聯盟政策的，因為這政策是主張再建德國的自由邦。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還是一個無名的小團體的時候，就我們的黨看來，外交政策的問題，不是什麼一回事。為得在國外自由而奮鬥的初步工作，是應該先除掉那般使我們國家崩潰毀壞因而從中得利的人。

我們這個不重要的小團體，一到擴充工作的範圍，變成大團體的時候，立刻就會注意到外交政策的發展。我們決定實行的原理，不但要無背於我們的基本觀念，而且要把

這觀念真正表達出來。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當前重要的基本意思，是外交政策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這目的完全在於鼓勵我們自己的國家。外交政策的提示，實不外下列的事情：這個政策是否有益於我們現在和將來的國家。

此外，我們應考慮關於恢復國家失地的問題，就是為祖國恢復政治的權力和獨立的問題。就這情形而論，恢復土地又比較再得祖國自由的問題為輕。因為被壓迫的破碎的種族或帝國內的一個省分，不能以被壓迫的人民的要求或反抗，使之發生效力，只是以祖國所遺留下來的各種權力，才可達到目的。

空口反對，不能收回被壓迫的土地，武力進攻則反是。國家領袖的責任，內政要鍛鍊武力；外交須結合同志，向一定的目標努力。

我曾經說過大戰前我們聯盟的政策缺少熱心。在歐洲內沒有一個完全的疆域政策，我們的政治領袖反而喜歡有個殖民地和商業的政策。這簡直是荒謬之至，因為他們希望

避免武力。結果，把從前想統治各國的希望幻滅了，世界大戰正是不良的領袖使我們的國家弄成四分五裂。那正當的方法，是應該在歐洲得到一點新區域，以增強國家的力量。

因為我們民主國會的先驅們，從來不準備戰爭，在歐洲內侵略土地的計劃，也捨棄了，他們情願定一個殖民地和通商政策，反把英德聯盟（那時候很可能）犧牲了；同時，他們也沒有去找俄國來幫忙——論理應該這樣幹。結果，歐戰時他們一蹶不起，除哈斯堡皇朝以外，誰也斷絕關係了。

不列顛外交政策的歷史趨勢——德國則根據普魯士軍隊的傳統，與前者完全相反——自從伊里沙伯女王定個例子，要竭力避免和歐洲的大國發生戰事。為達到這種目的，英國按時勢的變遷而採各種不同的手段；可是意志和決心常常都是一樣。從前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獨立，使美國不得不往歐洲大陸去找一個能夠真正擁護牠的地方。因此，當西班牙荷蘭不再是強國的時候，英國的力量就集中反對新起的法國，直到拿破侖敗後，那最使英國害怕的軍力，也一敗塗地了。

英國對付德國的政治手腕的變更，是慢慢而來的，因為德國內部不能統一，對英國實沒有顯著的威嚇。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英國已採取新的態度。美國佔了世界經濟的重要地位，俄國之進為強國，使英國的政治手腕更加穩健，這些事情對德國都很不利的。

德國因工業非常發達，增進商業和世界政治的地位，自然使英國感着很大的威脅。我們的政治家以為拿和平的方法去侵略世界，是再聰明不過的，可是英國的政治家已利用這方法做有組織的反抗的根據了。事實上，這樣的反抗，實等於有組織的進攻，這與英國政治的目的正相符，因為牠本來不要維持世界的和平。只要設立英國的世界統治權而已。因此，英國聯絡各富強的國家，以便軍事行動，也與傳統的知人知己的一貫政策相符。英國這樣幹，自然不能說是「無所顧忌的」，因為能夠組織這麼完備的戰事，的確是有適應時勢的能力。外交的職務，應知道不要用感情或意氣去報效國家，反之，凡事都要以切實的方法來施行。這樣一來，各種路線都正確，不再陷於大錯特錯的毛病了。

德國革命後，英國不再害怕德國有統治世界的威權了。自然英國也不願意把德國的土地完全消滅。反之，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後，英國的外交又轉向另一方面；德國算敗了，在歐洲大陸上法國變成最強的國家。取消德國爲歐洲強國的資格，只是有利於英國的敵人罷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第二年夏天，英國的外交政策還沒有改換。

此外，爲避免法國的權力不至太強盛，英國惟一的政策，是參加法國去掠奪。事實上，英國沒有達到她所以交戰的目的。她並沒有避免一個新興的歐洲的強國；而且，這個國家越來越強盛。

現時法國的地位，真是蓋世無雙。陸軍方面她佔第一位，歐洲沒有一個可以和她相比，她靠近意大利和西班牙一帶的疆界，實在很安穩；德國的一方面，也不用害怕；她的綿長的海岸，正針對不列顛帝國的生命。

英國永久的希望，是維持歐洲各國間的均勢，因爲這是他稱雄全世界的必要條件。法國永久的希望，是防止德國變成一個強國。維持德國各邦間的均勢，沒有一個統

一的領袖。牠要保守萊因河右岸，以作稱雄全歐的保障。法國外交政策的最大目的，和英國政治手腕的趨勢，絕不相同。

英美意三國的政治家，沒有一個是「親德」的。每個有政治家本領的英國人，第一件須是英國人，美國的情形也是這樣。意國人不消說更是惟意國獨尊了。所以如有人以外國政治家有「親德」的傾向，擅自與外國聯盟，這個人非不智卽不忠。

實際上，我們現在應答覆下列各問題：自德國完全失敗後，那個國家不怕法國軍事上經濟上絕大的勢力呢？爲自己存在的問題和傳統政策這方面着想，那個國家看法國這樣發展而不感覺自己的前途不受威脅呢？

我們一定要認清法國是德國不共戴天之仇；法國的外交政策不外要將萊因河一帶的土地，攔而有之，必先把德國弄成四分五裂。

英國不喜歡德國變成世界的強國；法國不喜歡德國變成任何強國——此處有很大的差異！現在我們並不爭什麼世界強國的地位，可是我們一定要爲我們祖國的生存，爲我

們國家的團結，爲我們子孫的生活而奮鬥。由這一點看來，只有兩個國家還可以和我們合作：英國和意國。

英國生怕法國的軍力之無限發展，對於英國很不利；法國軍事上的勝利，正是大不列顛帝國的致命傷。

法國在歐洲的地位增高，意國自然是不喜歡的。意國的前途，大概是靠地中海一帶土地的發展。她這次參加大戰的動機，並不是想給法國增光，而是決定給她的勁敵在亞特利亞海 (Adriatic) 以致命的打擊。歐洲大陸上法國有一寸一尺的進展，就等於意國的前途有同樣的縛束，意國絕對不會相信國際的關係就能取消國際的競爭。

冷靜小心的考慮告訴我們說，這兩個國家——英國和意國——與我們德國生存的要素，沒有多大的衝突，並且，實際上還有某種事是共同利害的。

德國在現時的狀況下，還有別的國家肯和他聯盟麼？沒有。別的國家之所以想和人家聯盟，爲的是想從中得到一點便宜，德國在現時的貧窮狀況下，誰肯和他聯盟呢？我

們現在既不能和人家聯盟，怪道那一批強盜們都一齊聯合起來。

德國如再受挫折，對於英國國家的政策沒有什麼益處，可是那班操縱國際金融的猶太人就得益不淺了。猶太人不但希望德國永遠受經濟的挫折，而且希望她完全做政治的奴隸。所以猶太人是破壞德國的最大煽動者。

猶太人思想的傾向很清楚。他們不過想赤化德國——這就是說，把德國的智識份子腐化了——然後以猶太人所操縱的世界金融，分散德國勞動者的力量，以作擴大征服世界計劃的初步工作。

在英意兩國，真正政治家的眼光，和猶太人金融世界的要求，大不相同；是的，這兩者的差異是太明顯了。

只有法國內創辦交易所的猶太人，和好鬥成性的法國政治家的意思相符。這兩者的相合，對於德國大有危險，所以法國可以算是德國最大的敵人。

英國將來能否和我們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聯合，現在還不易斷言。德國猶太人的刊

物，常常集中憤恨英國，而許多無知的德國人，甘受猶太人拿去做反對英國的宣傳材料而已。我們愚蠢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現在應該覺悟了。我們現在所要爭的東西，並不是什麼「海權」。就是大戰前我們在歐洲的地位還沒有穩定的時候，我們也不該那樣笨，費盡心力去爭海權。因為這種希望，簡直是太笨，在政治上這樣笨就叫做罪惡。

我應該說出近年來猶太人又很巧妙地玩了一種把戲；這就是南台羅（South Tyrol）的問題。猶太人和哈斯堡人最喜歡妨害德國的聯盟政策，免得將來德國會恢復獨立的地位。南台羅之有利於猶太人的宣傳，對於牠並不是有什麼好處，不過大家都怕德意兩國間會發生諒解的可能。

是的，南台羅！

我要說當南台羅的運命被判決時——就是從一九一四年八月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就投身軍界。在這整段時間，我身經多少戰事，爲的是要保衛這地方。因爲南台羅不是荒謬絕倫的維也納會議賜給德國的，而是德國人從前線得來的。南台羅的喪失，

和其他德國地方的喪失一樣，是完全由於人民的賣國行爲。

大家須知道，已失的土地，不能叫上帝或國聯代爲收回，只可訴諸武力才有希望。最可恥的，是說話的人不相信自己的抗辯能夠得到什麼。他們也很知道空談實無補於事。他們之所以這樣幹，不過因爲空談恢復南台羅，比較用武力去奪回，容易得多。各人盡各人的本分；我們流血犧牲，他們袖手旁觀。

假如德國防止危害歐洲的腐化份子，她一定不至陷於大戰前天怒人怨的時期，並且能看清自己的最大敵人，集中全力去攻擊他。假如德國當真能這樣幹，結果一定能成功，而後來的人自然了解我們的需要和熱心，佩服我們的果決。

與危害德國的哈斯堡做聯盟，簡直是異想天開。現在我們的外交政策如再因循從前那種幻想，我們國家便永遠沒有復興的希望。

我們的政府一再灌輸這種虛張驕傲好勇鬥狠的精神，這有什麼用意？

一九一九年德國受和約的壓迫，這種壓迫對德國的解放倒有相當的幫忙。有時和約

的條件所加於某國的打擊，恰如將來復興的先聲一樣。

凡爾賽和約到底給我們增加了多少力量！每個條件都使我們國家感着切膚之痛，結果這共同的恥辱，共同的仇恨，深印我們六千萬男女的腦海中；一個鋼也似的意志由這些洶湧的羣衆中生出來，並且大聲疾呼道：我們還要鬥爭！

一切機會都失去了，什麼事情也做不出來。誰還驚疑我們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呢？除非政府和公意決定與人合作，藉以保護他們爲自由而奮鬥的志願，像我們國家現時所處的地位，實在不宜和人家聯盟。

設備新戰鬥艦呀！恢復殖民地呀！……這種種呼聲，只要仔細考慮一下，就知道是空談，因爲實際上絕對做不到。唱這些高調的人，是有意弄成天怒人怨，他們忘記了一切成功的第一個條件是：無論幹什麼事情，必須幹到澈底。我們忘記集中國家一切的財力人力，與我們最大的勁敵以頂厲害的打擊，反而分散力量去對付許多國家，並且把我們和別國聯盟以作最後一戰的機會也犧牲了。

國家社會主義的使命就在於此。牠要教我國人忽略瑣碎的事情，專幹偉大的事業，不要旁逸斜出，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所奮鬥的目標，只是先求生存，而我們應努力打倒的敵人，就是那班剝奪我們生存的人。

此外，德國非把出賣我國的罪人責罰了以後，她不得採取世界各國所持的態度。

能夠和別國聯盟，以抗自由國家的不共戴天之仇，這班人豈不是代表國家的真正利益麼？譬如說，英國傳統的政治手腕能否打倒猶太人的力量，這個問題真不易答覆。要得最後的斷定，非先把有關係各種問題考慮一下不可。

法西斯蒂黨治下的意大利，現在努力和猶太人的三種主要力量鬥爭。雖然我自己不相信猶太人有這三種力量，但是也可以使我們知道猶太人所藉以搗亂東西。秘密團體被禁止了，獨立的超國家的刊物被壓迫了，國際馬克思主義被破壞了。

英國更困難了。猶太人操縱整個的「自由民主」的機關，間接就影響到輿論。可是英國內代表國家利益和代表猶太人獨裁世界這兩種人，會不斷地鬭爭。

大家一看大戰後對付日本問題的時候，這兩個對立的團體怎樣相互傾軋，一方面是英國的政治領袖，一方面是猶太人的刊物。歐戰才終止時，美日兩國的宿怨也再出現了。美國在國際經濟上政治上的成功，難免友邦的妬嫉。就是英國也很擔心，恐怕美國將來有握海上霸權的一天。

毀壞德國，對英國沒有什麼利益，可是猶太人真有莫大之利，恰如現在毀壞日本一樣，對英國也沒有什麼利益，可是對那個將來猶太人的世界帝國，真是再好沒有。當英國竭心盡力去維持她的地位時，猶太人就暗中準備征服世界的手段。

猶太人很知道他們曾經過千餘年適應環境的經驗，他們很有殲滅歐洲各種族人民的能力，不過這樣的事情不能施於亞東日本那樣的國家。

現在猶太人又鼓勵各國去反對日本，好像從前反對德國一樣。所以當英國打算和日本締結盟約的時候，在英國的猶太人的刊物同時就宣言反對這聯盟，並且以「民主」這個名義準備對日宣戰。他們的口號是：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

猶太人現在是英國的叛逆，所以反對猶太人之恐嚇世界，也應當從英國開始。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應知道我們國家須努力打倒我們的勁敵，使這黑暗的世界得復見曙光，使亞利安人在生存競爭中更能得到很多的利益。

論突擊隊的意義與組織

突擊隊就是挺進隊，亦稱狂鷹隊，是希特拉指揮下的一種武力組織，從事於黨的服務。突擊隊最初的動機，當然爲的是對付共產黨，因爲在法西斯蒂運動之前，德國共產主義學說極爲澎湃。如世稱「德國革命的祖世」，而亦爲列寧知友的柴特金夫人 (Mrs. Clara Zetkin)，以及德國國會議員，第三國際執行委員的台哈孟氏 (Thaumann)，均爲著名的共產主義熱心信徒。所以在反共的集會中，就免不了共產黨徒的搗亂。用武力來維持會場秩序，就成爲突擊隊原始的工作與職責。逐漸變成正式的隊伍。該隊的組織，以分隊爲基本單位，上而有中隊、大隊、聯隊、旅團、師團、軍團，每一軍團設總副指揮各一人。各軍團均直屬於總司令希特拉的統轄，突擊隊既爲希氏法西斯蒂運動的重要工具，所以「論突擊隊的意義與組織」一文，似乎確有一讀的必要。

百強附註。

舊帝國的力量靠在三個台柱上；君主、行政機關、軍隊。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除掉了，軍隊解散了，行政機關也交給腐敗的政黨了。因此，國家權威的重要的支持，都沒有了。國家常需要三種要素，而這些要素又在一切權威的基礎下邊。

權威的第一要素是「一致擁護」。不過權威如單靠這個基礎，未免太薄弱不定。第二要素顯然是「權力」。假如「一致擁護」和「權力」合在一塊，繼續存在相當的時間，權威就能得到更堅固的基礎——「傳統」的權威。假如「一致擁護」、「權力」、「傳統的權威」、合成一塊，那權威就永不會動搖了。

革命把這第三種機會除掉了。傳統的權威不能再存在。舊帝國的分裂，舊的徽號的取消，把傳統都毀壞了，結果，是給國家的權威以很大的打擊。

就是國家的權威的第二個台柱——權力——也不再有了。爲要革命成功，領袖們不得不顛覆國家的有組織的力量——軍隊；而他們又要用這零散的軍隊，以應革命的戰鬥的需用。

混亂的軍隊們，如以八小時工作的見地，來看軍隊的職役，國家休想得到他們的幫忙。因此，這第二要素也除掉了，而革命之所藉以建立權威的助力，只有第一要素

——一致擁護。

一個國家裏可以分爲三個階級：一邊是最優秀的份子，具有各種美德，尤其是能勇於犧牲，一邊是人類最下流的份子，自私自利，放佚淫侈。在這兩邊的中間，第三種人，最廣大的中層。他們既沒有英雄主義，又沒有卑鄙的行爲。

廣大的羣衆——就是我平常愛叫他們爲中層階級的——從來不會變成重要。當上下兩個階級相互鬥爭時，無論誰勝，誰負，這中層的階級，總歸附於勝利的一邊。假如善人專政，羣衆就從他們；假如壞人專政，羣衆也不會抵抗；因爲中層的羣衆永遠不會奮鬥的。

歐戰將完時的情形是這樣：國家最多數的中層，因爲義務的關係，不消說受相當的犧牲；那部分最優秀的份子幾乎全數犧牲；那部份最惡劣的小人，因受不良的法律的保

護，同時又不從他們應遵從的戰時法規，所以一個一個都倖免了。這些遺留下來的「潑辣貨」，後來就做革命，而他們之所以能使革命成功，實因國內不再有優秀的分子和他們爭執。

馬克思主義的權威不能單靠「一致擁護」的力量上。可是新共和國需要「一致擁護」，免得被我們國家所僅存的優秀份子起來討伐。

帶有革命思想而又實行革命的人，自然不能用軍隊去克服他。因為他所要的並不是組織國家，而是解散現存的國家；這種思想正與好亂成性的軍隊相吻合。他們的口號不是為德意志共和國的治安和建設，只想破壞國家罷了。

有一次許多年青的德國人，準備為和平與治安服務。他們穿上軍裝，負起槍彈，戴了鋼盔，以與破壞祖國的人相週旋。他們組織義勇軍，着手工作，隨時與革命反抗。他們這樣幹的時候，胸中大有信念。

真正組織和操縱革命的人物——國際主義的猶太人——早把事情看清楚了。他們知

道德國不像俄國，還沒到實行布希維克主義的時期。問題是這樣：前線的軍隊對這事情是怎樣的呢？後方的士卒會抵抗麼？

那個時候，德國的革命不得不採取謙遜的態度，因為恐怕會給兩三團德國的軍隊馬上打得粉碎的危險。假如只有一個團長下了決心，把紅旗拉下來，以手榴彈來壓服一切反抗，那末這一團兵不用一個月就變成六團了。猶太的陰謀家就最怕這事情。

革命不是以和平與治安的力量做成功，而是出於暴動，盜劫虜掠。革命的一再發展，這些事情似乎又用不着了。

社會民主黨逐漸得勢，把帶野蠻性質的革命也慢慢地除掉了。

大戰還沒終結的時候，社會民主黨自民衆的惰性裏得到牠的特質，恰如懸萬鈞於國防的頸上。激烈的分子聯合成一個新的積極的攻擊。這些分子包括獨立黨和斯巴塔克團（Spartacus Union）及馬克斯主義的暴動隊。不過當前線的軍隊退回來的時候，革命的路線就被取消了。社會民主黨本部是採取攻擊，把獨立黨和斯巴塔克團也加以克服。自然

這事情的發生，免不了有所鬥爭。當這變動還沒有開始時，就有兩個黨針鋒相對：一面是和平秩序黨，一面是流血恐怖團。在這兩面相爭的時候，資產階級自然會傾向於和平秩序黨的一方面。

結果，共和國的敵人不再來反對了，並且征討一切反共和國的人。此外，舊的國家的擁護者也再不會有反對新的國家的危險。

假如我們想一想，到這關頭，革命怎樣能夠成功，我們得到下列的結論：

(一) 因為革命把我們服從和義務的觀念消滅了，

(二) 因為統治我們國家的政黨太懦弱。

第一點根本上是因為我們的非國家的教育。由此就發生出手段與目的的錯誤觀念。

自覺心和義務服從的履行不是目的，牠們不過是達到使社會精神上物質上的生活都能完滿的手段。

革命之成功，因為我們的人民或政府已失去這些觀念的真正感覺，所以牠們只變成

具文。

就第二點而論，資產階級的政黨——可以說是舊國家下唯一的政治組織——相信他們應用智識的方法，來陳說他們的意見，因為只有國家才可以用具體的方法。可是有一個時期，政治上的敵黨已放棄這些主張，並且很坦白地宣言道，要用武力去達到政治的目的。

資產階級政黨的綱領，靠於舊國家的事務上；牠們的目的也有關於新的狀況，不過所用的唯一的武器，還是和從前一樣，就是單靠文字。

那時候有能力和勇氣反對馬克斯主義唯一的份子，在先有自由隊，後來有自衛的組織，最後又有傳統的勢力。

過去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是因為政治的決心和殘暴的武力的相互作用。國家主義的德國之所以沒有真正發展的希望，是因為缺乏政治的期望，以致殘暴的武力不能作有決心的合作。

國家主義的政黨無論有什麼期望，因為他們太沒有力量，不能以武力得來。

保守的團體擁有一切力量；他們是主人翁，不過缺少政治的理想和目的。不然，他們的力量一定很有利於德國。

猶太人以刊物的力量，專來傳播保守的團體的非政治性質的觀念，恰如在政治上猶太人故意注重純粹智識性質的鬥爭。

新的偉大的理想的缺乏，常常是戰鬥力缺乏的表示。凡相信有使用極兇猛的軍械的權利，恰如相信那新的革命的事情會在這世界上得勝利，是同樣的荒謬。

一個運動如不能為這樣高尚的理想和目的奮鬥，一定不能奮鬥到底。

產生偉大的新的理想，法國革命已找到成功的秘訣。俄國革命也是這樣，而法西斯蒂主義的力量，完全從德國整個革新的理想得來。

當衛國軍成立和團結時，馬克思主義逐漸得到力量，以擁護牠的權威，同時也捨棄帶有危隨性的國家主義保守的團體。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成立，是一種運動的第一個象徵。這運動的目的，不像資本主義的政黨一樣，只在保留過去的東西，而是在建設有機式的國家主義的國家，以代現時毫無意思的國家。爲忠於新主義的極端重要的信念，新的運動自然不惜犧牲一切，以達到此目的。

世界史上常有這樣的事情，大抵有世界的理論做根據的恐怖時期，不能用國家的權威去破壞牠，可是一個新的有同樣的勇敢和決心的世界理論，倒有克服前者的可能。固然國家的權威對於這樣的事情，會感覺不快，不過事實究竟是這樣。

國家給馬克思主義蹂躪了。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無條件在讓給馬克思主義後，此後斷不能忽然起來把牠克服。反之，竊居高位的資產階級，已空談萬勿反對工人。所謂工人，卽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意思。

我已經說過，爲着保衛我們的會場，我們曾組織了一隊兵，以後這隊兵又逐漸變成好幾隊，以維持秩序爲職志，並且努力前進，以形成有組織的團體。

那時候這些軍隊職在保衛會場。最初的職務，只是使一切集會都能開得成功，免得給我們的敵人無端阻止。本來訓練這些軍隊，爲的是進攻，因爲他們感覺到假如敵人團結成一體，什麼理想都達不到。在歷史上常常見到最大的領袖給宵小賤人結果了。軍隊的目的不在狂暴，而是保護有偉大理想的人免爲狂暴壓服。軍隊也感覺到他們的義務不是去保護那不保護民族的國家，反之他們是防民族受人破壞。

號稱爲突擊隊的軍隊，只是這運動的一部份，恰如宣傳一樣，刊物科學機關等只是黨的一部份。

成立突擊隊的真意，是要使她成爲國家社會主義的絕對擁護者，並力求其紀律之完備。而與資產階級的保衛組織，絕無半點相同，就是和一切秘密組織，也不相似。

那時候我所以嚴防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暴動隊不爲那所謂保衛組織，因有下列的理由：最切實的理由是，保衛國家不能以秘密的保衛組織來實行，假如沒有全國的力量做後盾。以自由規律來成立軍事組織，而望其達到一定的目的，自然不成功。因

爲缺乏施行法令的主要助力，就等於沒有信賞必罰的能力。當一九一九年春天，而可以號召一批「義勇軍」，因爲許多由前線歸來的兵士曾受過舊式軍隊的教育，可是現在的「保衛組織」，完全缺乏這種精神。

假定有一個團體，不顧一切困難，爲德國訓練出相當數目的人材，使有真摯的熱情，健全的體格；可是當局者的惡劣腐敗，對於這些真正的人材，毫不加以鼓勵，反而深惡痛絕，結果這些人材自然也不得所用。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前幾年國家犧牲了八百五十多萬受過高等訓練的兵士，現在的政府又準備以祕密的態度訓練幾萬人，這豈不是笑話麼？一個國家曾辱沒牠的尊貴的兵士們，剝奪他們的徽號，踐踏他們的旗幟，輕視他們的功業，像這樣的國家，還敢希望訓練兵士麼？退一步說這樣的國家也曾採取有效的方法，以恢復故國的繁榮，或者嚴厲懲罰破壞國家的人麼？沒有。現在竊據要津的人曾在蘭不茲 (Lampis) 說道：「公理與強權並立」。因爲現在執政的人就是當年籌備革命的人，因爲那次革命是代表德國歷史上最卑鄙的賣國行爲，所以成立新軍隊以增進

這樣的強權，實在沒有半點理由。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會反對的。

假如現在國家採取有訓練的保衛團的制度，這保衛團不能用來對付外國，只可當做平定國內的壓迫者和防備陰險狡滑的國家。

因為這緣故，突擊隊和軍事的組織，毫不相干。突擊隊不過在保護和教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他們的職務與所謂保衛的團體全不相同。

突擊隊也不是秘密組織。秘密組織的目的只在法外的行動。

我們從前和現在所需要的，不是要一百或二百思想錯誤的叛黨，而是十萬健兒爲我們世界的理論奮鬥。這個工作不該秘密進行，必須有強有力的羣衆的經營。這運動的途徑，不能用刀劍手鎗來開關，必須先把當局的人打倒。我們應教訓馬克思主義黨徒說，將來國家的統治權是在國家社會主義黨徒的手中，恰如他們將來也許會變成國家的主人翁一樣。

秘密組織還有一種危險，牠的會員們常常不能完全了解職務的重大，並且容易流入

這樣的理想，以爲一切國事，可以暗殺卽能得到成功，雖然在歷史上一個國家被專制暴君壓迫時，暗殺還可一試。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的時候，祕密組織的人物，被歷史前例的鼓動，受國家災禍的刺激，並且相信假如把國內一切腐敗的官吏殺死了，國家的不幸便會馬上終止。這樣的幻想簡直是太笨，因爲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不是少數領袖有特別的天才，而是由資產階級的非常無能和怯懦。

突擊隊既不是軍事組織，又不是祕密會社，牠的產生應根據下列的原則：

一、牠的訓練，不是根據軍事的原則，只是從有利於黨這觀念着想。牠的人員應該有健全的身體，隨時又有運動的訓練。我常常想到拳術和技擊比較射獵還重要。

二、爲避免突擊隊帶有祕密性質，不但牠的軍裝要得到普遍的承認，而且這組織所應走的路線，也應該明白限定和公佈出來。不該以祕密的手段去進行。

三、突擊隊的成立和組織，在軍裝和設備上都不宜抄襲舊式的軍隊，須加以選擇，以適合當前的職務。

突擊隊在後期發展的過程中，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一九二二年深夏在慕尼黑舉行擴大示威運動，以反對那保守共和國的法律。國家社會主義黨也參加了。那次的示威運動，是由六個慕尼黑的團體發起，又有政黨的支部贊成。我躬逢其盛，得有機會和六千左右的羣衆演講。那次的設備非常周到，所以雖有紅軍的恐嚇，而國家主義的慕尼黑還能夠在街上遊行。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往柯堡（Colber）之遠征。某國家主義的團體決定在柯堡舉行德國紀念日。我被邀赴會，並且帶了幾個朋友和我同行。我選出八百名突擊隊，搭了專車，直赴這個小城市，該地是巴維利亞之一部分。

在柯堡火車站，有個德國紀念日籌備處的代表來看我們。他說這次會是本地工會——就是獨立黨和共產黨——籌備的。我們進城時不宜飄搖旗幟，打動音樂隊，更不宜整隊進行。這些恥辱的條件被我拒絕了。對於籌備這「紀念日」的先生們，我也不能不表示驚訝，因為他們既和那樣人有所磋商，又想和那樣人有所協定。因此，我決定飄搖

旗幟，打動音樂隊，馬上整隊進城。

在火車站的大廳，有好幾千人向我們叫喊。他們亂叫「暗殺」、「土匪」、「強盜」、「罪人」等惡名，可是我們的突擊隊還是照樣維持秩序。我們直入全市中心點的市政廳。為避免羣衆跟我們進去，巡警把門鎖上了。這事情怎能容忍得下去，於是我就叫巡警把門打開。他們遲疑了好久，這才允諾了。我們照原路回去，最後碰着那些叫喊的羣衆。那真正社會主義，平等友愛的代表，拿石子擲我們。我們再也忍不下去了，所以往左右前後打了十來分鐘，再過幾分鐘後，街上已沒有紅軍了。

國家社會主義黨正在危急狀況的時候，突擊隊的巡查隊，就來援救我們。我們把敵人擊退。第二天早晨，柯堡城所受多年的紅色恐怖也消除了。

第二天我們走到街市，聽說將舉行有一萬工人的示威運動。所謂一萬人，其實當我們走近去看時，只有幾百個人能保守鎮靜。有從外地來的而又不認識我們的赤化分子，老是想和我們鬧一鬧；可是他們即刻又不想這樣幹。那些從來都很怯懦的民衆，到這時

候已逐漸覺悟起來，並且有勇氣向我們歡迎。當那天晚上我們離開該城時，他們同聲喝采。

我們在柯堡城的經驗，表明突擊隊穿着同一的制服，是多麼重要。制服不但可以增強軍隊的精神，而且可以免得誤認敵人。截到那時候止，突擊隊只有帶徽的短袖，可是現在軍裝軍帽都很齊備。

我們知道到什麼地方去，都應該有一定的計劃。因為歷年來紅色恐怖，使各種人都不能開會，所以我們必須消滅紅色恐怖，恢復開會的自由。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發生一樁事件，使我不得不轉換我們運動的方向。

那年的年底，魯爾 (Ruhr) 給法國佔去，這件事後來在突擊隊的發展上有很大的關係。

從國家的利益上着想，現在還不該公開說出或記下這事情。魯爾的被佔，我們毫不驚異。我們覺得我們應停止怯懦屈從的政策了。保守的團體也應該有一定的工作幹。同

時，含有幾千個年青力強的突擊隊，自然也要爲國家服役。等到一九二三年春夏間，突擊隊才改編爲正式的軍隊。那次改編，全因那年我們運動發展的結果。

一九二三年年底的事件，初看似乎很討厭，但是，從遠處着想，覺得是不得已的事。因爲突擊隊忽然叛變，對我們運動很有害，所以一網把牠打盡。同時，那次事件使我們重新組織時須另採一個路線。

一九二五年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再成立了。牠們根據上述的原則組織了突擊隊。牠的最高義務是使突擊隊爲世界理論的運動做防衛的工具。

突擊隊不該變爲秘密組織；牠一定要想办法去保衛一萬個有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人。

墨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二一六

何謂國家

國家是由個人結合的集體。自來持「國家有機論」(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者，多以國家

一有機體，而視個人爲其中的構造細胞。這樣就把國家與個人打成一片，而調整其間一切的衝突，所以國家不能無個人，而個人亦不能離國家而獨存。強盛的國家，必須有健全的人民，這是一般政治學者所公認的。所謂健全的人民，當然是有勇於負責、耐勞、犧牲、勤苦的精神。本文中，特意指出「國家的職務，是把青年人鍛鍊成一副有用的工具，以增進後來的種族」。「更應注意不要生育遊手好閑的人」。懶惰的民族，絕不會成立偉大的國家，而偉大的國家，亦絕不容有懶惰的民族。所以我們要認清國家，必須先認清個人，「砲台不足恃，斯可恃者只是男男女女對國家的愛敬和熱誠」。此言誠是也。

百強附註。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控告我們的青年運動。他們說我們對國家是採取拒絕的態度；所以各黨的政客們堅持用種種方法，來撲滅新世界理論的生力軍。他們有意忘却在小資產階級的社會裏，國家不是什麼同一性質的東西，就是這個名詞也沒有一定的界說。可是在我們國家的中學校裏，教師們演講國法，他們的職務是為糧食分配的中央機關，找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解釋。在二十世紀最畸形的國家裏，皇家的教授怎能寫出國家的意義和目的呢？真是一件難能的事情呀！

德國的人民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的人民把國家當做政府統治下一切人民的自願結合。國家的存在，從他們看來，只在要求神聖的不侵犯。擁護人心這種瘋狂觀念的人，都遵從所謂「國家權威」的崇拜。因此，一反掌之間，他們把手段變為目的。國家不是為人民服務，可是人民必須崇拜官場意味十足的國家的權威。

第二類的人民不相信國家的權威是國家唯一的目的，雖然他們相信國家會促進人民

的福利。大部分都因為誤會「自由」的思想，以致陷於這一類的國家觀念。實際上，政府形式的存在，不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不過須試驗其能否適用。普通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民主黨人都贊成此項意見。

第三類人民在數量上是最少。他們把國家當做一種媒介物，藉以實現同一語言的國家達到武力政策的趨勢。

不幸過去一世紀的人民，時常堅持這種主張——玩弄「德國化」這個名詞。我還記得年青時候，這個名詞生出多少錯誤的觀念。在泛德國的團體裏，有人提議說，如得政府的幫忙，奧地利，斯拉夫人民的德國化，頗能實現。

真是出人意外，有人以為一個黑人或中國人因為學過德文，預備終身用德語說話，及為某德國政黨投票，就可以變為德國人。

這個方法就使我們的種族開始變為不純正。從我們的情形看來，不是什麼德國化，只是德國成分的毀滅罷了。

因爲國家或種族，並不是什麼語言的問題，而是血液的問題。假如這方法能改換所屬人民的血液的性質時，然後才能談到德國化，這自然是不可能，混合血液也是一種辦法，惟其如此足以使高等種族的地位降低。

歷史昭示我們把土地德國化了。這土地是我們的祖宗以武力得來的，僑居德國的農民，獲益不少。無論何時，外國人的血液一和我們的團體相混合，結果就會打破我們國家的特質。

我們所應注意的大道理是：國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高等人類的文化站在這基礎上，但不是由牠生出來。世界上也許有幾百個模範的國家，可是，亞利安的文明如已滅亡，那末現時最大的國家及其認識文明也不會存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人類成立國家，也無法免却種族的滅亡，假如高等的智能和適應的能力，得不到一個種族來保守。國家不能創造一定的文明標準；國家只能包括那決定文明標準的種族。所以產生高等人類的必要條件不是國家，而是賦有這重要性質的種族。

賦有文明的創造能力的國家或種族，有這些有用性質的潛勢力。有時環境不利，就會阻止這些性質的發展。所以謂基督誕生前的德國人民爲沒有文明的野蠻人，實在太奇。德國人民永遠不會這樣。北部嚴酷的氣候，迫他們不能發展創造的性質。假如沒有典型的古代社會，假如他們已跑到南方很順利的土地，而得初期器械的幫助，那末他們本有的創造文明的能力，一定如希臘一樣，會產生一種燦爛的文化。

國家所努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保存古代種族的成分。那些成分因傳播文明，創造高等人類的美麗和莊嚴。我們亞利安人可想見國家只是民族的有機組織。國家不但能維持民族，而且能養育智識和想像的能力，以達到最高等的自由。

可是現在我們的國家是人類極端錯誤的產物，好像去追求說不出的禍患一樣。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知道現世界因爲我們的意見不同，把我們當做革命家，並且也這樣詆毀我們。可是我們的思想 and 行動須堅決聽從我們所承認的真理，不應該受這時代的毀譽的影響。我們相信我們賢慧的後代不但會瞭解我們現在的行動，而且會承認我們的行動是

不錯，而加以重視。

說到國家的最大使命，我們不應忘記這個使命大半在民族裏。國家的職務只在利用牠的組織能力，以達到促進國家的自由發展。

可是，我們如同我們德國人所需要的國家應怎樣組織。第一步我們須明白，到底爲什麼樣的人而產生國家。

不幸，我們德國民族的中心不是同類的種族。我們知道各種的混合，會發生一個新種。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外族的血液混入我們的民族，這樣，對我們自己的血液和靈魂都有損害。西邊境外，那些非德國的民族，不斷地侵入我們的內地，使我們的血液時常有外族的成分。

德國人缺乏合羣的天性，使國家免於危亡。這種天性的缺乏，給我們不少害處。牠供給各小君王以土地，結果把德國各種超越的權利都剝奪了。

一架死的機器的存在，本無所謂；可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應該向高尚的目標努力。

以國家的資格而論，德國應把全體德國人集合起來。不但要選擇和保存原來德國民族最優秀的份子，而且要慢慢地把他們提高到統治的地位。

自然現在統治我們國家的官吏們，喜歡維持現狀，而不願爲將來的事業去奮鬥。他們覺得最好把國家當做一架機器，只要這機器能合他們生存就算了——所以，他們都愛這樣說，他們的生命「屬於國家」。

我們爲新的意義奮鬥時，我們將由大多數身心都已無用的人中，選出少數同志。那些生氣勃勃腦筋清新的老年人，自當別論，他們會來幫助我們的。不過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想，生命的最大意義只在維持現狀而沒有變動。

我們須記得，假如將國家的英俊集合起來，共赴唯一的目標，並且脫離一切羣衆的阻力，這少數人物照例能做多數人的主人翁。世界的歷史是少數人造成的，因爲他們會得到整個民族的意志和決心。

因此，有些事情對多數人似乎很不利，實際上是我們成功的必要條件。我們的工作

如此繁重，須糾合善戰的人物，共同奮鬥，才有希望。選擇優秀的人才，才可以操着成功的左券。

國家的第一個職務是提高婚姻的制度，免得種族永遠蒙恥辱。這制度應設法產生上帝的子民，不是產生怪物，半人半猿。

站在所謂人道主義的立場來反對，似乎不合這時代。在這時代裏一方面允許身心俱壞的人生育子孫，致增加現在和將來的人的負擔；另一方面藥房和街頭小販都發售避孕的藥品給身體健全的父母。在這小資產階級的社會裏，叫患花柳，肺癆，遺傳病，跛足的人避免生育，就算犯罪；可是實際上幾百萬優秀的人民之沒有生育，這假神聖的社會倒不算什麼一回事。這種舉動，徒安慰沒有頭腦的人罷了。不然，他們也會搜索枯腸，想法子栽培保護我們國家健康的分子，使他們將來也能盡相同的職務。

理想與名譽在這整個制度裏是多麼缺乏呀！沒有人肯爲子孫的緣故而努力栽培最優秀的分子，一切事情都是得過且過罷了。

國家的職務是在拯救一切墮落的事情。國家應把種族這問題做國家生命的中心，設法保存純粹的種族。兒童是國家的寶貝，只有壯健的人可以生小孩——這就是說多病無能的人生孩子，是無限恥辱，反之，這種人如能避免生育，倒是光明磊落的行動。對於這件事，國家應加以醫藥上的幫忙。此外，國家應通過一議案，宣布有遺傳病的人不宜生育，同時，健康婦人的經濟狀況也不可忽視，免得她們把生小孩看做一件累人的事。

教育個人的時候，國家應教他們說，對於個人的痛苦懦弱還不是怎樣羞恥，不過把自己的不幸要無邪的小孩去負擔，未免有點罪過和羞恥。假如一個病弱的人自己願意不生小孩，將他的慈愛溫存施給一個會強國強種的外人的小孩，這樣高尚的行爲實在值得敬慕。教育的工作，國家應達到完成。他們智識上的實際活動。無論人家理會不理會，通行不通行，國家應毫不顧忌地實行牠的議案。

國家也許能夠自覺地達到一個很光明的時期，各人不再注意馬狗貓的生育，而願提高人類的生活狀況。在這工作的進程中，有人會悄悄地放棄學問，有人也情願犧牲。這

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這世界上有成千成萬人自願過獨身的生活，一切行動却唯教會之命是聽。

假如一代人明知其過失而又這樣幹，並且自鳴得意，毫無改善環境的企圖，如我們現在的小資產階級一樣。這樣的社會是一定要歸於滅亡。

我們不再受騙了。我們現在的小資產階級太壞，不配做人類的重要事業。我這裏所謂太壞，不是指道德墮落，而是指太懶惰。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只代表一些特別的階級和職業的團體。他們除致力謀得自己的利益外，幾乎無所事事。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團體，實在不配做鬥爭，尤其是敵方已擁有意志堅決的羣衆的時候。

國家的職務是把青年人鍛鍊成一副有用的工具，以增進後來的種族。要達到這種目的，國家應指導其教育工作。第一步，要造成健康的身體，然後發育頭腦。人格的修養也很重要，尤其是鼓勵堅決的意志，教授責任心的樂趣。最後才授以純粹的學問。

國家應相信，一個受普通教育的人，如有健全的身體，堅決的人格，而且富於自信

力和決心，較之一個受高等教育而懦弱的人，對於社會更有用處。

身體的鍛鍊，不單是個人或父母的事情。可是身體是維持種族的必要條件，國家應加以保護。教育的工作，國家應好生分配，使青年人在童年的時期就受過嚴格的訓練，以備後來的需要。國家應更注意不要生育遊手好閑的人。

國內一切學校應有很多時間作身體的鍛鍊。清晨或下午，在操場或在運動室，小孩們不可一日沒有一點鐘身體的訓練。特別有一個遊戲不該忽略，這就是許多國家主義者視爲粗暴無價值的「拳術」。他們以爲青年人應學怎樣決鬥的方法，可是他一打拳，他們又視爲粗暴。爲什麼呢？沒有一種遊戲像拳術這樣能夠鼓勵鬥爭的精神；拳術需要敏銳的決斷力，並且使身體康強。兩青年用拳來對打，總沒有用鋼鞭相敵那樣粗暴。

假如我們整個智識階級不單受高等禮貌的訓練，而完全學習拳術，那些暴徒式的德國革命將不會實現。因爲我們的高等教育不造就普通人，只栽培官長，工程師，化學家，法學家，文學家，大學授教，所以才發生革命。

我們的知識領袖常常生產燦爛的成績，可是我們意志的訓練，反不值一評。

德國現在被人侵略，已陷於危急存亡的狀況，非有自信的力量，實不能救亡。這自信力應從青年們培養起來。青年們所受的教育和訓練，應使他們相信自己是超越別人。同時，體育和技能的增進，也使他們相信德國是永遠不會滅亡的。過去德國之所以優勝，全在各人和領袖們的自信心。他們相信須用武力奪回自由，使德國恢復過去的尊榮。這種自信心不過由萬千民衆感情的總量產生出來。

關於這一點，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們國家這樣腐敗，將來必須費很大的力量才可消除這不幸的情形。只要團結全國的精神，專心一志地去追求自由，我們才可恢復已失的東西。

國家的義務是在培養體力的效能，不但在學校時要這樣，就是離校後，青年還在繼續發育的時期也該這樣。如謂國家的權利只在監視年青的國民早點結束學校的時期，而引薦他去當軍隊的職務，未免太妄想了。權利即義務，從來都是相等的。

軍隊不單是教人怎樣開步走和立正，並且須視爲國家教育的最高機關。年青的兵士自然要學會怎樣使用軍械，可是同時他還要繼續訓練，以備將來之需。在這軍事學校裏，兒童已變爲成人了；他不但要學服從，而且要學怎樣發號施令。應得的責罰，他固然要忍受，遇必要時，對於無辜的非難，還要忍氣吞聲。

自己既充溢着自信的力量，益之以軍隊的精神，這青年人一定相信他的國家不會被人侵略。

軍隊的服役一結束，他必須呈上兩張表：一張是當公民的法律上的文字，求國家允許他在公共機關服務；一張是健康的證明書，說明他在身體上適宜結婚。

關於婦女的教育，應特別重視體育的訓練，然後才談到德育和智育。不過婦女教育的唯一目的是預備做將來的賢母。

在大戰時，我們常常聽見說我們的老百姓太多話，連保守祕密的事情，不讓敵人知道，也不可能。請你想想，德國的教育在大戰前曾視沉默爲美德麼？不是；我們現在

的教育制度對於沉默這件事全不在乎。可是這件不在乎的東西，在訴訟上不知道花了多少錢，百分九十九的案件都由不能沉默發生。我們國家的貿易，因商人不能保守秘密，以致損害；我們軍事上，防衛的準備，也是不可能；因為我們的老百姓從沒學過沉默無語。戰爭的時期內，這樣多嘴，真是失敗的重要原因。所以年青時沒有訓練過的東西，到成年時已經無法學習了。

美德的修養，我們現在的學校全沒有注意到。今後我們應改變方針。誠實、犧牲、沉默都是偉大的國家所需要的美德，這些美德的訓練，較我們學校裏的其他課程還重要。因此，國家的教育工作應注重人格的修養和體格的訓練。許多遺傳下來的道德的缺陷，經過長期訓練之後，雖不能完全消滅，也可以有大部分的改革。

人家常說，一九一八年十一十二兩月間，各處都失敗了。上自皇帝，下至小隊長，都不能號召兵力，以作最後一擊。這種討厭的事件，就表明我們教育的缺陷，因為在大難降臨的時候，平時不在乎的東西都普遍地實現了。我們現在之所以不能作激烈的反

抗，並不是缺少戰備，而是缺少決心。這種心理深入民心，致使我們不能做稍有危險性的行動。一個德國的將軍找出一個古典的公式來解釋這種決斷力的缺乏；他說：「假如一件事沒有百分之五十一能夠成功，我就不幹」。這「百分之五十一」歸結德國失敗的慘劇。

現在怕負責的心理也是這樣。這種錯誤是基於青年的教育；以後又瀰漫着全社會，甚至到國會的機關。

恰如將來國家應注意培養意志和決心一樣，喜歡負責和勇敢認錯的美德，也要深深印青年的心裏。

國家的教育應採取科學的訓練而稍加更改，其方法有三：

第一，青年不要費精力去學那些無用而又易忘的科學。譬如一個普通的國家官吏，受過高等和最優等教育，到三十六歲或四十歲的時候，他所學的東西恐怕也記不得多少。

我時常所說的教育制度，對大多數青年人都很相宜，不過有的人須學會一種語言，以備將來隨意作精深的研究。

學校的課程應劃出相當的時間以訓練體格及其他事項，如上文我所說的一樣。

教授歷史的方法，尤應更改。百分之九十九的實例中，其結果都怪可憐。因為所記的只是一些日期、地方、人名、而那廣大明白的系統倒忘記了。重要的事情也不教，只留給那些有天才的讀者去探討一切事件的意義。

教授歷史時，須記着不要教太多事情。因為研究歷史，不但是要知道過去曾發生什麼事，而且要找到教訓，藉以延續我們的國家。古代的歷史，也不能置之不論。從廣義看來，羅馬的歷史不但給現在人作最好的教訓，並且宜於各時代。國家的責任，是要知道寫世界歷史時，當記着種族的問題應佔最重要的地位。

從將來從事職業的觀點來看我們現在的中學教育，我們知道三個不同的學校出身的人，都可以做同樣的職業。這兒所說的是指普通教育，不是什麼專門教育。像我們現在

的中學校的課程，自然不能培養什麼專門智識出來。

這樣的缺陷，我們的國家應刻不容緩地予以肅清。

我們的教育制度所需要的第二種改革是：應實行普通的和專門的教育的分別。因為專門教育多少在乎謀利，而普通教育適足以救這毛病。我們須堅持這主張，專門的科學之所以發達，全賴國家以高尚的理想，予以必要的設備。這就是說，不要為個人物質的享受，而須準備犧牲和謝絕報酬。

現在沒有簡明的國家的定義；普通所教的只是狹義的愛國主義。因此我們的人民對於德國的歷史只有一些不健全的觀念，而把重要的系統失掉。在此情形之下，怪道沒有一個人肯真心愛護國家。

沒人知道怎樣能把我們國家的重要人物給小孩當英雄看待，怎樣把注意力都集中到這重要人物的身上，以發生共同的情感。

德國一革命後，愛護皇帝的心理即消滅了。教授歷史的目的，只在得學問。國家似

乎無所用其愛護一樣。在共和的國家裏，就沒有機會增加愛國的力量，假如這次大戰的口號改爲「擁護共和國」，那戰爭的時間顯然不能延長到四年半。

共和國這制度在世界各處頗爲流行。因爲人家喜歡利用怯弱的人，所以敵國之所以同情我們國家的政體，實出於惡意的批評。人家喜歡德國之有共和國，因爲人家還找不到別的法子以侵害我們。

國家應爲其生命奮鬥。道威斯(Dawson)的提議對我們國家的自衛，沒有什麼助力。我們的制度，及其意義，越完備和越有價值，便越引起敵人的怨恨。國民比軍械便能保衛國家。砲台不足恃，所可恃者只是男男女女對國家的愛敬和熱情。

第三種改革是關於科學的教育：國家將把科學當做增進國家尊榮的手段。世界史和文化史都要用這種觀點來教。發明家之所以偉大，並不是他只是一個發明家，尤其是他乃我們的同胞。我們應該從德國歷史上選出偉大的人物，以動人的方法，呈獻於青年之前，使他們逐漸成爲國家的台柱。

國家主義是不問階級的。假如沒有一個階級有可恥的事，大家定感到其國的尊榮。可是一個飢寒交逼，流離失所，腐敗不堪的國家，誰也不感到有半點尊榮。我們所謂「國家尊榮」的樂處，非到國家事事都循軌前進不爲功。不過有人能深知其國的偉大，然後才有這樣尊榮。現時大家害怕和人挑戰，正是無能的表現。

這世界不消說要經過很大的變動。結果是亞利安人勝利呢，抑還是猶太人勝利，殊難決定。國家的職務是要保存其種族，並予青年以良好的教育，以備至世界上作最後之一擊。那首先發難的國家將得偉大的勝利。

由種族的觀點看來，這種教育須繼之以軍事訓練，恰如普通德國人，軍事訓練應真爲普通教育的結束一樣。

身體上和智識上的訓練，將使國家變爲偉大。同時，優秀份子的選擇也非常重要。可是這些事情現在尚未切實施行。照常例而論，境遇優良的高等社會的小孩，較宜受高等的訓練。才氣的問題倒是次要，因爲所謂才氣只是相對的。一個農人的小孩也許在才

氣上勝於一個世代縉紳的小孩。不過後者因有善良的教育，優美的環境，使一切豐富的印象深入其心，所以才氣之大小，對於他所受的高等教育也沒有多大的關係。

敷衍得來的學問不能使人發明，由才氣得來的學問則反是。不過現在德國人都不知道才氣的價值，等到需要時才到處去找。

國家還有一種教育的職務，就是由全國民衆中選拔一些有頭腦的人，給以權貴的位置。對於一般的小孩，國家不得不設法給他們以一定的教育；對於有才氣的人，國家亦應予以應享的機會。此外，國家最大的義務是開放高等教育的機關，給任何階級的人。

國家應注意之事，還有一點。在德國特別是智識階級，太和世界隔絕了，對於下層階級，更是漠不相關。兩個毛病就由此而生：第一，這階級的人對於羣衆既不瞭解，又不同情，彼此視如陌路。第二，高等階級太缺乏意志；智識分子時常比沒有受教育的人怯弱。天知道我們德國人不敗於學問，而常勝於意志和決心。舉個例說，我們的政治家越有智識，在真正的事業上就越怯弱。交戰時我們政治上的準備和軍械之缺乏，並不是

因管治我們的人沒有智識，而是因他們受過太高深的教育，腦裏只充滿着智識；反而缺乏健全的性情和勇氣。不幸我們的國家就在這昏頭昏腦的長官的指導下求生存。假如我們能得到健全的民衆來領導，那麼一切兵士們所流的英勇的血也不算白費了。

羅馬公教會給我們一個模範，我們可以盡量學牠。獨身的神父選人做替身時，不從他自己的同輩中去選擇，反而從民衆中去選擇。很多人都不知道獨身的特別意義。在那古代的制度裏，獨身主義的確是強力的基礎。

在教育的權能上，國家的責任是要知道時時以下層階級的新血液來更換智識分子。國家應極端小心，從全國人民中，拔出真有才氣的人物，以服務社會。像我們現在的世界，這事情似乎做不到。

一切工作都有兩重價值，純粹物質的和純粹理想的。物質的價值全在所做工作的重
要性，以其需要的程度來評量價值；從理想方面說來，人人都平等，因各人都可盡力做事。評量個人的價值時，須知道他給社會所做的工作是怎樣。因為個人的勞動是他生存

的手段，不是目的，所以他必須在國家的文化組織中，繼續提高自己做人的資格。

可是現代是自趨於滅亡，現代施行普選，空談平權，這樣的思想毫無理由。憑現代的人看來，人的價值是由物質的報酬來較量，因此便空談平等的根據。平等不能單靠個人的功業的，可是每人如能盡他特殊的責任，自由也許是可能。社會只能給人以機會，使人造就其價值罷了。

在現在的生活裏，黃金變成一個重要的力量；不過將來也許有人會崇拜高尙的神祇。現時好些東西都因酷愛金錢和財產才存在，不過這些東西如不存在，人類也不見得變成很窮。

我們運動的一個責任，是期望有一天各人能取生活上一切需要，同時也要維持這張，人類的存在不是爲物質的享受。要實行這方法，必須好生分配薪資，使每個人能夠以公民的資格過有秩序的忠實生活。

讀者不要說這只是空想，不能見諸實行。自然，我們也不期望毫無過失的時代能實

現於這世界。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打倒已知的錯誤，摒除怯弱，以達到理想的境地。痛苦的實現自生出許多限制。因為這緣故，人類應為最終的目的努力。失敗不能轉移他們的目的，恰如法律不因人犯罪而被輕視，藥品不因生病而被唾棄一樣。人類應該小心，不要太瞧不起理想的力量。

羅素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三四〇

附錄

墨索里尼小傳

班尼陀、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於西歷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生於意大利東北部波萊達披奧 (Predappio) 省多維亞 (Dovia) 縣的一個小村落，名叫凡蘭諾、卡思塔。墨氏先代以軍功出身，其祖父在世曾爲國家衛隊副官，他的父親是一位以勞力生活的五金匠。因爲在下層社會生活着，瞭知「民間艱苦」，所以極富於社會主義的思想，常常於工作之暇，就把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提出與朋輩，互相討論。處在這種環境之中，薰陶於這種思想之內，所以墨索里尼幼年的時候，就對於社會主義有相當的傾向。

墨氏幼年所受教育極少，於九歲時，由波萊達披奧小學畢業之後，轉入法昂沙

(Faenza) 某寄宿學校，旋以學業成績不佳，且違犯校規，卒被學校開除。十三歲時乃又負笈於佛爾林堡堡里 (Forlimpopoli) 的師範學校。畢業以後，到處謀事，經過許多次的失敗，最後才得到一個教讀的位置，但是因爲性情與此職業不能相近，所以終於放棄了冷板樣的生涯，悄然遠去，飄流到瑞士，這時墨氏還不過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

到了瑞士以後，墨氏已不名一文，既尋不到相當的工作，又不願向人乞憐，於是遂過着極無聊賴，極不固定的生活，諸凡縫工、廚役、脚夫、跑街、泥水匠等事，都會做過，有時則賣文渡日，但是他抱着「百折不撓，成功之母」(這是墨氏一篇論文的題目) 的宗旨，所以無論如何艱苦困難，顛沛流離，他總繼續奮鬥，一往直前，不稍餒氣，他在自傳內很明白的表示此點意見：

「我的流浪生涯，雖然充滿了困苦艱難，但是由此我可以得到相當的鍛鍊。造成一種堅強的自信心，而爲後日我在政治活動上，極大的助力。因爲困苦可以給我們一種教訓。人生所遇的失意事總比得意事爲多；得意事於人無益，而失意事，反足以堅強一個

人的意志，使其因感受困苦，而愈知做人的途徑。假使當時我所過的生活，非常舒適，那末我將因耽於安逸，而不能適應於現在的社會。因為安逸的生活，足以消磨人類的毅力，而我經過種種的磨練與掙扎，才有這種毅力，所以此種毅力，絕非安逸生活中所能得到的。

墨氏在瑞士雖然過着如此貧苦的生活，但是他仍舊不灰心，仍舊勇往直前，仍舊分出餘晷來研究學問，而尤熱心於社會科學。他也時常到洛桑(Lausanne)大學旁聽政治經濟學的講演，有時也參加討論。但是後來瑞士政府當局發現他有宣傳過激思想的嫌疑，下令逐其出境，於是墨氏的流浪的貧苦生活，遂告一段落。

墨氏由瑞士重返意大利以後，不久他的母親——據說是唯一了解他的人——就死去了。這時墨氏被徵入軍，編在凡樂納(Vergona)的一個聯隊裏，受嚴格的軍事訓練，而這種軍隊生活，正給予墨氏後來組黨的極大幫助，因為兵士生活，須絕對服從領袖遵守紀律，而且還要吃苦，這都是法西斯蒂黨的特色。墨氏對於兵士生活，絕不嫌苦，而反以

此爲鍛鍊自己精神與毅力的場所。

經過規定期限的軍事訓練以後，墨氏乃脫離隊伍，任亞培利亞（Oberle）的中學教員，但是這種教書生活，既與其賦性不合，只不過藉此暫作安生之計，聊以糊口而已。所以後來不久就同民報主筆巴梯思地（Bastide）偕赴奧地利，從事於文字工作，不幸以發言觸及當局，遂被奧國政府下令驅逐回國。不過墨氏此時對於新聞事業，已發生極大興趣，所以回意大利之後，未幾就參加入社會主義黨所辦的賴幾奧意米利亞前進報，因爲墨氏既已爲社會主義黨的黨員，並且任事於社會主義的日報，遂使其得於政治上嶄然露其頭角。此時墨氏還是一位二十九歲，未屆而立的青年，當然具有一般青年人只知向前努力，毫無顧忌的心情，而况其父亦在此時期內去世，益使墨氏減少家庭的羈絆，專心致志辦理報紙及從事於各種社會主義的運動工作，如罷工之類，努力的結果，非但前進報的銷路日見增加，未幾即已行銷十萬份，而且社會黨的黨員，也增加到十五萬人之多。這樣墨氏在黨內和報館內的地位，遂與日增高了。

但是墨氏逐漸對社會主義的行爲，發生懷疑，尤其是厭惡所謂「赤色週期」的宣傳，認爲是一種混亂的行動，而非真正的革命。同時墨氏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日的前進報上又極力主張參加歐戰，幫助協約國，對德、奧宣戰，這都與社會主義的主張相反，於是墨氏遂被罷免前進報的職務，並開除黨籍。自此以後，墨氏乃擬自己創辦報館的計劃，復經各方面朋友經濟上及精神上的援助，遂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意大利民報，一直到現在，該報仍舊操縱着意大利的政治思想。

意大利民報開辦以後，墨氏既已有自辦的輿論機關，於是遂進一步而從事黨的組織。乃於一九一六年一月組織革命同志會，即爲後日法西斯黨之濫觴。是年四月墨氏被捕入獄，未幾被釋，五月意大利加入歐戰，對德奧宣戰。九月墨氏亦入伍，開往前線，奮勇爭先，遂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受傷，經療治以後，雖無生命危險，然已不能再戰，遂仍回民報，從事文字言論之工作。

當墨氏之組織革命同志會時，贊同者甚少，故亦無擬訂任何政綱之類的東西。迨墨

氏由戰地歸來以後，始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米蘭召集第一次大會，即改組爲「意大利戰鬥的法西斯」(Italian Fighting Fascist)。此次出席與會者有一百餘人，並公推墨氏起草政綱。其內容包括以下各點：

- (一)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宣佈共和，採取直接選舉制，賦予國民以決票權及提案權。
- (二)採用中央行政分權制，國家職能只限於指導方面。
- (三)廢除上議院。
- (四)縣長民選，不受中央轄制。
- (五)廢除特權階級，廢止元老院，以及騎士制度與貴族稱呼。
- (六)廢除徵兵制，及政治警察。
- (七)裁遣軍隊，並限制製造軍火。
- (八)言論、思想、信教、結會、宣傳、個人與團體等示威自由。
- (九)主張國民教育與職業教育機會均等。

(十)取締有限公司，禁止銀行及交易所，實行個人私產登記，沒收不生產之資本。

(十一)澈底實施社會衛生。

(十二)禁止十六歲以下之童工，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十三)生產組織之組合化，勞工全體得直接分沾利潤。

(十四)土地農有。

(十五)外交公開。

惟以上之政綱，因環境關係，多未能實現，而墨氏非但不能達其宣佈共和之目的，而且反爲君主立憲國之首相，這也是出其意料以外的，不過這次草訂的政綱，還經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羅馬舉行的法西斯黨員全體大會的修改。該大會先將黨名改爲「國家法西斯」，並修正政綱如下：

(一)關於國家者——國家爲國民的法律化身，故政治組織的成效，都是國民的固有價值，要是否能保障國民爲轉移。而國家的主體，應屬獨立的，不受教會的支配。至

於法西斯黨對於政治機關的態度，當以國民之利益爲前提。

(二)關於國民者——國民者，非若干個人之集合體，乃包括無數有系統之有機體，易言之，卽民族精神上物質上之大聯合。

(三)關於經濟者——應盡量發展國家商業，使意大利得於世界商場中佔一席之地。其一切國際條約，當視本國與世界經濟情形而修訂之。並在地中海以及海外各殖民地，設置經濟學術組織，便利水道鐵路等交通事業。

(四)關於國防者——意大利爲防衛國境計，爲向外發展計，須有適應其政治上的需要，並有與其他國家對等的海陸軍，更應慎選外交人才，爲本國增光。

(五)關於外交者——國家對外的權勢，須謀恢復；卽國家對於摧殘武力的爭執，不應忽視。而當注意保持其傳統之國民性。因意大利在歷史的及地理的統一上，應負重大使命，以地中海沿岸的拉丁文化的干城自居。意大利殖民應受充份的保護。而法西斯黨的態度，則對東方各民族，採取親善政策，而對國際聯盟，則無深切的信仰。

故就修正後的政綱視之，已完全爲國家主義的口氣，與第一次的社會主義態度，大見歧異了。

墨氏把黨組織好了以後，就打算掌握政權。因鑒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選舉的失敗，而一九二二年七月選舉，墨氏又僅得到三十五票，於是乃決定退出國會，另圖奪取政權的方法。一面組織黨軍，積極計劃，遂於是年十月二十七日發表宣言，進攻羅馬，所至披靡，連佔多城。二十九日意王乃召墨氏爲內閣總理，開始組閣，至此法西斯黨遂握有政治上的大權，一直到現在。

墨氏既然是以黨治國，所以對於黨的職權，仍舊不肯放鬆。而其在黨中的地位，是超過一切的。因爲法西斯黨的組織，共分三級——中央黨部與最高評議會，省黨部，市黨部。均絕對服從黨魁的指揮。而黨魁就是墨索里尼自任。這樣就使墨索里尼成爲黨、政最高的領袖，以實行他的主義，而施展其自幼的懷抱，就其個人而言之，總算是成功的了。

桑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二五〇

希特拉小傳

亞德爾夫、希特拉 (Adolf Hitler) 於西歷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於奧地利與巴維利亞交界的百老諾 (Braunau) 鎮。其父爲政府中之小吏，曾任郵政局長海關稽查等職。家庭中滿佈着政治和宗教的空氣。但是他的父親因時處於經濟拮据的環境中，遂不免對資產階級發生憎恨，而尤不滿於當時擁有鉅資的猶太人，這就是希氏後來排斥猶太人的原因之一。希氏自幼酷嗜美術，除在鎮內學校讀書之外，又由其母教以水彩畫，其姊授以鋼琴。十二歲時，就立願將來學成爲一畫家或音樂家，所以對其父希望其繼承紹裘，爲政治上的人物，表示反對。時刻計劃如何可以達其自己的願望。

希氏的母親於一九〇三年逝世，翌年其父亦死，這時希氏還不過是一位未屆及冠的

童子。於是乃放棄學校教育，隨其姊赴維也納，依其姑母過日。此時希氏已決定學習美術，乃入維也納美術專門學校，但是只讀了四個月，即因功課不佳，被學校開除，據云希氏非美術之才。離校以後，遂不得不另謀生活，乃入維也納某建築事務所，任繪圖員的助手。繼續任職三年以後，希氏乃往投考建築學校，入學試驗，未能及格，因其算學程度太低，不能為建築師，所以只好加入工會，為木匠的助手。此時希氏年已二十，並已學成噴漆房屋等技能，遂由其姑母家中遷出，另自賃屋而居。然因其執業卑下，一般中上社會之人士，均不願與之往來，至其每日見面的人，都是粗俗的工人，當然不能與具有藝術興趣的希氏契合，而況這班工人都是社會主義者，更是希氏絕端痛惡的。所以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就放棄了這種卑微的職業，而往慕尼克（Munich）亦稱門占，亦稱閔行）。抵慕時，希氏只剩了四塊錢。但是他並不因經濟困難而絕望，因為歐戰前的德國，正是最繁榮的時代，國民人人，由上至下，均莫不歌頌該撒與祖國。這種新環境與新空氣，影響希氏的思想不少，所以歐戰發生，希氏就毅然加入德國軍隊。奮勇應戰，

屢受重傷，且有一次，身遭三彈，送入醫院，幾瀕於死，所以戰事告終，德政府乃獎以「鐵十字」章，現在希氏仍懸於衣襟上面。

戰後希氏賦閑於慕尼克，在一九一九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忽來不速之客，叩門而入。據來人自云：因於希氏知友費德（Fiedel）處而悉希氏之爲人，極表敬仰。現在同人正擬組織一新黨，名爲勞工黨，將於今晚開會，甚願希氏出席參加；希氏允屆時出席。遂如約而至。是晚與會者，連希氏共計七人，故當時德人稱之爲「七人黨」（Männer Parsei），希氏黨證爲第七號。希氏除靜聽各同志之意見外，亦發表其自己的見解。而其演說之動人，措辭之婉轉，雖希氏本人亦自訝其演說才之進步。最後希氏被推爲宣傳部長，而費德擔任黨綱起草委員。該黨最大的工作，就是撲滅共產主義。是時適愛因·陶勒（Ernst Toller）卽數年前紐約戲劇公會表演的「人與羣衆」Men and Masses 的劇本作者）與猶太藉共黨康爾提、恩斯南（Kurt Eisner）在巴維利亞宣佈成立蘇維埃政府。卒經希氏召集退伍軍人加以武力壓迫，不及一星期，蘇維埃政府卽行崩潰，恩氏被殺，陶

氏逃出德境。

至一九二〇年左右，僅有七人的「勞工黨」，逐漸發達，希氏已成為黨中的發言人，且因德國人所崇拜的魯登道夫將軍(Ludendorff)亦加入該黨，遂益為世所重。至一九二二年，希氏被推為該黨領袖，黨員人數增至九千，而各方捐款，源源接濟，遂使希氏於進行上，益得便利。是年希氏復召集特別會議。此時參加之人，除往昔之農民、小商人，和勞工外，尚有許多有聲望的人和有財力的人，此中尤以項斯台格爾(Hans Thöni)為最著名。項氏於一九〇九年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其母為美國籍。此次會議的結果，希氏提議將黨名變更，公決改為「國家社會主義黨」(National Socialists)，簡稱為「耐死」(Nazis)，亦名為法西斯黨，因希氏黨的組織，多倣效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戰鬪的法西斯」，好事者且以希特拉派(Hitlerite)加於其黨徒頭上，作為徽號。故在德國，凡國社黨、法西斯蒂、希特拉派，或「耐死」，是互相為用的名稱。

一九二三年該黨黨員已增至五萬人，希氏與魯登道夫均以為時機已至，乃欲效法墨

索里尼進攻羅馬的手段，計劃進攻柏林，以謀奪取政權。當時德幣馬克越來越不值錢；法國的軍隊和鉄甲車仍舊在魯爾（Ruhr）一帶逍遙得意；而德人餓死者，以千計，失業者達數百萬人。是年十一月五日，時機愈見急迫，適巴維利亞總督卡爾（Von Bayern）在慕尼黑向民衆演講，希氏及「耐死」黨二人各出手槍挾持卡氏而去，至隔室則魯登道夫已坐候其間，於是希氏乃迫卡爾加入革命。不幸希黨中竟有漢奸，暗向柏林政府報告，政府乃派大軍至慕尼黑，與希黨戰於奧登派拉斯（Odensplatz）。希黨死八人，傷數十人，卒被降服。魯登道夫就擒，希特拉則秘密逃走。

希氏失敗後，乃逃避於離慕尼黑南而不遠的烏芬（Ufenau）小鎮，寄寓於項斯台格爾家內。希氏極受項氏優待，而尤爲項氏之母福羅（Frau）及妹福羅陵（Frau Loh）所歡迎。在逃難的時期內，希氏竟於福羅陵發生戀愛。迨警察發覺希氏藏匿之處，加以拘捕時福羅陵大聲急呼，不許希往，然結果希氏不得不去蘭斯堡（Landshut）待審。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希氏與魯登道夫同時受鞠，一直審到四月一日才終止辯

論，結果魯登道夫被釋，而希氏則判處五年徒刑，監禁在某處礮台內。卒經友人項斯台格爾等奔走營救，只關了十個月，就獲釋放。當他走出監牢的時候，守獄吏忽趨前對希氏說：「我也加入做『耐死』黨員！」還有一件事情，應該大筆特書的，就是希氏的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即於此時在獄中寫成的。

希氏出獄以後，於一九二六年回到慕尼黑，好在項斯台格爾富有資產，所以希氏在那裏可以安逸過日子，不愁經濟上的困難，而且此時還有許多名人加入，如胡根堡 (Hugenberg)，赫門、戈林 (Hermann Goring) 維廉、福利克 (William Frick) 等。這班人智識才能都駕希氏之上。福氏為慕尼黑高級警官，胡氏為當地的大實業家兼報館發行人，都比較是有聲勢和地位的。這樣，就使「耐死」黨力量膨脹起來，到一九二七年春，已有黨員三十萬人，並且竟能壓迫禁止「西線無戰事」一劇的公演。因為這是一齣宣傳和平主義的戲劇。

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國社黨的發展，更為迅速。黨中的紀律，益見整齊。黨中的徽

號，自一九二〇年採用黑色卍字，配在褐色的制服袖上，現在益爲人所重視了。黨中的武力組織，是以挺進隊爲基本力量，現在已經是各大城市中，都有挺進隊的踪迹了。這樣勢力的膨脹，遂使一九二八年的選舉，國社黨得在國會中佔到十二席。一九二九年，反對希氏最烈的格斯達夫·史特來斯孟（Gustav Stresemann）適於此時逝世。更減少了希氏進行上的阻力。所以到一九三〇年選舉時國社黨所得的票數，已佔投票總額中百分之二十，此時挺進隊隊員已增到二十萬人了。一九三一年間，在國社黨與敵黨——大半爲共產黨——的巷戰中，死者約二百人，受傷者約五千人以上，此時國社黨已成爲最大的政黨，而其所得投票的票數，已達七百萬票以上。這就是希氏執掌大權的徵象。

一九三二年的夏天，德總統與登堡指派巴本（Franz Von Papen）爲總理；按照德國政治的組織，總理比總統更爲重要。總理有選任閣員之權，只要國會不加反對。但是不幸在與登堡發表巴本組閣之後，國會就表示不擁護的態度，於是不得已只好由總統命令解散國會。巴本以爲新國會必定可以擁護他的內閣，誰知仍屬一場幻想。而且時局愈見

緊張，希氏信徒奧格斯提、維廉（August Wilhelm）——前德皇的第四子——忽向人宣稱：「予父將回國，新德意志即在目前實現」。這種驚人的消息和恐怖的環境，不得不使興登堡感受憂慮。卒納巴本之請，於八月初召希特拉入宮。當時談話的經過，頗爲重要，茲紀錄如次：

興登堡：「希特拉先生，汝願否本身或汝黨之重要領袖，加入巴本之內閣？」

希特拉：「予不願。反之，予甚願總統能信任我黨，予以領導德國政府的全權」。

興登堡：「汝所要求的權力，其範圍如何？」

希特拉：「這種權力，和墨索里尼進攻羅馬後的權力相同」。

興登堡發怒，答云：「爲良心計，爲盡忠祖國計，我都不能允許，把這種大權託付給你」。此時巴本在旁，亦怒之以目。會議遂不歡而散。但是時局仍舊是這樣的緊張，國會選舉的結果，希派又佔了二百三十席之多。

自一九三二年九月以來，國會因不擁護內閣，而被解散，接二連三，已有多次，

與登堡不勝其煩，最後乃再單獨召見希特拉，當時因為只有兩人晤談，所以就稱做「四眼會議」(Meeting of four eyes)。會議的結果，與登堡雖然邀希氏出來組閣，不過附帶着相當的限制條件，所以希氏未即答應承受。此時社會環境，越來越惡劣，計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之間，柏林自殺的人，就有二百人之譜。「耐死」黨人並在外面宣揚說：「與登堡拒絕希特拉組閣，是存心使我們全國滅亡！」這樣，八十五歲的與登堡可着慌了。於是巴本乃再獻計以希特拉為總理，而其本人副之，從旁監督。經過考慮以後，與登堡遂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第三次與希特拉晤會，無條件地，請其出來組閣。此種消息傳出以後，全國歡騰；新國會遂以四百四十一票對九十四票，通過擁護希特拉為內閣總理的議案。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希特拉遂成為全德意志的「狄克推多」了。

墨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二六〇

關於法西斯主義的外國文參考書籍

- ① B. Mussolini: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octrine of Fascism
- ② B. Mussolini: My Autobiography
- ③ B. Mussolini: Mon Journal de Guerre
- ④ F. Ludwig: Mussolinis Gespräche mit Emile Ludwig
- ⑤ A. Hitler: My Battle
- ⑥ E. Lengyel: Hitler
- ⑦ C. E. Flynn: Benito Mussolini
- ⑧ T. D. Kemp: Adolf Hitler
- ⑨ H. F. Armstrong: Hitler's Reich, the First Phase

- ④ C. B. Hoover: Germany Enters the Third Reich
- ⑤ P. Einzig: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Fascism
- ⑥ G. S. Counts: Bolshevism, Fascism and Capitalism
- ⑦ Schneider and Clough: Making Fascists
- ⑧ J. Strachey: The Menace of Fascism
- ⑨ L. Dennis: the Coming Fascism
- ⑩ M. G. Sarfatti: Life of Benito Mussolini
- ⑪ E. Henri: Hitler over Europe
- ⑫ P. Einzig: Economics of Hitlerism
- ⑬ W. Rohlsto; Italy under Mussolini

李鼎聲張飛霞編譯

世界偉人列傳

一厚册
一元一角

有志在學問事業上取成功者不可不讀
有志在理解人生意義努力奮鬥者不可不讀

這不是一部尋常的傳記，而是一冊描繪當代與近世偉人一生的實錄。四十餘個大政治家，大革命家，大文豪，大科學家自幼至老的奮鬥與修養，勞作與理想，通過編譯者極靈動的文筆，寫得栩栩欲生，活修養之道，更且暗示一般青年在人生的道中，必須發揮絕大的努力為個人的與社會以前程而奮戰，本書絕非如平常的傳記將偉人看作超歷史的神明無瑕的英雄聖賢，而只是說明每一個成功者都是在社會與歷史的條件下取得他們的優勝與成就，同時絕不隱諱或辯護他們在生活和思想上行動和理論上的錯誤與缺陷，而疏忽批判指摘之責。正因為思想的高超與觀點的正確，才能使本書列入於新興的傳記之林。至於取材之豐博與文筆之犀利，尤屬餘事。○書用三十二開木印釘，每傳之前附插有偉人的照像，倍覺美雅動人，讀後不忍釋卷。每冊實價大洋壹元壹角。

法西斯主義淺說

衛仁編譯 一册四角

本書的目的是要將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歷史源流，以及上西運義的政治社會經濟理論和它在實際上的政策團的運用，用最淺顯的文筆介紹給讀者，而充滿着嚴肅的歷史的意味，所以本書運動的實況與組織，而法西斯主義的基本參考書，而自然，在閱讀此類書籍時，所需要的不是盲從的心理，而是最清醒的批判情懷。

上海四馬路文藝書局發行

法西斯主義領袖言論集

李百強編譯 一册一元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當今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兩大巨頭，研究法西斯主義的人，首先應注意這兩位領導的言論。本書所集，係墨氏與希氏之最精警的言論，關於法西斯之背景，發育，真諦——莫不透澈剖析，可算得是法西斯主義的第一部讀本。凡現代人欲懂得法西斯之真髓者，請先讀本書。

！手助的時文作書讀 ！學巨的中典辭華日

個餘萬二字單 言萬十三書全

格表法文有附前書

引索字漢有附後書

華是時同，典辭華日是但不書本
辭語代現』置兼庸無且，典辭日
此具備已實『典辭語來外』及「典
。長特之書種四

本 書	子 倫 衛	亞 家 子	柳 羅 方	培 杰 鴻	元 世 志	蔡 王 陸	題 讚
--------	-------------	-------------	-------------	-------------	-------------	-------------	--------

(斑 一 點 優)

現今國內學習日語者，每苦不易覓獲一完善之日華辭典。舊有數種非訛誤百出，即內容貧乏，求一解說詳確編制得體之工具書，殆不可得。本辭典即為彌補此缺憾而編印。編者留學日本十餘載，本其致授日語之豐富經驗輯成此書，自非率爾操觚者所可比。全書為他書所不及之主要特色有：(一)願及初學者學習過程，中各方面之需要，凡讀書，造句，翻譯，作文均可借助此書，毫無艱澀；(二)取材極為周備得體，凡書籍報章中經見之難解辭語通用品詞，無不廣蒐畢羅，外來語及現代語亦擇其通行者一一搜集，使讀者得此書，即無須兼置「外來語辭典」「現代語辭典」；(三)解釋極為明瞭準確，每逢一難解之品詞，即於詳盡的釋義之後，附以切於實用之例句。且繫以漢文譯解，務使學者一經檢閱，既易明其義理，復得知其用法；(四)書後附有漢字索引，使學者便於檢查漢字之讀音。至於印刷精美，便於攜帶，尤其餘事。

模範日華新辭典

黃鑑村編著 文藝書局最新出版

硬印精紙林道等上用
長積而册厚一裝精而
觀美寸英四寬寸英七
帶攜於便久耐

元二洋大價實

只一匣書美精贈並

應 用 文 學 之 最 新 讀 物
日 常 生 活 之 參 攷 要 籍

現 代 應 用 文 學

石 葦 編 蔡 元 培 題

一 編輯旨趣

- (一) 本書編者目的，在使讀者對於現代應用文之原理與作法，得一明確而有系統的觀念。
- (二) 本書以不背新時代之精神與新文學之趣味為唯一的根本。
- (三) 取材雖新舊雜陳，惟棄取之間，曾費去心力不少，並為劣之詳加分析，以明得失優劣。

二 編輯系統

- (一) 全書分十二章，其崖略如次：(1) 首二章為應用文理論上與實際上之綱領，初學讀此，最有裨益。(2) 自第三章至第十二章，各章均有數章為他書所未備，或備而未詳者，契此，慶申，聯語，日記，傳記等文件，且有關處，必註明參看等字樣；此外，非正式公文附述於公文章，遊記詳論於日記一章，新聞帶講於廣告一章，此等編制，不僅精博，亦且經濟異常。
- (二) 本書對於各項應用文之作法，要點，式樣，用語等，均經闡明無遺。

三 其他優點

- (一) 本書博采羣籍，廣搜用例，每章之末，各有餘錄多種，或為研究資料，或為範例備考。
- (二) 本書編制力求靈活，且材料富有自由伸縮之餘地，或以教授，或以自修，均極適合。

全書廿萬言
廿五開大本
每册一元

新青年書信

李守東編著

一册七角

些濶現代青年既不需要那些陳腐老套的尺牘，更憤厭那氣一掃而光之書信，這書將新書翰界各種的迂腐，指示與油滑之關係之應付方法，而且亦莊嚴，亦輕鬆，它不僅有寫信之技術上的說明，而且且有生活思想之灌輸，計分家庭、說書、學校、社會、學術等部門，書信之範例，雖然，計分家

◀ 行發局書藝文 ▶

青年學生案頭導師
國文教師的教學利器

作文辨字典

著者 戚肖波編著 實價五角

辨認錯字是讀書與作文時最緊要的一件事，一字之訛，一筆之誤，往往足以使全篇作文大為減色，遺笑大方，正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本書著者本多年教書經驗，從中學生的文課、筆記、日記、試卷中蒐集通常最易犯錯的字彙都凡數千條，分為：形音相似，形似音異，音似形異三大類，每字有國語註音，並反覆舉例說明用法，使讀者了然於各種字形字音之正誤，最便作文與求解，詢為青年學生的案頭導師，國文教師的教學利器。

致青年

夏瑞民著 一册三角五分

這部作品便是作者在青年過程中的一些記錄，可以說是現代青年的一般供狀。這裏有珍貴的生命，美麗的青春，豐富的經驗，充裕的心得。全書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讀書的經驗。例如：「少年文人」，「關於修上學的三封信」，「談談作文的方法」；「主要功課的學習」，「實用的學習方法」等篇；第二部分是關於生活的經驗，例如：「思想改造和生活改造」，「消除煩悶和控制情緒」，「升學和擇業」，「中學讀書生活的回顧」等篇都是非常可貴的。對於人生有熱烈的追求的青年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活的書。

中學學生作文典

郭堅白編 一册一元

這部文典是針對着一般青年作文的種種困難而編的，中學生們在作文時最感着困難的，是不知從何處下筆，或者不知應怎樣發展，怎樣收束，其他如鍊字造句亦是常感棘手的，所有這些困難在本書中都可以找到最輕捷的克服方法，它指示一般青年大眾如何去開展自己的文思，如何去構擬全文的佈局，同時不憚煩地反覆說明各種作文之技術的方法，有志寫出佳文傑作的青年，請在芬芳的文學園地裏，接受這書的灌溉吧。

文藝書局發行

文藝書局最近新書

模範日華新辭典	黃鑑村編著	二	元
作文辨字典	戚肖波著	六	角
中學生作文典	郭堅白編	一	元
現代應用文	石葦編	一	元
新青年書信	李守東編	七	角
世界偉人列傳	李鼎聲編	一元二角	
名家日記	新綠文學社編	七	角
名家遊記	新綠文學社編	六	角
愛的學校	沈克平等譯	六	角
法西斯主義淺說	衛仁編譯	四	角
法西斯主義理論及其運動	李百強編譯	一	元
青年成功之路	葛石熊編	四角五分	
寫給青年創作家	戴叔清編	五	角
文學原理簡論	戴叔清編	五	角
文學方法總論(上)	戴叔清編	五	角
文學方法總論(下)	戴叔清編	五	角
語體文學讀本(上)	戴叔清編	五	角
語體文學讀本(中)	戴叔清編	五	角
語體文學讀本(下)	戴叔清編	五	角
文學描寫手冊	戴叔清編	五	角
文學術語辭典	戴叔清編	五	角
文學家人名辭典	戴叔清編	五	角

批發部四馬路太和坊 門市部四馬路二六七號

文藝書局最近重版書

- 戰爭與和平(一).....郭沫若譯.....一元四角
戰爭與和平(二).....郭沫若譯.....一元二角
戰爭與和平(三).....郭沫若譯.....一元一角
沫若譯詩集.....郭沫若譯.....四角五分
天孫之女.....張資平著.....一元一角
戀愛錯綜.....張資平著.....七角五分
莎菲的愛.....孫孟濤著.....五角五分
處女的悲哀.....陳一夫著.....四角五分
他瞎了.....左幹臣著.....五角
浮浪者.....程碧冰著.....四角
愛與仇.....左幹臣著.....四角
暴風雨之夜.....鍾予女士著.....三角
現代中國女作家創作選...雪菲女士編.....八角
致青年.....夏瑞民著.....三角五分
社會科學問答.....顧風城編.....六角
初中國語教科書.....戴叔清編.....(第一冊)七角
初中國語教科書.....戴叔清編.....(第二冊)七角
初中國語教科書.....戴叔清編.....(第三冊)八角
初中國語教科書.....戴叔清編.....(第四冊)八角
初中國語教科書.....戴叔清編.....(第五冊)八角
初中國語教科書.....戴叔清編.....(第六冊)八角

批發部四馬路太和坊 柴 門市部四馬路二六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發行

墨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墨索里尼與希特拉言論集

【全二冊】實價大洋八角（外埠酌加郵費）

編譯者 李 百 強

發行者 李 盛 林

發行兼印刷者 文 藝 書 局

分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二百八十七號

文藝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二六七號

特約發行所 廣州共和書局



570.7
285
2